

火与焰：德国自治运动史

Geronimo 作

Gabriel Kuhn 英译

Citoyens（希托昂）中译

目录

前言	vii
译者注与术语表	xiii
英文版序	xvii
背景	xxi
第一部分 西德自治政治的兴起	1
革命体验：1968	3
学生反叛	3
学生反叛和议会外反对派	4
社学联的政治	9
社学联的衰亡	11
激进基层思潮	13
68 运动意味着什么	14
革命的唯一解决方案：意大利自治运动	15
1960 年代的意大利到底发生了什么？	15
从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主义	16
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	17
1977 年的自治运动	18

1970 年代的左翼激进主义	21
“我们要夺取一切！”: 工厂中的基层组织	22
住房斗争	25
法兰克福	25
汉堡: 埃霍夫大街 39 号的占屋运动	27
大学中的自发主义运动	29
K 群简史	29
替代运动	31
期刊《自治》	34
城市游击和其他武装小组	36
1977 年, 德国之秋	38
TUNIX 之旅	39
第二部分 1980 年代德国自治运动的诞生	45
反核运动: 1975-81	53
布罗克多夫	54
1970 年代反核运动的政治和社会构成	54
1978-80: 你能用栅栏封锁钻孔吗?	57
布罗克多夫抵抗运动, 1980-81	57
小结	63
西柏林占屋运动: 1980-83	65
自治概念和西柏林住房斗争	67
住房斗争的终结	69
反西跑道斗争	73
自治主义者在德国和平运动中的孤立	77
第三部分 西德最后岁月中自治运动的一些写照	83
阶级运动与大众运动	87

在面罩与凉鞋间：自治运动与绿党	89
自治运动、反帝国主义与城市游击	91
1980 年代的反核运动	95
瓦克斯多夫	96
切尔诺贝尔的核灾难	98
汉堡，那有条美丽的哈芬大街	103
西柏林，那有一座壮丽的十字山	107
1987 年 5 月 1 日的十字山暴动	107
1987 里根访问	108
组织起自治社群	111
革命五一	113
西跑道的误击	115
对自治女性运动的袭击	1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峰会	123
1989	125
附录：“1981 自治主义纲领”	129
英文版译后记	133
“自由空间”和占屋	135
反核斗争	136
激进性	136
反法西斯主义	137
反性别主义	137
反种族主义	137
中文版译后记	143

前言

George Katsiaficas

在反对世贸组织的西雅图抗议的十多年前，数以万计的人在柏林站在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强大的高级金融界巫师们全球集会——的前线，他们迫使来自全世界的银行家们提前一天仓促休会。1981年至1984年间，数十万德国人为和平而游行，他们推动结束了核军备竞赛和美苏冷战。激进青年世代的身影出现在这些和许多与之类似的行动中，他们占据了数百座废弃的建筑物、挑战父权制、同时也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形式作斗争。他们联合农民和生态学家，成功阻止德国的核电工业生产武器级铀。斗争是一座熔炉，将自治运动（Autonomen）锻造为一股抵抗总体性的企业制度并寻求彻底革命的力量。

自治社会运动并不单指某种意识形态——在他们的队伍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土耳其反帝国主义者一道反对现存制度。他们不打算掌控民族国家，而是要摧毁它们。他们想要废除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政治——作为将军、政客和商人的游乐场的政治。他们想要摧毁现有的系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战争、饥饿、贫困与匮乏日常的原因。

自治运动不存在中心化的组织。当一个团体采取行动时，其他团体就会受到鼓舞（galvanized），而他们反过来又会在反叛的连锁反应中鼓舞其他人，我将其理解为一种“爱欲效应（Eros Effect）”，即能够改变公民社会的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出现。自治主义者在示威游行中以“黑群（Black Bloc）”的模式出现，他们进行地方性聚集，但没有固定的组织或发言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他们在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中挺身而出。今天，它们帮助激发了国际正义（或反企业全球化）运动。自下而上地，世界各地的数百万人形成了国际动员的重点：对抗世界经济体系机构的精英会议——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和广

泛意义的实际目标。如上所述，没有中心组织规定这一重点。而是数百万人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形成。同样，在没有中心组织的情况下，全世界约有 300 万人于 2003 年 2 月 15 日走上街头，抗议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第二次战争——彼时战争甚至尚未开始。

随着这场全球运动逐渐明晰其力量，它的战略和影响变得更加集中。通过创造性地综合直接民主的决策形式和激进的民众抵抗，社会运动的自治语法和爱欲效应体现了我所称之为“自觉的自发性（conscious spontaneity）”的东西。国际正义运动所面临的关键战术问题以微观形式包含在欧洲自治组织的发展之中。

很少有人——并且几乎没有人会以称赞的语气——提及二十世纪末德国激进派们对世界和平与正义做出的突出贡献。彼时世界上富裕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沉浸在消费主义的饕餮狂欢中，但许多德国青年却动员起来反对这种潮流，数十年来，占屋（squatter）运动与政府争夺市中心的控制权，德国的运动所表现出的坚韧，那种在各个世代中寻找到自己的同路人的能力，十分了不起。而在美国，经过七十年代的运动高潮之后，除了对于单一问题的行动主义、一种教条式信仰体系的宗派团体或个人化的项目之外，激进运动几乎失去了其再生的能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当穆米亚·阿布-贾马尔（Mumia Abu-Jamal）和其他被长期关押的政治犯在美国孤立无援时，德国自治主义者使他们的案件为大众熟知，并使国际社会关注美国的种族主义问题。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自治主义者的反种族主义斗争。德国政界无人阻止德国统一后，在前共产主义地区爆发的反移民迫害。在霍耶斯韦达和罗斯托克等地，种族主义暴徒袭击了越南人、莫桑比克人和安哥拉人。当警察和公众视而不见时，自治运动动员起来，打破德国种族主义者的围困。当警察最终做出回应时，他们逮捕的却是街头的反种族主义战士——而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逮捕新纳粹分子。

尽管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德国人仍未摆脱他们特有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确，公众普遍谴责并在私下厌恶希特勒称霸世界和追求种族纯洁的罪恶企图，但在表象之下，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认同仍然完整无缺。我们忘记了，虽然希特勒未能建立一个恒久的第三帝国，他的种族灭绝运动却深刻影响了幸存德国人的性格与构成。今天，德国人的帝国梦已经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永远熄灭，但以延续想象中的雅利安血统为目标的新纳粹分子，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德国人身份认同的一个明显的弱点是对本民族的极度关心。尽管有些人首先将自己视为人类的一部分，之后再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但许多德国人却迷恋（fetishize）自己的民族特征，被困在德意志民族性的牢笼里——即使这一切并非故意，也至少存在于潜在的假设和被排除的可能性之中。显然，通过惯性继承历史的包袱，比摆脱长期存在的认同要容易得多——即使对于我们中间那些希望帮助人类超越目前困境的人来说



也是如此。

随着二十世纪的结束，许多德国人在读到关于自治运动消亡的持续报道后松了一口气，并希望该运动最终屈服于企业的持久攻势。柏林正处于冷战后的建筑热潮中，而旧的自治社区正变得越来越士绅化（gentrified）。虽然在美国的激进主义圈子里是个传奇，但德国的自治运动从来没有超越它用以证明其正义的边缘性，而最终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

与此同时，由各种基层运动催生的绿党已经成为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在绿党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前激进街头斗士和自发分子（*Sponti*）——的纵容下，德国军队自希特勒时期以来首次驻扎在国外，德国重新回到了长期被剥夺的但任何“正常的”欧洲大国都认为理所当然的地位。德国在对英美进攻伊拉克投弃权票的同时，在打击塔利班的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与巴尔干地区强国合作。无论德国在从军国-帝国主义大国向支持和平与正义的国家进行质的转变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展，我们都要感谢自治主义者们。

欧洲的自治运动启发了美国人——而且不仅仅是在美国。自治运动的影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大西洋这边出现的黑群运动也许是最明显的。多年来，许多人询问为什么只有一本关于自治运动的英文书（我自己的书，《政治的颠覆（Subversion of Politics）》）。现在，在它首次出现的 20 年后，Geronimo 的《火与焰》，这本来自自治运动内部的第一本系统地研究该运动历史轨迹的德文文献，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该书的翻译恰逢 2007 年罗斯托克及其周边地区的反八国集团抗议活动中，“自治运动”的“重生”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兴趣。显然，尽管自治抵抗的火焰已经有所平息，但它的余烬很快又被煽起，变成了一场大火，在人们接受世界领导人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的表象下继续燃烧。

当我重读这本书时，《火与焰》让我想起，当德国年轻人踏上反对体制性权力的征程时，他们既遭受了来自国家根深蒂固的暴力和参与“通过体制的长征¹”的前同路人（比如绿党）的可怕镇压。尽管很明显，绿党通过加入政治建制的自由主义一翼而被收编，但德国公众离拥抱自治运动仍有一段距离。在东德改革后的前共产党员和厌恶社会民主党长期背叛自己基本信念的激进工会成员中诞生了新兴的左翼党。然而，这两个群体并不看好自治主义者们的反威权主义。我很想证明自己是错的，但对于自治主义者来说，近期内似乎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这与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扩大的行动空间

¹Der lange Marsch durch die Institutionen，共产主义学生活动家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于 1967 年提出的口号，旨在通过渗透各资本主义机构来制造革命条件。“长征”指的正是中国革命中的红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物理意义上的长征——后文若无特别标注，皆为中译者注



“团结就是力量——打倒剥削者！”

和新的占屋浪潮截然不同。

由职业活动家撰写，《火与焰》全面地揭示了从 1960 年到 1990 年的德国运动动态。在本书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德国的议会外反对派（APO）、法兰克福自发分子、共产主义者、反核运动、占屋运动、反对法兰克福机场扩建的运动、以及现在被神话了的位于汉堡的哈芬大街、反全球化、反战和反法西斯运动，以及武装斗争等等。甚至本书的某章还会写到意大利的自治主义。

然而，这些篇幅中基本上（而且有些明显地）没有提到妇女的自主斗争和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批评。我不会因为他遗漏了女权主义（这个词在文中没有出现过一次）而断定 Geronimo 有性别歧视。我很了解他——我们一起旅行，一起生活，爱过，笑过，而且，就像亲密的朋友那样，我们有时也吵过架。我可以保证，他已经明确了日常中对性别议题的态度：他既不认为自己比女性优越，而作为同志来说，也不会忽视她们。

他的非女权主义立场是基于对自治运动普遍性意义及其统一性的深思熟虑的政治评估——他觉得这受到了他所认为的“女性主义偏向性”的威胁。他没有在女性主义（或黑人和同性恋文化）的特殊性中理解普遍性，即我们都会从消灭父权制的斗争中受益，而是仅仅将普遍性定位在一个统一的运动中。在他的书的第一版中，他只写到了几段关于包括自治主义妇女运动的话题。诚实地下笔，他只能总结道：“因此，我不得不嘲笑我自己的无能，以及我永远不会理解一切这一事实，我只能试着与之共存”。

另一个削弱本书反响的缺陷是没有广泛地介绍该运动的国际性质。自治运动是从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高潮中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德国的活动家们也帮助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丹麦、法国、西班牙、捷克、瑞典和墨西哥——掀起类似的运动。该运动的国际性是其最重要的方面之一，但读者不会在本书中读到除了意大利之外的有关内容。

我本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对《火与焰》提出这些批评。我衷心地推荐这本书，并希望激进派们不仅仅是阅读，它值得研究和讨论，值得效仿和批判性的超越。

写于 2008 年 3 月，韩国光州

译者注与术语表

Gabriel Kuhn

《火与焰 (*Feuer und Flamme*)》这本书的翻译²基于此书由 ID-Archiv 出版社于 1995 年出版的第四版以及最终版³。一些回忆 20 世纪 80 年代自治运动细节的段落与自治运动的一般历史无甚关联，因此被略去。所有的这些省略之处都得到了原作者的认可。出于非德语读者的需要，人名或事件的简短说明被添加在方括号⁴内。

或许是因为自治运动中表现出的反学术倾向，德文原版资料中只包含了一些非常含糊不清的参考文献——翻译工作不可避免地要适应这种状况。

时至今日，对于德文 *autonome Bewegung* (movement) 中的 *autonom* 这部分依然没有标准英文翻译，“自治的 (autonomous)” 以及 “自治主义的 (autonomist)” 作为其英译通常可以互换使用。为什么本书中一贯使用 “自治的 (autonomous)” 有三个主要原因：

1. 德语中 *autonomistisch* 这个词最接近 “自治主义的 (autonomist)”，并且从来没有被用于有关 *autonome Bewegung* 的场合。
2. “自治主义 (autonomism)” 暗示了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而 *autonome Bewegung* 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一直保持对意识形态定义的拒斥。
3. 虽然意大利语的 *Autonomia* 明显影响了自治运动，但在许多方面，它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现象，它催生了自由马克思主义 (Libertarian Marxism) 思想之传统，这与

²英文版

³德文原版

⁴在中译本中则是圆括号

德国自治运动鲜有共同之处。因此，用英语对意大利自治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和德国自治运动进行区分似乎很有必要。

以下词汇表包括许多术语，尤其是书中经常使用的首字母缩略词，可能需要对非德语读者进行解释。

AL: Alternative Liste für Demokratie und Umweltschutz, 民主和环保替代清单。1978年成立于西柏林，在1980年代AL基本上充当着绿党在西柏林的分会之角色。

APO: 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议会外反对派。

BI: Bürgerinitiative, 公民行动是在基层的行动，其政治立场横跨保守到激进；它们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至今仍是德国民众政治中重要的一环。

CDU: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 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基民盟），德国主要的保守主义政党。

CSU: Christlich-Soziale Union in Bayern, 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同盟，基民盟的“姊妹党”。

DGB: Deutscher Gewerkschaftsbund, 德国工会联合会。

DKP: 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 德国的共产党。建立于1968年，DKP自称是德国共产党（KPD）的合法继承者，后者是德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党派，1956年被西德当局禁止。

FDP: 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 自由民主党，德国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

绿党: “绿党”最初是1970年代形成的各环保主义者和直接民主的基层倡议的活动家的总称。在1980年绿党（Die Grünen）成立以及相关的环保运动制度化后不久，这个词几乎专指绿党成员。

Jusos: Jungsozialistinnen und Jungsozialisten in der SPD, 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青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组织。

K 群: “K”指 *kommunistisch*⁵, 1960 年代学生起义后成立的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运动主力的总称。

KB: Kommunistischer Bund, 共产主义同盟，活跃于 1971 至 1991 年。见“K 群”。

KBW: Kommunistischer Bund Westdeutschland, 西德共产主义同盟，活跃于 1973 至 1985 年，见“K 群”。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国共产党。成立于 1919 年，于 1956 年被西德当局禁止。在东德，德共于 1946 年与德国社民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该党统治东德。

KPD-AO: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Aufbauorganisation, 德国共产党——结构组织。活跃于 1970 至 1980 年（自 1971 年开始以仅以 KPD 的名义进行活动）。见“K 群”。

KPD-ML: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Marxisten-Leninisten, 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活跃于 1968 至 1986 年。见“K 群”。

RAF: Rote Armee Fraktion, 红军派，1970 年成立的城市游击组织。

RZ: Revolutionäre Zellen, 革命细胞，一个独立的左翼团体网络，从事激进的直接行动，成立于 1970 年代；红佐拉（Rote Zora）是与其相关联的女性活动家网络。

六月二日运动: 建立于 1972 年的城市游击组织。

SEK: Spezialeinsatzkommando, 德国特别警察突击队。

⁵即“共产主义的”

SDS: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 1960 年代主要的激进学生组织。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 德国社会民主党⁶。

Spontis: 自发分子。派生自德文 *spontan* (即“自发的”), 自发分子们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 他们反对正式的组织, 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创造性干预, 具有强烈的文化、艺术和幽默元素。

西德和西柏林: 二战后, 德国被划分为四个区域, 每个区域由主要盟国之一控制, 即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柏林市也以同样的方式被划分。1949 年, 西方盟国控制的地区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BRD/FRG⁷)。不久之后, 苏联地区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DDR/GDR)。虽然苏联控制的柏林部分 (东柏林) 是东德的首都, 但西柏林获得了特殊的地位, 它与联邦德国密切相关, 但并未完全融合。虽然首字母缩略词 BRD 和 DDR 在德语中仍然被广泛使用, 但“联邦德国 (FRG)”和“民主德国 (GDR)”很少出现在官方文件之外的英语中。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本翻译中使用了更常见但不太正式的术语“西德”和“东德”。需要注意的是, “西德”不一定包括“西柏林”⁸。

⁶亦是德国主要的中左翼执政党之一

⁷前者为德文首字母缩写, 后者为英文首字母缩写, 下同

⁸事实上, 西柏林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非联邦德国在民主德国的飞地而存在

英文版序

“即使所有幻想破灭，你也必须继续潜伏。”（约翰内斯·阿格诺里，1990 年）

当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写这本书时，我本打算对自治运动内部流传的关于其历史和组织的一些想法进行“简短的批评”。

当时，我深入参与了反核运动的激进左翼和反对 1988 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峰会的运动。我反思了与“自治”一词相关的对理论和实践的理解。

由于“火与焰”是自治运动游行中经常喊出的口号，我想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标题，因为它已经成为了该运动的一个缩影。（当然，自治主义者希望“火与焰”是反对德国国家，而不是针对作为避难者家园的德国的——这是 1990 年代初纳粹和种族主义者所青睐的方法，这使得他们能在没有国家监管的情况下进行他们的勾当）。

1990 年 5 月 1 日，在一个曾经被称为西柏林的地方发生了合法但“革命”的自治游行，《火与焰⁹》的第一版及时出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虽然这本书评论寥寥，但被热切地阅读。1995 年，出版了一个更简明的版本，本译本¹⁰正是基于此。

本书重点介绍了 1967 年至 1990 年冷战第二阶段西德自治主义者的历史。冷战时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这堵墙曾经被误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墙”。自治主义者的本能反应是迷人的。在柏林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次非法游行中，他

⁹德语原版

¹⁰英译版本

们高呼：“西方更加高明：他们用金钱筑起高墙！”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后美国总统宣布的全球反恐战争时代，这仍然是现状，而且看不到尽头。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灾难和战争的时代，没有和平的位置存在。同时，改革派不断呼吁“文明化”资本主义——这只能表明我们生活在野蛮之中。

化名出版《火与焰》与阴谋论无关。这是改掉我自己在一些公共问题上做作风气的一种务实方法——这一点我仍然坚信不疑！然而，这个决定也反映了自治的悖论，即尚未解决的等级制度和领导问题。自治主义者们没有指挥官（*comandantes*），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不应该有。至少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还尚未实现的解放社会里。

约翰内斯·阿格诺里（Johannes Agnoli）同志说了一句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话。“自治主义者们做错了一切，但他们给了我们希望”。事实上，抛开一切必要的批评，考虑到 1960 年代学生起义结束后西德的情况，自治主义者完成了令人惊讶的政治创新。自治的思想和理论以一种极为强大的方式拒绝了包括秩序和服从概念在内的一切做法。这仅仅是为了维持其必要的自持。它也创造出了相较于纯粹的民主或反法西斯斗争——更加不同的斗争形式。

自治原则超越了德国有组织的自治运动的限制，事实上，它不断受到威胁：从外部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有时被公开或隐密地处刑；从内部受到心胸狭窄的白痴的威胁，他们追求的政治身份概念既牵涉到对专制制度的服从，也涉及对行为规训¹¹。不！在反对既不公正也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的斗争中，以被误解的即时性（misunderstood immediacy）为由将内部组织限制在“体面的行为”上是不对的。当然，这永远不会排除对那些有需要者的帮助！

在内部矛盾的基础上思考和行动仍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就是我们约翰内斯·阿格诺里同志在工作中所做的。

本书的出版表明仍然有人对《火与焰》感兴趣。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提醒我，贫穷、失业、战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生态破坏和性别歧视仍然需要被大众的幸福和解放所取代。

本书所附海报来自位于柏林和汉堡的“海报数字化集体（poster digitalizing collective）”HKS 13，皆于 1998 年至 2001 年间收集，HKS 13 代表专色红色¹²。所有海报都来自西柏林和西德以及 1967 年至 1990 年间，只有一张除外：下面的图片是由巴黎一个艺术团体在 2001 年设计，并作为对 1999 年西雅图世贸组织峰会出现暴乱所引发

¹¹ 此处英文为“therapy”，直译为“疗法，治疗”，如果直译为“行为疗法”，则难以明确体现统治系统下对人行为上的政治性“治疗”，因此采取来自福柯权力理论的“规训”一词。

¹² 印刷品使用的专色油墨代号

的反全球化抗议的贡献。资本主义系统的视觉表象无情地绑架了真理。愿这一认识引导自治运动超越自身的局限，走向不同的、更好的生活。

Geronimo, 汉堡市阿尔托纳区, 2011 年夏。



背景

今天，也就是 1990 年代仍然存在的自治主义运动，在 1950 年代是不存在的 —— 处于 “经济奇迹 (*Wirtschaftswunder*)” 中的联邦德国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 内不存在，瓦尔特 · 乌布利希的斯大林主义民主德国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内也不存在。自治运动是 1968 年各种起义的直接产物，这些起义主要由学生运动构成并由此诞生了所谓 “新左翼 (New Left)”，这股力量的发展来源于对党派与工会政治以及传统工人运动政治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还逐渐蔓延到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东欧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南欧无政府主义中的一些元素上。与二战后西欧被重建的资本主义环境以及传统工人运动的遗产不同，学生运动将自己看作反威权主义。此外，1968 年起义还包括女性对男权支配的反抗。对 “社会主义枢机主教们 (socialist eminences)” 的批判激发了一场自治且自组织化的女性运动，这场运动代表了对日常生活、主体性以及政治关系的全新理解。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工人们与汽车工厂的雇佣制度以及资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在整个欧洲产生了连锁反应。

今天的自治运动只能在新左派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它至少持续到 1989 年西德的终结。从欧洲的角度来看，1980 年代西德自治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可以被看作是 1970 年代末意大利自治运动被粉碎后的 “第二波自治斗争”。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自治运动” 可以被看作是 1968 年起义后的下一代反叛形式，这一代人试图恢复其先驱者的激进政治和文化要求，以挑战 68 世代的活动家们身上日渐增长的虚伪。这也意味着 “自治运动” 带着西德二十多年来激进左翼和反议会政治的所有缺点、不足和矛盾 —— 以及所有的希望和成功。

自治运动的政治起源可以在议会外反对派 (*Außer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PO*) 解体后变得特别有影响力的思潮中找到：自发主义者、意大利工人主义 (*operaismo*¹³)

¹³ 在帕尔米罗 · 陶里亚蒂于 1944 年提出萨勒诺转折 (*Svolta di Salerno*) 后，意大利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开始趋于温和，并在 1950 年代的菲亚特罢工和学生示威中站在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在此背景下，脱离左翼政党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学生工人重新发扬马克思的主张，认为 “工人阶级的斗争先于并预示着资本的再结构”，呼吁对工人和无产阶级状况

和作为城市亚文化的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圈子。随着这些思潮在 1970 年代中期开始解体，自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转变为德国的替代运动（alternative movement）。1977 年的德国之秋，由于红军派（RAF）的行动而引发的严重的国家危机，以及随后其领导层在监禁中死亡，进一步加强了群众对传统形式激进组织的普遍怀疑。拒绝领导集团，强调所谓的“第一人称政治”、直接行动、直接民主，以及建立“反公共（*Gegenöffentlichkeit*）”¹⁴成为了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的支柱。

这些运动的兴起与 1970 年代 K 群¹⁵在 1968 年起义失败后的衰落息息相关。对 K 群政治的拒绝成为了 1970 年代反威权主义激进分子自我认同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 1970 年代中期在西德涌现的自发分子和‘城市印第安人（Urban Indians）’，‘自治’这一概念在文化政治舞台上变得愈发重要。”这些讨论的核心出版物有西柏林的《故障信息（Info-BUG/Bug-Info¹⁶）》、法兰克福的《信息服务（Informations-Dienst）》，以及《自治。以及反对工厂社会之材料（Autonomie. Materialen gegen die Fabriksgesellschaft）》。在此，我们发现了 1980 年前后一个独立的自治运动的种种开端（beginnings）。”（M. Manrique）

可以说，自治运动是作为新社会运动中的一个政治和行动上激进（radical and militant）的分支而形成的。尽管与 1968 年的起义有历史关联，但几乎没有任何个人联系，许多自治活动家似乎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运动所根植于的历史。因此，本书的目的是勾勒出一个历史轮廓。对“自治”一词将不作深入研究。尽管如此，这里有一些介绍性的评论：

两百年前，“自治”一词已经被伊曼努尔·康德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人分析过，闪耀着资产阶级启蒙的光辉。1980 年代的我对此有所了解吗？不。不幸的是，彼时我的好奇心还不足以把我带回那么久远的历史。然而，我将这些写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自治”一词最终值得进行更详尽的研究。在日常使用中，它已被简化为“独立”的同义词。但是，不断强调诸如“独立”之类的模糊概念的重要性——却从未澄清我们想要独立于什么，以及为什么——是一种相当空洞和脆弱的冒险。今天，在二十一

进行更深入、更现实的重审，并通过《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和《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等激进刊物广泛传播其理念。工人主义的斗争在 1969 年“火热之秋（Autunno caldo）”运动中达到顶峰，并直接启发了 1970 年代兴起的意大利自治运动。工人主义后来被法国左翼共产主义团体“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他们最为人知的成员之一是情景主义者居伊·德波）”传播至法国，并受到斯大林主义者、苏共及其卫星党的批评。由公众号“彼得格勒来信”翻译的《黄金暴徒：意大利战后革命浪潮（1968-1977）》，你可以在这本书中获取有关工人主义的更多信息。

¹⁴ “反公共”描述了一种社会活动的形式，它故意与“主流”公共领域相对立，以使被忽视和被压制的问题、议题或社会群体能够被普遍感知。

¹⁵ 见术语表。

¹⁶ 其中，“BUG”一词为 Berliner Undogmatischer Gruppen，即“柏林非教条主义者团体”

世纪的门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彼此，因此也更加不独立（dependent）。在歌颂“自治”时忽略这一点，培养一种不加批判的“独立”崇拜，只会再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自我主义价值观。它反映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社会互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方式！事实上，不加批判地接受“独立”导致自治运动内部产生了对其队伍十分有害的行为。

博多·舒尔茨（Bodo Schulze）为“自治”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定义：“‘自治’是一个脆弱的东西。或者说：自治什么也不是。它代表了人们之间某种形式的关系，这些人们为了摧毁一切形式的压迫而结成同盟。这是一种无法从理论上把握的关系。理论只能针对自在和自为的（exist in and by themselves）现象而形成。只有当人们开始成为主动的革命者时，‘自治’才会存在”。

有时，“自治”的概念被视为“意大利输出产物”，原本具有“无产阶级特征”，后来转变为“典型的德国形式：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事实果真如此吗？

也许约翰内斯·阿格诺里对“自治”的定义可以帮助我们。它基于 1970 年代中期意大利和西德两国的激进经验：

我所说的自治是阶级自治……这种自治形式有两种含义：首先，它是阶级运动，是劳工反对资本的运动，是作为生产主体的工人反对将工人作为价值增值客体的运动。与此同时，自治超越了工作场所：它描述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将每个人都沦为消费对象的群众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自治都意味着试图将自己从资本逻辑中解放出来……自治并不意味着拒绝组织原则。这意味着拒绝某种形式的组织：一种将组织的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的形式。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采用这个定义，我们都必须意识到一点：许多以前和现在活跃的同志都有把自己的经历普遍化的倾向。这是一种赋予自己的行动主义以特殊意义的方式——至少在事后看来是这样。这可能会让一些同志自鸣得意，但没有理由让其他人必须同意他们的观点。让我们以那些强调自治运动的意大利起源的人为例。对于德国的自治运动来说，这些真的是唯一重要的起源吗？这场运动难道不是同样植根于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国内发展起来的运动，即使当时没有使用“自治”这个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1950 年代摇滚音乐会的“流氓无产阶级暴动（lumpenproletariat riots）”，1962 年慕尼黑的所谓施瓦宾暴动（Schwabing Riots），或者 1960 年代中期颠覆行动（Subversive Aktion，一个古怪的活动家团体）的英雄事迹。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德国自治主义的幽灵并不是简单地从意大利引入的，它比人们以为的要早得多。事实上，自治政治似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让权贵们头疼不已，夜不能寐。无论如何，自治运动在当代历史的开

端最晚可以追溯至 60 年代末的政治辩论和冲突。

描述自治运动（Autonomen）的另一个困难来自对诸如“自治运动（autonomous movement）”、“左翼激进主义”或“自治运动的政治力量”等术语相当随意的使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放弃对“自治（autonomy）”和“自治运动”的静态定义的另一个原因。自治运动是一种多样化的动态现象，任何静态的定义都会显得既随意又专制。此外，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激进左派从来没有一个共同的平台，既无统一的出版物，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它包含了许多自发的、个人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时刻，这让我们很难提出一个编年史。相较于在文件堆中整理行动报告，同志们有更有益的事情要做。此外，一些人退出舞台，另一些人则投身与各种各样的新项目。虽然这让书写该运动的历史变得困难，但这也意味着该运动拥有各种各样的行动形式和方法，保证其不被既定的政治权力工具化。总之，我们可以说，1960 和 1970 年代的激进运动基础让自治运动清晰地与传统工人运动组织形式相区别，正如其有别于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和理论一样。

为了使本书更加结构化，它被分为三个部分：1968 年反叛、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当然，这些分类是简化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也远非清晰。然而，我希望它们能够提供一个框架，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某些发展之间的联系。本书中的所有内容都是相互关联的。

第一部分

西德自治政治的兴起

革命体验：1968

“今天，存在着实现我们命运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物质上终结饥饿、战争并对达到了对物的绝对掌握已成为可能的程度。这一切都取决于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自觉意愿……”（鲁迪·杜奇克，1967年6月）

在 西德以及国际上，1968年标志着一个后二战历史上重要的断裂。在1966年到67年之间，当所谓的“经济奇迹”结束之时，西德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在议会层面，社民党（SPD）和基民盟（CDU）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他们共同制定了一部“紧急宪法”，在“危机状态”下，允许暂停所有的公民自由并实施不再由议会控制的“紧急政府”。左翼自由派（left-liberal）公众、工会和学生认为这是迈向“威权国家”的可怕一步：一个没有民主人士和反对派的“民主国家”。

在国际上，68运动的特点是重要的政治发展和强大的学生运动：发生在美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墨西哥、日本等国家。1968年4月，越共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新春攻势（Tet Offensive），挑战了全世界对美国军事和政治领导“不可战胜”的认识。1968年5月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人们在内城设置街垒并战斗，促使法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布拉格之春”则唤起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希望。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德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派认同自己为国际革命起义的一部分。

学生反叛

1960年代初，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发现自己很难在大多数自满和保守的学生中组织起来。1961年，社学联被社民党除名，因为它拒绝跟随该党完全融入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体系。随后，社学联成为西德和西柏林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在 1960 年代中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学民主化和国际主义团结是社学联的工作重点。在 1950 年代后期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成为国际焦点后，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其他解放斗争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越南的解放斗争。在西柏林，社学联组织了他们的第一次公开的国际声援行动。他们开发出全新的抗议形式——与阿登纳时代（1949 年至 1963 年的德国总理）仪式化的“葬礼游行（funeral marches）”大不相同——并将抗议变成了实际抵抗和冒险的空间。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是社学联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宣扬非法的群众行动是个人和社会转型的必要手段。学生们与准备不足的警察部队进行街头斗争，并成为强大而反动的施普林格（Springer）媒体帝国的头号敌人。

1967 年 6 月 2 日，伊朗沙阿¹⁷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抵达西柏林进行正式访问，西柏林的事态发展进入了高潮。秉持其国际主义姿态，社学联组织了抗议活动以反对德国当局接待这个罪行累累的谋杀犯。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历史上，国家安全机构首次进行了“紧急行动”。万余名警察召集起来保护这位尊贵的客人，数条高速公路被关闭，以保证沙阿的安全通行。

6 月 2 日，两千人在德国歌剧院前进行了和平抗议。其中大部分是被社学联，在柏林自由大学举办的关于伊朗独裁统治的活动，所动员起来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抗议者们用口号“凶手”、烟雾弹和鸡蛋迎接沙阿。作为回应，他们先是遭到了伊朗特勤局特工的铁棍袭击，然后又遭到了德国警察的攻击，他们残忍地驱散了抗议。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本诺·奥内索格（Benno Ohnesorg）因后脑勺中弹而身亡。当一名警察被抗议者杀害的虚假谣言开始传播时，柏林参议院宣布全面禁止整个城市的示威活动。在国家当局和施普林格控制的出版物的煽动下，对反对派学生的敌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学生们成立了自己的调查委员会，披露了警察的行为和本诺·奥内索格之死的真相。他们形成了某种类似于委员会的结构，组织了许多信息活动，并设法——至少在某些日子里——创造了一种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以挑战国家的孤立和镇压策略。在施普林格出版社的经历引发了社学联内部对直接行动的首次讨论，并在“夺取施普林格”的口号下展开了一场运动。

学生反叛和议会外反对派

直到 1967 年前，学生运动都集中在西柏林。它在 1968 年才扩展到西德。那一年既标志着运动的高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广泛的议会外反对运动——也标志着它的

¹⁷Shah，波斯语国家的统治者头衔



右上角：“夺取施普林格！”

左下角：“柏林只能是柏林！”

消亡。

二月，“国际越南大会”在柏林技术学院的主报告厅聚集了几千名与会者。这是社学联多年来开展国际主义团结工作和支持越南抵抗斗争的顶峰。社学联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反制西德媒体的宣传，传播自己关于美帝国主义和越南局势的信息。在大会上，社学联被认为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它将“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主义斗争联系起来。2月17日通过的最终共同决议指出，“这个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正在进入从抗议到抵抗的过渡阶段”。会议讨论了为越南抵抗提供物资和破坏美军设施的问题。“粉碎北约”被宣布为一个长期目标。大会结束时，数万人举行了国际主义游行。这是柏林分治后，西侧的街道上第一次挂满了红旗。许多抗议者在法国的“无产阶级左翼（Gauche Prolétarienne）¹⁸”的启发下，手挽着手组成人链。

4月11日，发生了一起针对鲁迪·杜奇克的暗杀企图。在此之前，施普林格的出版物对杜奇克进行了数月的诽谤。在后来的复活节假期中，西柏林和西德发生了历史上最激烈的街头战斗——特别是在施普林格印刷厂前设立的街垒中。在西柏林，两千余名抗议者试图冲进施普林格总部。数辆货运车辆被放火烧毁。总共有六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两万一千名警察执勤，一千多人被捕。

抗议者人数众多，引发了关于抗议与抵抗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在左翼杂志《Konkret¹⁹》的5月刊中，乌尔里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²⁰）写道：“抗议意味着表明你的厌恶，抵抗则意味着确保你厌恶的东西消失……在复活节假期期间，言语抗议和身体抵抗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

反对施普林格的抗议活动不仅有大学生参与，还有高中生和青年工人。起义的学生首次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这一点在1968年5月1日得到了证实，当时在西柏林和西德各城市，在德国工会联合会（DGB）五月的官方活动旁组织了议会外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在西柏林，有四万人参加了议会外反对派的游行示威。然而，学生和部分工人阶级之间的政治纽带是短暂的。在反对紧急状态法案的斗争中，这种纽带无法得到维持。虽然“紧急状态与民主”——一个由工会成员、知识分子、学生代表、甚至个别社民党成员组成的广泛联盟——设法动员了六万人参加5月11日的“波恩游行（March on Bonn）”，但学生们关于总罢工的要求被工人运动拒绝了；只能组织一些地区性的示威罢工。尽管在法国事件²¹的激励下，学生在工厂外进行了热烈的鼓动，但

¹⁸无产阶级左翼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毛主义-自发主义组织，存在于1968年至1974年。克里斯托弗·伯勒（Christophe Bourzeiller）说，“五月风暴后，在数据上以及文化影响上，最重要的毛派组织无疑是无产阶级左翼”。

¹⁹意为“具体的、实在的”

²⁰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

²¹或指五月风暴

INTERNATIONALE VIETNAM-KONFERENZ WESTBERLIN

Koordinierung anti-imperialistischer Aktionen in Westeuropa



**17. Februar 1968, 11.00 Uhr, Auditorium Maximum der TU
DER KAMPF DES VIETNAMESISCHEN VOLKES UND DIE GLOBALSTRATEGIE DES IMPERIALISMUS**

- Forum I Die vietnamesische Revolution
- Forum II Vietnam und die Revolution in der Dritten Welt
- Forum III Der anti-imperialistische und anti-kapitalistische Kampf in den kapitalistischen Ländern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18. Februar 1968, 1 vom Rathaus Sch

GROSSKUNDGEBUNG mit

S. de Beauvoir (Frankreich), D. Dillinger (USA), R. Dutschke (SDS), C. L. Guggemos (Kampagne für Demokratie und Abrüstung), Melva Hernandez (ZK der KP Kuba), E. Mandel (Belgien), D. Smith (Black Power SNCC, USA), Peter Weiss und Vertretern der FNL

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Studentenbund
Kampagne für Demokratie und Abrüstung (Regional-Ausschuss Berlin)

“国际越南会议在西柏林召开：协同起来反对西欧的帝国主义行动！”



“为了越南革命的胜利——革命是每个革命者的职责。”

学生和工人之间始终没能建立起紧密的合作。与法国和意大利不同的是，工人自己没有组建起革命团体，议会外反对派也很难在工厂里站稳脚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工人阶级动员的困难导致德国新左翼内部出现迥异的策略。

社学联的政治

从 1965 年到 1969 年，社学联 (SDS) 内部的讨论主要包括社学联活动主义的心脏位置，即西柏林和法兰克福，与另一边，即汉堡、基尔、科隆、马尔堡、海德堡、蒂宾根和慕尼黑等“地方的 (provincial)” 社学联活跃城镇之间的交流。在政治上，冲突围绕着“传统派”和“反威权主义派”展开。

“传统派”包括所有追随工人运动中正统 (orthodox) 共产主义一翼的所有派别。1968 年 9 月，德国的共产党 (DKP) 成立，它是 1956 年被取缔的前德国共产党 (KPD) 的继承者，马尔堡和科隆的社学联团体几乎全部加入其中。

另一方面，“反威权主义派”坚定地扎根于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y)、左翼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这意味着不能仅仅简单地发掘出德国工人运动历史中被边缘化的那些元素。在无数次代表大会和讲座中，反威权主义者发展了新的理论方法，并为新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基础。他们的理论在形式上更像是一种工具箱，以实际效用为主要标准，并为即兴创作提供了大量空间：挑动社会的心弦可比教条更重要。

反权威主义派中最有名的发言人是鲁迪·杜奇克 (柏林社学联) 和汉斯-尤尔根·克拉尔 (Hans-Jürgen Krahl, 法兰克福社学联)。杜奇克的思想受到构境主义国际²²的强烈影响。他在 1960 年代中期加入社学联，是颠覆行动 (Subversive Aktion) 的成员。而克拉尔的理念是基于他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讨论。

对反威权主义潮流的主流印象是柏林一号公社 (Kommune 1) 的行动。其成员实行挑衅般 (provocative) 的集体生活，他们嘲笑自由大学的教授是“心胸狭窄的傻瓜”、用布丁攻击美国副总统、投掷油漆炸弹、散发传单要求烧毁购物中心，并上演嘲笑法庭的“莫阿比特 (Moabit) 肥皂剧”(许多政治审判都在柏林郊区的莫阿比特举行，那里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一号公社的政治永久地号召着行动，不仅要与国家和社会作斗争，而且要改变自己。最终，一号公社的成员被柏林社学联开除。传统派以其特有的“客观理性”指责他们是“唯意志论、逃避主义和装腔作势 (voluntarism, escapism, and pretense)” (Mosler)。

然而，在 1967 年 9 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社学联第二十二次代表会议上，杜奇克和

²²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一个更常见的译名是情境主义国际



克拉尔的反威权主义立场占了上风。他们在共同发言中说“社学联的许多同志不再愿意接受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的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果我们不想被同化（assimilation）和变得犬儒，那么就需要以游击队的心态被当下的制度环境所拒绝”。

会议结束后，“此时此地（Here and Now）”和赫伯特·马尔库塞²³的“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反威权主义观念主导了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派的行动。但事实证明，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反威权主义潮流的模糊性反映了学生反叛的起源：左翼运动内部普遍缺乏的政治明确性。大多数时候它只不过是一种分散但引人注目的解放思想，将人们吸引到街垒之上。

在 1968 年 5 月 1 日的反施普林格行动和反对紧急状态法案的斗争中，议会外反对派动员潜力的局限性愈发明显。同时，社学联开始分裂，不再能够制定任何令人信服的方针和战略。

11 月初，在法院对一名激进的律师提起诉讼后，一千名议会外反对派在西柏林与警察的街头斗争中取胜。许多人认为，“泰格勒路（Tegeler Weg）之战”是对他们多年遭受的警察暴行的报复之夜。然而，与国家的激进对抗并没有政治前景。

社学联的衰亡

在 1968 年汉诺威举行的社学联代表会议上，组织内部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使得建设性的辩论无法进行。特别是在议会外反对派传统的活动中心，西柏林和法兰克福，外围（second-tier）社学联成员要求解决组织危机。柏林社学联和海德堡社学联各派别的讲话已经阐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团体德国共产党-结构组织（KPD-AO）和西德共产主义同盟（KBW）的计划。这些理念受到了反威权主义派的严厉批评（克拉尔：“社学联没有坚守共产主义工人政党的传统！”），但社学联的解散已无可避免。在 1969 年 9 月工人罢工的记忆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理念对许多激进学生来说变得很有吸引力。革命政党被认为是在西德实现真正社会转型的必要手段。

在西柏林，激进运动瓦解得非常快。1968 年由议会外反对派在大学、中学、工厂和社区建立的基层委员会几乎都不复存在，特别是在生产领域。大多数学生活动家回避了工厂里“乏味”的日常工作。最终，这造成了大学和工厂委员会之间的严重疏远，导致了不同的议会外反对派派别和领导集体的形成。在 1969 年底的一次会议上重建共同纲领的尝试失败了。

²³Herbert Marcuse，德国第一代新左翼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曾服务于中情局前身的战略服务办公室和美国的中欧负责部门。



最终，社学联的传统派基本上被德国的共产党吸收了，而反威权主义阵营则严重分裂——一些人抛弃了反威权主义信念，成立了毛主义甚至斯大林主义政党，另一些人则继续回避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组织。由于社学联的女性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并形成了新兴的自治女性运动的基础，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激进基层思潮

不少基层思潮是 1960 年代末起义的一部分，但从未与社学联相关。他们主要由独立的大学生、高中生、学徒和青年工人组成。这些街头活动家相当激进（militant）：

基层潮流以各种名称分布在各地：西柏林的游荡散兵（drifting hash rebels）、法兰克福地区的黑豹党团结委员会（Black Panther Solidarity Committee²⁴）、汉堡和汉诺威周围的白玫瑰（Weiße Rose²⁵）和逃兵团体、海德堡的社会主义患者集体²⁶。他们的行动也是多种多样的：支持逃离军队的美国大兵和德国士兵，攻击盟国的设施，参与反对劳改所、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直接行动，破坏葡萄牙殖民政权的武器生产，从国家恐怖分子²⁷的外交使团中删除文件，偷窃和出版秘密文件，干扰警察的调查机构，为替代项目（alternative projects）安排资金（K.H. Roth）。

基层潮流最清晰地代表着议会外反对派运动内的“颠覆精神”。他们攻击“德国人的勤奋”和“德国人的工作道德”，许多同志拒绝职业化的想法和对制度的终身服从。对“成就”的公开蔑视是 68 运动的核心部分之一。

²⁴由卡尔·迪特里希·沃尔夫（Karl Dietrich Wolff）于 1969 年建立

²⁵“白玫瑰”这一称号可以追溯至 1943 年纳粹德国的一个非暴力反抗组织，其中包含了许多慕尼黑大学的师生。而此团体之所以为人所知乃是因为其于 1942 年 6 月至 1943 年 2 月间陆续发送了 6 张未具名的传单，主要内容在于呼吁人们参加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运动。东德的许多街道都以其领导人的姓名命名。中译者尚未查到战后的白玫瑰组织与其有任何直接关联。

²⁶Sozialistisches Patientenkollektiv, SPK。其思想纲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把疾病变成武器”，由沃尔夫冈·胡贝尔（Wolfgang Huber）于 1970 年 2 月在西德海德堡创立，后演变成患者阵线/社会主义患者集体，PF/SPK(H)。SPK 认为疾病的存 在是不可否认的，但其是资本主义体制所造就的。SPK 认为疾病是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并认为疾病是人类物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SPK 反对医生，认为其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应对毒害人类负责。PF/SPK(H) 最广为人知的文本是公报《SPK：将疾病变成武器》，胡贝尔与让-保罗·萨特为其作序。

²⁷State terrorists，这个概念应该引申自“国家恐怖主义”，指对外国和本国国民实行恐怖主义手段的国家。

68 运动意味着什么？

学生起义打破了二战结束以来西德僵化的反共氛围（consensus）。直接行动和关于社会胁迫的认识破坏了这个国家晚期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它还使被“经济奇迹”这一意识形态所掩盖的愈演愈烈的阶级差异变得明显。

叛乱带来了一种新的、毫不妥协的政治道德。叛乱分子反抗的是将自己描绘成不自觉的历史受害者，同时又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负有责任的那一代人。新生代决心把历史视为有意识的主体，从而改变日常生活。他们将法西斯主义在西德的延续看作一个公共问题。

1968 年叛乱给西德和西柏林带来了新的问题和要求。它“阐明了一种文化上的不适，它披露集体压制的过程，它要求政治伦理，它批评压抑的性行为，以及充斥消费者和逢场作戏的陈腐社会规则”（Kraushaar）。

在 1968 年的春夏之交，起义从大学蔓延到其他社会领域，并与工人阶级青年的颠覆情绪（subversive sentiment）相融合。从好的方面来看，1968 年起义是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al）元素的结合，它构成了对西柏林和西德现有秩序的激进反对。

革命的唯一解决方案²⁸：意大利自治运动

我们今天在德国所了解的“自治政治”的概念，毫无疑问被意大利 1960 和 1970 年代学生、工人与青年的起义所影响。这些所谓的自治运动包含了工厂中的颠覆与战斗行动以及社区斗争，这些活动独立于传统工人组织而被组织起来，特别是北意大利，学生和激进工人的一系列行动构成了一次共同斗争。激进的德国议会外反对派（APO）活动家开始紧密地跟进这些发展。

1960 年代的意大利到底发生了什么？

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义的意大利工人和学生，面临着与德国工人和学生相比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意大利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中最弱的成员，它处于欧洲的外围。在国际分工中，意大利没有占据重要地位，此外，意大利被结构性地分为两部分：北方的特点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人组织为基础发展的经济，而南方经济仍然是深度农业化和部分封建的。

意大利的阶级斗争是学生们和来自大工厂的大部分非熟练装配线工人的共同努力。与意大利共产党（PCI）以及意大利社会党（PSI）结盟的工会成员和左翼知识分子为这些学生跟工人提供了理论武器，特别重要的是像拉涅罗·潘齐里（Raniero Panzieri）、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罗马诺·阿尔夸蒂（Romano Alquati）和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的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文章最初发表在《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杂志上（1961-64），在一次分裂之后，改到一直存活至 1967 年的《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杂志上。

在 1950 年代末试图重振意共和社会党的努力失败后，上述知识分子将批判的重心放在工人运动的官方机构上，并强调了体制外政治组织的潜力。1959 年末，潘齐里离开罗马的社会党总部前往都灵，以便“重新审视工厂里的工人阶级”（Rieland）。1962 年，

²⁸ 原文为意大利语

数千名菲亚特工人与警察在都灵的法律广场（Piazza Statuto）附近爆发了持续数天的激烈冲突。潘齐里和他的盟友们认为，这证实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的预测，这是一场对传统工人组织进行的改良仲裁毫无兴趣的斗争。事实上，在签署集体劳动协议之后发生的工人暴动，并没有得到行业工会的背书，这只会加深工人与其官方代表之间的分歧。这些斗争展现了一类不再具有老技术工人特征的新型劳动者——大多数抗议者是不熟练的流水线工人，他们最近从南部移民到意大利北部。广场上的冲突体现了意大利工人阶级内部的转变。

从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主义

意大利的发展导致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Orthodox Marxism）的重估和日渐增长的批判，而正统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对《资本论（*Das Kapital*）》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的新解读被用来挑战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在开展工人斗争方面的主张。重点从在政治斗争中充当调解人的组织转移到政治斗争本身的主体：工厂和社区中的工人。后来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被称为“工人主义（*operaismo*）”，在当时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最激进的左翼批判。

工人主义揭示了日常资本主义在工厂和街区的暴力。它对将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发展不感兴趣——而这是传统工人组织所倾向的方法。在工人主义的理论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全否定。工人主义者们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提出了一个“战略逆转”：不是资本而是工人阶级的发展决定着资本主义。因此，革命战略只能以无产阶级的“主观因素”为基础，因为劳动力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唯一无法控制的因素。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只能通过工人的自觉行动来克服。

对工人主义者来说，革命的主角不再是熟练工人，而是装配线上非熟练的大众工人（*operaio massa*²⁹）。他们要求工人直接控制工厂的劳动过程。这被认为是革命的社会变革的核心工具。在 1968 至 1969 年的叛乱中，工人主义者的理论方法与大工厂中流水线工人的日常经验相照应。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工厂和社区斗争形式，这也是因为意大利特殊的社会条件：在其他西方国家中，意大利有着南北冲突³⁰、根深蒂固的武装抵抗法西斯之传统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特别是在菲亚特工厂——“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心脏”——流水线工人只不过是大规模生产的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无休止执行最原始任务的单调导致许多工人在社会

²⁹这个词语在更广泛的语境下也可以被翻译为产业工人或工人群众

³⁰以都灵-米兰-热那亚三角区为核心的意大利北部工业区拥有发展更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工业体系，因而立场相较以农业为主的意大利南部地区更加进步，故在政治议题上南北时有冲突。

和心理上的疲惫。作为生产活动的劳动已不复存在。工人的愤怒不再仅仅针对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也针对劳动的组织。有时，传统工人组织完全失去了对造反的流水线工人的控制——后者在各地涌现的基层委员会中组织起来。临危受命的代表们被派往大型工人集会。工人们的行动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不可预测性和战斗性：出现了野猫罢工³¹，辅以有效的怠工破坏，成功地瘫痪了广泛的生产领域。工厂里也出现了广泛的旷工。斗争在 1969 年秋天达到了顶峰，在工资纠纷期间，工人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总罢工，而在都灵举行的声援示威聚集了六十万金属工人。

从大众工人到社会工人

最终，传统工会通过改变工会政治，成功地重新整合了自治工人运动。许多基层委员会被纳入工会结构的最低层。部分原因是 1969 年秋季自治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领导权真空。这让传统工会在自治斗争中获得了立足点。1970 年，意共以“从工厂中斗争到为改革而斗争”为口号下开展运动。

意大利北部工厂的冲突仍在继续，但激进斗争已过高峰。统治阶级在国内制造了一种反动氛围，公然将特勤局行动（的后果）归咎于自治左派——例如，1969 年底在米兰一家银行发生的爆炸案造成 16 人死亡。这种策略将意大利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群体——意大利南部的失业者、小农、农村无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等等——联合起来，以反对革命者。

尽管出现了反动，自治工人运动仍然控制着大工厂的部分生产过程。这导致了数年来具有针对性的运动，旨在分散生产过程以破坏自治工人的影响。

1973 年，工人权力（Potere Operaio），60 年代最大的激进工人团体解散了。它不再能够对资本的新战略做出有效的反应。菲亚特启动了大规模的重组，在工厂内几乎没有遇到阻力，因为它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外。公司开发了工业机器人，并将生产过程外包和分化。这些措施在工人力量的中心——即生产场所——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分化和自动化的进程导致正规部门的工作岗位急剧减少，小工厂和家庭生产大幅扩张。像内格里这样的理论家用分散工厂（*Fabbrica diffusa*）一词来描述这一发展。这包括“边缘无产阶级（marginal proletariat）”的巨大增长，它成为意大利经济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1970 年代末，边缘无产阶级约有 900 万人。它主要由青年和由于权力下放过程而失去稳定工作的年长或抱恙的工人组成。他们只能得到非全日制合同，并经常被解雇，因此依赖国家补贴。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学者，他们在 1960 年

³¹ “野猫罢工”指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野猫罢工迅速、突然、富有战斗性，即使在大部分具有合法罢工权的国家中也属非法，且通常因为缺少罢工资金和工会支持而被快速镇压。

代的教育热潮之后，进入了长期以来已经饱和的劳动力市场，例如国家官僚机构。许多大学毕业生根本没有工作。

仍然以在传统工人组织之外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为目标的歌剧家们，将其重点从1960年代的“大众工人（*operaio massa*）³²”转移到“社会工人（*operaio sociale*）”上。这将斗争扩大到直接工作场所之外的领域。这不仅是对生产过程的分化的反应，也是对妇女和青年运动的反应。

1977 年的自治运动

1977年，自治运动经历了第二次浪潮。它现在由学生、失业青年和不稳定的工人组成的边缘无产阶级来推动，他们加入了1960年代自治运动的余波。自治运动的第二波比第一波更具有反体制色彩，并对意共进行了尖锐的批评。1977年，出现了一系列针对国家的创造性和战斗性的抗议活动。大学和北方的大城市成为了反叛的中心。

该运动由两个主要思潮组成：创作自治（Autonomia Creativa），与德国的自发运动（Spontis）非常相似，挑战传统的政治形式，将暴乱接受为一种偶发艺术（Happenings³³）；以及自治工人组织（Autonomia Operaia Organizzata），其试图通过组织的方式将自发的反抗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攻击。

此外，创作自治有两个主要分支团体：青年工人团体（Circoli del Proletario Giovanile）和城市印第安人（Indian Metropolitani）。青年工人团体于1975年开始形成，作为一种自发的、松散的青年组织形式，出现在受经济边缘化影响最严重的街区。他们宣传立即夺回（recuperation）自己的生活，这与意共支持紧缩措施、道德僵化和个人节俭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青年们进行了集体的“无产阶级购物（proletarian shopping）”狂欢——他们劫掠了超级市场。他们还占领了政府管理的青年中心，并将其转变为自管理的会面处，他们与破坏这个崭新社会结构的硬性毒品³⁴和海洛因贩子作斗争，他们控制了公共交通并将其免费开放，并拒绝为摇滚音乐会和电影放映付费。青年工人们³⁵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1976年12月对米兰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的冲击，最后几千名无产阶级青年劫掠了市中心的奢侈品商店。与此同时，城市印第安人主要活跃在大学城。以土著³⁶自称代表了对城市和资本主义生活的激进拒绝。城市印第安人宣传另类价

³²原意也许更接近于“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即对立于因为产业家庭化和工厂化而变得从事较小生产规模的工人的大工厂流水线工人

³³偶发艺术是一种行为艺术形式，由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与1950年代首次提出

³⁴指海洛因、可卡因、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等具有强成瘾性和伤害的合成毒品

³⁵这里特指青年工人团体成员

³⁶指印第安人

价值观（生态意识、素食主义、性解放），否定工具理性，并颂扬大麻的解放意义。

创作自治圈子出版了数以百计的另类期刊，并经营着 50 多个激进电台，其中，最有名的是博洛尼亚的爱丽丝电台（Radio Alice）。活动家们绘制壁画，表演街头戏剧，并组织节日活动。创造“自由空间”，让日常生活政治化并满足集体自决需求的理念在运动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城市印第安人的形象被许多德国自发主义者热情地借用。

自治工人组织从另一个角度，将这些趋势看成逃逸而非摧毁整个体制的各种尝试。这股潮流由一些松散结合的委员会和团体组成，其中包括 1969 年基层工厂委员会的残余人员——例如，工人权力组织的成员在 1973 年开始将他们的活动转移到工厂外。

1977 年初，新运动爆发了，以一些假期的取消和高等教育保守改革计划为导火索，巴勒莫、卡塔尼亚和那不勒斯的学生占领了大学，该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2 月 1 日，罗马大学的一次大会遭到法西斯的武装袭击后，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并遭到警察手枪和机枪的攻击，期间，抗议者第一次使用枪支——这一现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得越来越普遍，P38 手枪变成了该运动的一个象征。

在罗马的示威之后，罗马大学被占领。2 月 17 日，传统工人组织和自治运动之间的裂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当共产主义工会主席想在大学发表演讲时，他被四五千名年轻人所嘲弄。在他的演讲的时候，工会的安保人员和学生之间爆发了冲突，他在演讲中批评了学生的“福利主义意识形态”和“以生产劳动为代价的寄生主义”，鉴于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处境，学生们认为这是一种嘲弄。最终，他们把“肥猫”喇嘛³⁷赶出了大学，并将这一事件作为“属于社会工人的法律广场”来庆祝。

不同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在曾经是共产主义城市管理之光辉典范的博洛尼亚，许多建筑被擅自占用，餐馆被洗劫，电影院被占领等等。3 月 11 日，当警察在大学校园内杀死一名自治活动家时，局势升级了，随后，发生了持续几天的骚乱，一家枪支店被洗劫一空。学生们在对老城区进行战略封锁后，成功地将警察挡在了老城区之外三天，以至于需要意大利军队下场夺回。

3 月 12 日，五万人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示威，抗议对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判决。这次示威变成了意大利首都有史以来最大的街头斗争之一。自治工人组织的团体兑现了他们“新层次对抗”的威胁：两家枪支店被洗劫一空，许多商店、咖啡馆和酒店被破坏，数百辆汽车和公共汽车被推翻和焚烧。基督教民主党的办公室和报社遭到汽油炸弹的袭击。

这次示威标志着自治运动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许多抗议者对冲突的高烈度没有准

³⁷这里或许是将工会主席比作佛教喇嘛，来讽刺其作为已然教会化的“共产主义工会”之传声筒，与前文的“社会主义枢机主教”相呼应

备，但不得不承受警察的报复性冲击。5月14日，在米兰的一次示威中，局势进一步升级，成群的武装青年袭击了警察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这导致了意大利左派内部对自治工人组织的日益孤立。在随后的国家机器镇压浪潮中，（自治运动）没有得到多少声援。同时，创作自治退缩成毒品驱动的城市亚文化、农村公社或意大利激进党——这与德国绿党类似。

到1977年夏天，有300多名自治活动家被监禁，逮捕行动得到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积极支持，意共在其报纸上公布了自治“头目”的名字。博洛尼亚的爱丽丝电台被封禁，其设备被没收，同时，国家将矛头对准进行运动的基础设施：书店、出版社、报社等，所有这些措施的借口都是：一个所谓的“颠覆性协会”在阴谋推翻意大利国家。

自治工人组织的部分成员试图通过进一步增加激进的行动（*Guerriglia diffusa*³⁸）来防止运动的完全解散。对国家机器的暴力挑战被看作是展开革命进程的唯一选择，“大会必须转入地下！”然而，活动家们与群众仍在日益疏离。

1979年4月7日，国家的铁蹄最终落下，数百名与自治工人组织有关的人被逮捕，包括托尼·内格里。1981年，在意大利的四千名政治犯中，有一千多人属于这个团体。1979年4月7日标志着自治工人组织的一次彻底的战略失败。

尽管自治工人组织已经消亡，但工人主义在构建德国自治左派的身份认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70年代，几乎所有的意大利自治运动关键文本都被翻译成了德语。难点在于如何将理论构想转化为可行的政治实践。

³⁸ 意大利语，意为“广泛的游击战争”

1970 年代的左翼激进主义

在 西德，1969 年至 1973 年属于“改革高潮”以及对东欧集团推行新政策的“和平总理”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德国社民党的青年组织社民青³⁹吸收了十万余名新成员，其对西德的社会冲突实行“双重战略（double strategy）”并收编了各基层运动。

到了学生起义的尾声，非组织化的反威权主义成为了激进左派的主要思潮之一，仅次于社民青、德国的共产党（DKP）和各类共产主义团体（K-Group）。各个反威权主义团体在对一切“先锋队”和“领导权”的概念的拒绝中团结起来。他们的政治实践旨在实现“日常生活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在大学之外，反威权主义者活跃在社区管理的幼儿园⁴⁰、自治青年中心、自助团体、社区倡议和团结被边缘化社区的团体中。

在 1969 年至 1972 年间的西柏林，激进基层运动的主要期刊是《883⁴¹》。该市激进的亚文化，即所谓“蓝调社群（Blues Scene）”的传声筒。蓝调景观的活动横跨了从攻击银行、建立住房合作社到在劳改所外抗议和举办“吸烟会⁴²”。

《883》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德国共产党-结构组织（KPD-AO，行话叫做“A-zero”）的主要批评者，后者在该市的激进左派中起着主导作用。秘密组织（clandestine organization）视作对教条主义的概念的一种反权威和战斗性的可行替代，《883》的几个编辑和撰稿人转入地下，包括格奥尔格·冯·劳赫（Georg von Rauch）、托米·魏斯贝克（Tommie Weisbecker）、霍尔格·梅恩斯（Holger Meins）、沃纳·索伯（Werner Sauber）和彼得-保罗·扎尔（Peter Paul Zahl）。不过，这一步并不能代表 70 年代初反威权主义活动家们的普遍情况。

³⁹ 即 Jusos，见注释

⁴⁰ 原文为 self-managed kindergartens，自我管理的幼儿园

⁴¹ 指 Agit883

⁴² Smoke-in，吸烟会是一种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抗议活动

“史邦敌 (Sponti)⁴³”和“安纳克 (Anarcho⁴⁴)”这两个词出现于 1970 年左右，是主要聚集在各自社区的相当非正式的政治团体的名称。在西柏林，无产阶级左派/党务行动 (Proletarische Linke/Parteiinitiative, PL/PI) 设法将列宁主义宣传与自发主义运动相结合，并在短时间内（1971 至 72 年）获得了许多非组织激进派的同情。1973 年，一些同志离开大学，在柏林的克罗伊茨贝格 (Kreuzberg) 和维丁 (Wedding) 等地区组织起来。这些圈子在 1974 年成立了《故障信息》(Info-BUG⁴⁵)，在 70 年代末之前，它是自发运动的主要出版物。

以下各章描述了 1970 年代激进左派在政治上、实践上、社会上和理论上为西德的社会变革所做的尝试。所介绍的这些尝试都在某种程度上对 80 年代的自治运动产生了影响。

“我们要夺取一切！”：工厂中的基层组织

1970 年代初德国激进左翼的自发运动思潮中的某一支受到了意大利斗争的强烈启发。西德工人主义团体的形成与“议会外反对派的消亡和各共产主义团体 (K-Group) 的出现”(Bierbrauer) 相吻合。工人主义理论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解释中获得了解放，其主要诉求在于将工人阶级视为其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历史环境的被动承受者 (victims)。

西德的几个城市成立了所谓的工场⁴⁶项目组 (*Betriebsprojektgruppen*)，它们以科隆的工人斗争 (*Arbeiterkampf*)、法兰克福的革命斗争 (*Revolutionärer Kampf*)、慕尼黑的工人事业 (*Arbeitersache*) 以及汉堡和不来梅的无产者阵线 (*Proletarische Front*) 等名称运作，以便讨论在工厂和街区进行政治干预的可能性。一些团体也在讨论中迈出了实践的步伐。

当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带着对工人阶级的传统解释进入工厂中时，工人主义者则明白，将学生起义转变为工人斗争意味着许多挑战。他们坚持首先在工厂里和从工厂里积累经验，因为工厂斗争的组织形式、战略和战术不能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为基础。一开始，对工厂的政治干预首先是一种“研究手段”，行动主义 (activism) 则应有助于揭示工人的实际意识。从 1973 年 2 月到 1975 年夏末，工场项目组发布了一份共同文件：*Wir wollen alles* (“我们要夺取一切”⁴⁷)。慕尼黑的工人事业对这些团体的共同点做了

⁴³意为“自发主义的”

⁴⁴意为“无政府主义的”

⁴⁵其中“故障 (BUG)”一词表示“柏林非教条主义者团体 (Berliner Undogmatischer Gruppen)

⁴⁶Betrieb 一词更接近于“生产场所”

⁴⁷Kuhn 将这句话翻译为“We want everything”，但这句话的本意更接近于“我们要一切”，为了翻译的自然译者自行添加了“夺取”这个词

如下定义：“工人自治；关注工厂的实际工作；激进的工会批判；将移民工人纳入家庭斗争；与日常无产阶级生活（everyday proletarian life）的实际关系”。

工场项目组的做法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1971年10月，革命斗争的成员在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的欧宝（Opel）员工会议期间组织了一次移民工人的直接行动。然而，这种方法并没有像这些团体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和广泛地传播，希望落空。工作场所组织的普遍困难——监视和压制、裁员的威胁等——是一个原因；学生和“大众工人（mass worker）”之间的文化障碍则是另一个原因。

正如“工厂干预（factory intervention）”一词所表明的，德国工厂的阶级斗争的动力（impulse）并不像意大利那样来自工人本身，而是来自学生活动家。工场项目组的意图是把他们的反威权主义活动带入工厂。他们把直接行动和激进斗争看作是反专制反叛和“无产阶级工人文化”之间的交汇点。在他们的努力下，（德国自治运动）与意大利的差异变得显著：

大众工人和打着他们旗号的组织之间的利益区别太大……广大工人由于常常被当作政治诱饵出卖，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先锋队都持极度怀疑态度……看起来，“工人自治”的概念是在西德构建的——尽管可能零星存在（pockets），但它缺乏实在的基础。然而，抵抗形式从消极到积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不认同自己的劳动并不意味着自动认同左翼激进主义，尤其是来自外部的激进主义……革命斗争这个团体在自我批评性质的评估中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和自治运动的错误认识，源于“意大利幻觉（Italian Illusion）”。

西德与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发展也非常不同。在意大利，1960年代的资本主义繁荣是建立在“表面上无限的对劳动力的剥削、劳动的合理化、低工资以及二战后数百万农村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建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上。在西德，核心始终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此外，资本的广泛积累战略在1950年代末结束了（Kukuck）

即使是在8月底科隆福特汽车罢工中达到了顶峰的1973年罢工运动，也主要是由移民工人进行的。福特公司罢工由于其迄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组织形式而受到了激进左派的热烈拥护，这与德工联-社民党工会机构的协议相抵触。但是，这并没有形成广泛的自治工人运动。工场项目组不能果断地进行干预，以及德国工人和移民工人之间的种族主义分歧无法克服导致了运动的失败。



住房斗争

1970 年，反威权分子开始在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哥廷根、汉堡和其他德国城市占领房屋。工场项目组将占屋（squatting）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使其能够直接与“日常无产阶级生活”相联系，而且在工厂前景不理想的情况下，为动员工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工人宿舍的反叛、租户的罢租运动和广义的（in general）住房斗争被看作是再生产领域中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焦点。对于工场项目组来说，这证实了资本将其控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普及了“住房工厂（housing factories）”这一术语。无产阶级阵线在 1973 年 5 月的《夺取一切（Wir wollen alles）》期刊中写道：

“占屋意味着破坏资本主义对我们街区的规划。它意味着拒绝租金和资本主义鞋盒般的住房结构。这意味着要建立公社和社区中心。这意味着确认社区的社会潜力；这意味着要克服无助。在占屋和罢租运动中，我们得以发现工厂外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关键。”

工场项目组希望住房斗争能帮助他们动员起无产阶级对集体主义的需求，以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他们期望通过日常的互动和交流，将学生和工人的利益联合起来。他们还希望激进斗争和国家镇压的共同经历能使人们团结。然而，1970 年代初的住房斗争的实际情况则与之相悖。

住房斗争在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法兰克福和汉堡最为明显。占屋运动引起了这些市政府的警惕，他们急于表现出改革的姿态。在法兰克福，社民党承诺要打击土地投机行为。当城市里的住房斗争变成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时，汉堡的斗争在埃霍夫大街（Ekhofstraße）39 号的占领屋被驱逐后升级了。驱逐标志着该市激进左派的失败，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意味着占屋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在无人的楼房里免租金的生活方式来讨论：在几年内，占屋运动将定义西德的激进话语。住房斗争的发展证明，新的斗争形式在再生产领域是可能的；尽管这些斗争形式是非法的，但有时却能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

法兰克福

20 世纪 60 年代末，法兰克福的主要银行开始雄心勃勃地将该市改组为一个银行和服务业的大都市。他们打算将业务扩展到与市中心联系紧密的西部（Westend）社区。西区是法兰克福资产阶级的传统聚居地。土地投机者购买了大量的房产，并将其出租给

移民家庭。这导致了大多数西区传统居民的离开，并使投机者从敲诈性的租金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整个街区无可救药地变得拥挤不堪，而一些房产则被故意空置。学生们几乎不可能在这一带租到集体公寓。

正是在这一时期，从 1970 年到 1974 年，法兰克福的占屋运动得到了发展。推动力量是反权威的学生，他们在学生运动中已经把法兰克福变成了一个活动中心。社学联分部的消亡催生了一个强大的自发主义社群（scene）。许多激进分子还与曾是意大利战斗继续（Lotta Continua）组织成员的移民工人合作。1972 至 1973 年，主要由土耳其和意大利移民进行的罢租运动得到了自发占屋者的支持。然而，这种合作也引起了冲突：罢租一方的有限政治自治与自发分子的“社工和律师心态”相冲突。此外，这些团体之间的联系是基于实用主义而不是政治信念的。

以革命斗争为主要团体的法兰克福自治战场，在 1974 年前一直主导着住房斗争的公开表达。他们组织了各种行动、示威和占领活动。斗争激进是一个重要因素。1971 年 9 月，在一次失败的驱逐行动后，占屋者得到了大量的民众支持。该运动设法将这一势头转化为进一步的占领和罢租运动。法兰克福社民党领导的市议会被迫撤销了其立即驱逐的总命令。

当移民工人的罢租运动在 1973 年春天结束时，激进左翼内部的讨论集中在保卫占领房屋和对群众示威的积极保护上。当链庭路（Kettenhofweg）占领屋受到驱逐的威胁时，自发分子选择发起一场积极的政治运动。警方以被公众认为不相称的恐吓措施作为回应。结果便是法兰克福内城的暴乱。由于激进的决心和广泛的团结，一些驱逐的企图被击退。在这些冲突中，政治宣传活动与一种群众性的战斗力相关，这种战斗力并不脱离其目标，而是与之直接相关。资产阶级新闻界对此深表关注：“在我们城市的中心，正在出现内战的集群……按照法兰克福的情况来看，平行政府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内城：昨天是大学委员会，今天是住房委员会，明天可能是‘工厂占领委员会’。”（《法兰克福新报》（*Frankfurter Neue Presse*），1973 年 4 月）

最终，链庭路的占领屋被武力野蛮驱逐。从那时起，对示威活动的武装（militant）保护成为法兰克福自发运动的主要焦点。人们激烈地辩论着斗争激进（militancy）和反暴力。这些讨论是公开的，并与广泛的占屋运动直接相关，这可能是当时（当局）试图将激进分子罪犯化（criminalization）失败的原因之一。然而，对激进⁴⁸防御的重视也掩盖了对政治观点的讨论。部分原因是许多活动家因持续的镇压而筋疲力尽；部分原因是革命斗争组织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1974 年 2 月初，另一个重要的法兰克福占

⁴⁸ 尽管 militant 一词在中文世界中常译作“激进的”，但译者想要指出该词与 radical 不尽相同，其更偏向于战斗性的激进，故前后文中译者会视情况将该词翻译为“激进的”或“武装的”

领屋“街区（The Block）”在 2500 名警察的突袭中被驱逐，紧接着被拆除。2月 23 日，一场示威活动聚集了上万人，导致了 1970 年代法兰克福最大的骚乱。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激进分子们受到法兰克福市议会打击的事实。该市的占屋运动实际上已经到了尽头。一位自发分子描述了缺乏政治视角的情况：“传统的权力结构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重现，人们不再知道该怎么做。当你把人们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时，你就不会惊讶于为什么在一切脱轨时无人介入。”（《野猫》第 40 期，1986 年）。

在住房斗争结束后，自发运动试图通过反主流文化、具体运动和武装行动来维持其政治身份。1974 年夏天，围绕公共交通票价进行了一场斗争；1975 年 9 月，发生了对西班牙总领事馆的袭击；1976 年 5 月，在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死后，发生了一场三千人的激进示威。与此同时，还有秘密组织和小团体的街头激进活动。“小团体概念”得以与警察进行更有效的对抗，但它也导致了曾经团结的激进左翼的分裂。

当街头激进主义不再实行时，将革命愿望与街头激进主义强行联系起来就会适得其反。自发分子把他们的政治建立在个人需要的基础上。这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当社会条件的困难（革命前景黯淡、国家强力镇压等）使得集体抵抗成为必要时，这样的集体抵抗可能就会无处可寻。

汉堡：埃霍夫大街 39 号的占屋运动

埃霍夫大街占屋运动背后的故事始于住房协会“新家园（Neue Heimat）”的子公司贝沃宝（Bewobau⁴⁹）的计划，即拆除霍亨费尔德（Hohenfelde⁵⁰）市内街区的众多建筑，以建造 19 层高、总共有 450 套私人豪华公寓的公寓楼。这项计划的筹备工作花了数年时间，包括有意将长期租户赶走，并鼓励学生以短期合同入住。在埃霍夫大街 39 号被占领的时候，霍亨费尔德的许多房子都处于闲置状态，或者被出租给不被认为是潜在长期居民的学生。在整个过程中，新家园与私人投机者合作，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导致了租户倡议的成立，但请愿书、传单和公开信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此，1973 年 4 月 19 日，埃霍夫大街 39 号被占领了：

这是汉堡自发主义者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革命暴力是其中的关键，尤其是由于警方打击红军派的行动而被推波助澜的西德警察机构的扩张以及对左派越发强力的镇压。法兰克福链庭路占领屋的例子展示了动员广泛的社会团体参与激进和不妥协的政治斗争的可能。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最终

⁴⁹这个词由居住（bewohnen）和建造（bauen）二词组成

⁵⁰意为“高地”

对抗是可以预料的，这一事实已经影响了占领的准备工作，激进分子的装束就说明了这一切：他们随身携带着头盔、头巾和棍棒。（Grüttner）

起初，社区团结包含了从捐赠家具到在房屋上悬挂的团结旗帜的各种行动。占屋者与附近的居民联系、组织会议、公开讨论他们的想法，并建立了一个社区办公室和一个青年中心。特别是对于附近的年轻人来说，占领屋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聚会场所。

占屋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他们公开承诺要武装保卫占领屋，这使得市议会、贝沃宝和警察无法立即执行驱逐行动。相反，他们试图孤立占屋者并将其罪犯化。宣传部分由汉堡的施普林格出版社负责，它不断地将占屋者称为“居无定所的激进分子”、“蒙面人”、“政治摇滚小子”、“恐怖分子”和“黑帮分子”，编造占屋者攻击其他街区居民的故事。挑衅的部分则交由警方，他们每天都在骚扰占屋者，试图限制他们在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工作中的选择。所有居民、来访者和同情者在往返占领屋的路上都被拦截和控制。许多人被带到警察局，被迫留下指纹。占屋者以有组织的激进行为作为回应。然而，从长远来看，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是不可持续的。同时，由于占屋者专注于与警察小规模的每日冲突，占领区的政治活动基本上完全停止。随着从政治层面到斗争层面的转变，削弱了与附近居民的团结。每个人都受到了警察长期存在的严重影响。

1973年5月23日上午，占领区被六百名警察封锁，并被一支配备机枪的特警队袭击。七十多名占屋者被逮捕，其中33人被指控“参加或支持犯罪组织”（第129条），其中一些人被定罪。这是第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援用该条款。

这些事件成为汉堡的自发运动的一个分水岭。无产者阵线因驱逐而瓦解。该组织的成员支持占屋运动，尽管这并不符合他们的理论信念；根据他们的说法，住房斗争必须以工人阶级社区为基础，并通过广泛的公共宣传进行准备。当埃霍夫大街39号被占领时，附近的许多居民已经离开。在霍恩费尔德，几乎没有任何长远的政治前景。不过，无产者阵线还是落入了激进政治的陷阱之一：激进性成为对个人奉献和道德的主要评判标准。最终，这撕裂了这个组织。

在驱逐和随后的国家镇压之后，一些埃霍夫大街占屋者决定转入地下。其中两人，卡尔·海因茨·德尔沃（Karl-Heinz Dellwo）和伯恩哈德·霍斯纳（Bernhard Rößner），是红军派突击队的成员，他们在1975年4月袭击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试图迫使当局释放关押于斯达姆海姆（Stammheim）的红军派囚犯。前占屋者广泛参与武装抵抗组织的行动，使得国家机器后来将占领屋宣传为“恐怖分子的中转站”。

由于“埃霍夫大街创伤（Ekhofstraße Trauma）”，汉堡的自发主义者在一些年里无法组织更大的政治行动。这样的情形直到1976年在布罗克多夫（Brokdorf）的反对建造核电站的斗争中才有所改变。

大学中的自发主义运动

大学生的情况在 1970 年代上半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技术官僚的“教育改革”，大学已然成为大众机构。从 1960 年到 1979 年，西柏林和西德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两倍多，达到了约一千万。这种情况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各类共产主义组织（K-Groups）和左翼改革派。这些共产主义团体将“阶级斗争的要求”置于“个人需要”之上，而许多由于 1968 年的起义而进入学术界的“左翼学者”则专注于揭露“资产阶级科学”，他们的论文不仅作为学术生涯的一部分，而且他们还设法将其作为对斗争的重要贡献加以推销。

在 1970 年代中期，反理论和反学术的自发主义者在以大学为基础的激进主义运动中取得了进展。他们用非传统的、有趣的、富有想象力的行动挑战学术结构：在明斯特，一只猪被选为大学校长。在乌尔姆，一只狗参加了大学评议会。在 1977 至 1978 年他们影响力的顶峰时期，自发主义者在数所大学中担任学生代表。

1970 年代的自发运动的特点是一系列丰富但矛盾的抗议、起义、拒绝和逃避现实（escapist）的行为。其政治思想融合了反体制、直接民主、自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元素。运动的主要矛头则对准了资产阶级社会。

在 1970 年代末，在经历了“改革大学（reform universities）”的幻灭之后，自发主义者越来越关注替代文化、社区组织和反核活动。大学仍然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用来作为参与其他斗争的基地。

如果不提及社会心理维度，对自发运动的描述将是不完整的：抽象地说，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创造集体经验的尝试，暗示着某种不同的可能性。更具体而言，自发主义团体的集体主义野心高得不切实际，而且不止一次地以心理剧（psychological drama）的形式结束，使得任何政治工作都无法进行。一种“受影响的意识形态”与一种“新的内在性”相联系，它经常导致对政治的放弃，退缩到集体住宅、自助团体和毒品中。自发主义者的“反政治”信条有时会变成单纯的私有主义（privatism）。

K 群简史

在议会外反对派的消亡期间，社学联的几个派别已经表现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模式的同情。甚至来自反威权主义环境（milieu）的团体在寻找新的政治视角时也转向了教条主义。像“克服反威权主义”这样的口号开始流传，人们开始谈论“无产阶级转向”。大部分中产阶级学生“反权威狂热”回归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的“小资产阶级严肃”。个体思想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党的服从。现在，党——通常被称为“无产阶

级的领导党”，无论个人的喜好如何——代表着“革命身份”，而不再是个人。在形成的许多“K (*komunistisch*⁵¹) 群”中，有四个小组变得特别有影响力，其中一些小组在特定的城镇和地区建立了强大的主导地位：在西柏林，德国共产党-结构组织（KPD-AO）成立于 1970 年；在基尔和鲁尔河谷，德共-马列（KPD-ML），由德共前成员于 1968 年底成立；在汉堡，共产主义同盟（*Kommunistische Bund*, KB）成立于 1971 年；在法兰克福、海德堡和不来梅，西德共产主义同盟（*Kommunistischer Bund Westdeutschland*, KBW，西共同）由一些学习小组于 1973 年成立。

上述所有组织的共同点，除了对工厂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执着，还有他们对德共（DKP）和苏联的“反修正主义”立场。毛主义者影响力很强，这些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政策相匹配。一些组织甚至批评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认为其是比美国更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敌人。德共-马列和其他人还要求重新统一“社会主义德国祖国（*fatherland*）”。然而，最糟糕的是这些共产主义团体对理论和实践及其组织结构的狭隘理解。专制和教条的理论与枯燥的经济学说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的普遍视野沦为一种分配园地的庸俗意识形态。尽管如此，这些团体的成员仍然相信“党在工人斗争中的领导作用”。这不仅产生了严格的等级结构，而且产生了对服从、纪律和忍耐力的严格要求。党员们被要求达到严格的表现标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被完全管制。几乎所有的私人收入都交给了党，党安排“红色婚礼”，男人不得不留短发，人们每天至多要花上 18 个小时来“革命党政”，而自发主义者则被斥为“精英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

70 年代中期，这些共产主义团体在各个城市形成了最强大的左派议会外力量。在其鼎盛时期，超过万人被组织其中。西共同（KBW）是最大的组织，有三千名成员，而共产主义同盟（KB）仅在汉堡就有几千人。1977 年，西共同的杂志《共产主义人民报（*Kommunistische Volkszeitung*）》每周的销量超过了三万份。共产主义同盟的《工人斗争（*Arbeiterkampf*）》紧随其后，售出了 2.5 万份。

一些组织表现出惊人的战斗性和激进性⁵²：1973 年 4 月，结构组织的成员冲入并捣毁了波恩的市政厅，以抗议南越总理的访问。1975 至 76 年，西共同组织了大规模的有轨电车封锁，反对公共交通费用的增加。在全国性反核运动的早期阶段，这些共产主义团体派出大批装备精良的同志，他们在亲身参与的对抗中被证明非常有效。1977 年底，正是他们的激进导致了关于禁止 K 群，特别是西共同的深入讨论。由除共产主义同盟以外的大多数著名共产主义团体安排的支持集会，吸引了大约两万人来到波恩广场

⁵¹即“共产主义的”

⁵²原文仅用了“militancy”一词

(Bonner Marktplatz); 广场上挂满了红旗。

K 群的消亡很快就开始了。退回到 1920 年代的政党概念和完全过时的无产阶级概念——以男性工厂工人为蓝本——在西德的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变成了一个战略笑话。此外，对于批判父权制和新社会运动（反核、环保和替代运动）所提出的紧迫问题，K 群无法给出答案。动员新成员服从专制的政党结构并接受对其私人事务的不断干涉变得越来越困难。

K 群消亡后，一些领导人完全退出了政治工作。其他人则加入了绿党。在西柏林的替代清单 (AL⁵³) 中，结构组织成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仍因呼吁“统一德国祖国，将其从超级大国手中解放”而引起骚动。然而，其他前 K 群成员忏悔他们“年轻时犯下的革命原罪”并承诺效忠宪政国家之后，晋升到了党的最高层。在汉堡的共产主义同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一翼与绿党合作，另一翼则继续作为一个不妥协的 (decidedly) 共产主义组织继续存在。

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在西德共产主义者同盟 (Bund Westdeutscher Kommunisten, BWK)、联合社会主义党 (Vereinigte Sozialistische Partei, VSP) 和德国马列党 (MLPD) 等组织中，只存在少数前 K 群的残余。作为曾经令人瞩目的政治力量，他们已经消失了。然而，1970 年代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在 1980 年代的自治运动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但并不总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

替代运动

在西德和西柏林，所谓的替代运动 (alternative movement) 的开端深刻地植根于对以工作场所为中心的政治日益增长的怀疑。这在 1970 年代末变得更加明显。替代运动似乎提供了一条一方面能够逃离国家压迫，另一方面又能融入体制的途径。它似乎还提供了将个人解放和集体解放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是自发主义者在议会外反对派时期便已阐明的理想。

在 K 群运动的失败之后，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一种追求“平行文化”的运动出现了，它试图创造一个替代主流社会秩序的实用方案。它在激进左派的根据地，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和西柏林最为强大。

一开始，许多替代项目将自己视为广义政治斗争的日常支持结构：左翼书店、酒吧、咖啡馆、印刷店等。然而，其也带有强烈的“乌托邦”元素：这些项目都为在资本主义中建立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做出了示范。在这个意义上，替代运动的开始与拒绝雇佣劳

⁵³ 详见“译者注与术语表”一节

动的自治冲动和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密切相关。

替代运动是在经济危机的“客观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对异化和压抑的社会结构的拒绝往往变成了个人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自我边缘化。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夸大了自主管理项目中的小规模生产和商品分配的重要性，但替代运动的实际政治关联性却日渐削弱。“替代经济”一词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市场利基（niche）的一个标签。昂贵的有机苹果或生态动力学胡萝卜也为新兴的“健康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资本主义的新红利。简而言之，经济客观性优先于个人意识。到 1980 年代末，大多数替代项目都牢固地融入了资本主义结构。

自治团体总是对替代运动的幻想提出强烈的批判。他们强调，如果不挑战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基础，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拒绝是不可信的。替代运动将叛乱元素从工厂和街道上夺走，并将他们局限在贫民区。它还在资本剥削的基础上增加了以意识形态掩盖的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然而，这种事后形成的批评本身仍然是“客观主义的（objectivist⁵⁴）”，没有考虑到 1970 年代中期的历史状况。此外，它将复杂的历史环境简化了。仍有一些替代项目建立在自治、自组织和对需求和利益的真实表达的原则之上。他们把自己理解为真正的反文化实验室和拒绝资本主义表演社会的基础。卡尔-海因茨·罗斯（Karl-Heinz Roth）说到：

任何严肃的社会革命者最终追求之物，目前只能以其最基本的形式来预期：共同财产、平均收入、尽可能少的工作义务和尽可能多的自决权、超越性别矛盾、核心家庭（the nuclear family⁵⁵）的解体、没有官僚机构和国家结构的分散自我管理、替代技术以及自然环境的重建。我相信，迈向它们的第一步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是一个开始：一个新希望的开始，证明有朝一日，自我实现的有限可能与一般性的社会目标之间的鸿沟得以弥合。

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替代项目让人们至今仍能在团结和相对自由的空间里组织起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当替代运动在 80 年代初受到西柏林占屋运动的强烈批评时，它仍然为后者提供了运动的经济基础。此外，某些替代项目作为更广泛的政治斗争的跳板继续发挥着作用。

⁵⁴译者认为这里的“客观主义”仅仅强调一种脱离历史环境和生产关系的评论，而与安·兰德提出的作为资本主义哲学概念的“客观主义”无甚关联。

⁵⁵核心家庭是人类家庭的一种组合形式，指以婚姻为基础，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和生活的家庭。

SOLIDARITÄT MIT DER ROTEN ARMEE FRAKTION! FÜR DEN AUFBAU DER STADTGUEILLA!



“与红军派团结起来！
为了城市游击的结构！”

期刊《自治》

1975 年 10 月，《自治》(*Autonomie*) 杂志创刊，副标题是“反对工厂社会之材料 (*Materialien gegen die Fabrikgesellschaft*)”。该杂志是《夺取一切 (Wir wollen alles)》的继承者，后者于同年停刊。《自治》为那些曾经承载过《夺取一切》、而如今正处于政治调整阶段的团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讨论场所。《自治》一直出版到 1985 年，在 1978 至 79 年间有较长时期的中断。

直到 1978 年底，编辑部分裂至法兰克福和汉堡。从 1979 年开始，“新系列 (Neue Folge)” 仅在汉堡出版。法兰克福小组之所以离开，是因为在《自治》的标签下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日益对立的派系 (strains)：主观-美学的 (subjective-aesthetic) 法兰克福派和分析的 (analytical) 汉堡派。

汉堡小组认为许多人使用的“自治”一词是背离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借口。他们坚持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主义方针。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小组看到汉堡小组发展出政党政治的倾向，这违反了他们的反威权主义原则。此外，汉堡小组关注的工作场所斗争被解释为改良主义，而反核斗争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似乎对工作场所的重点关注提出挑战。

事后看来，汉堡小组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许多来自法兰克福的前自发主义者最终加入了绿党的温和派系“现实派 (Realo)”。前《自治》作者托马斯·施密德 (Thomas Schmid) 甚至成为了绿党极右翼“生态自由主义”派别的导师：这一派别试图从绿党扩散到自民党甚至是基民盟的成员，并形成一个反社会主义阵线。

最终，法兰克福小组将该杂志留给了汉堡小组，该小组负责出版《自治》杂志，直到 1985 年。该杂志的主题包括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遗产、伊朗的革命发展、占屋者和反核运动、镇压、对意大利自治计划的分析、对帝国主义工业国的阶级分析，以及勾勒一个“新反帝主义”的尝试。

该杂志与新兴的自治运动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编辑们的重点是提供“反对工厂社会之材料”；另一方面，他们有进行更直接的政治干预的野心。然而，他们的干预要么被证明为尴尬的错误（如伊朗的情况），要么就被自治运动基本忽略了。

《自治》于 1985 年停刊，但我们不能因此而低估该杂志对自治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一座从 1968 年学生起义到 1980 年代自治景观的历史桥梁。来自一些编辑的政治经验跨越了整个时期。在一个反理论的实用主义时代，《自治》试图在自治团体的直接日常工作之外拓展空间。通过这种方式，该杂志为自治运动的政治复杂性做出了贡献。



革命细胞：“社会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难民政策”

城市游击和其他武装小组

1970 年代的自治运动与城市游击队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 RAF）、六月二日运动（Bewegung 2. Juni）和革命细胞/红佐拉（Revolutionäre Zellen/Rote Zora, RZ）关系密切，但它们并非没有矛盾。

自发运动和武装小组的出现，与作为群众运动的议会外反对派的消亡、其遭受的镇压和部分反对派活动家融入体制有关。武装小组非常清楚地提出了权力问题：如果你宣扬革命，你就必须设法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暴力和武装斗争。人格和认同是决定加入武装小组的核心因素。通过加入武装小组，一个人将在政治行动主义中破釜沉舟。撤退和脱离组织将不再是可选项。然而，拿起武器所隐含的道德维度也更加局限了政治斗争的选择。国家的镇压也加剧了这一点。在 1970 年代武装小组的活动后，对激进左翼政治的日益镇压对左派整体产生了强烈影响。

一开始，红军派明确地试图将其行动与议会外反对派的激进基层政治联系起来。巴德尔被释放后的公报⁵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很快，红军派表示，不可能将群众活动与游击斗争相结合。大约在 K 群出现的时候，红军派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权领导原则。这引起了红军派和反威权的自发主义者之间的裂痕——因为后者拒绝一切领导权概念。

通过 1972 年 5 月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例如对美国陆军海德堡总部的袭击，红军派与 K 群的关系受到了考验，他们与议会外反对派运动有着相同的遗产。然而，大多数前议会外反对派同志都与这些行动保持距离。红军派所面临的团结缺乏和怯懦导致了该团体内部的新导向。现在⁵⁷，全球反帝斗争成为它的焦点。红军派认为自己是“三大洲（即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世界”⁵⁸分支。

1972 年，几乎整个红军派的创办者都在监中。监狱成为新的宣传（agitation）场所。红军派成员尽力反对单独监禁，他们将其称为“隔离酷刑（Isolationsfolter）”。他们的核心要求是对所有红军派囚犯进行共同监禁（Zusammenlegung）。为了强调其承诺，红军派囚犯进行了几次绝食抗议。

1975 年到 1977 年间，“解放游击”游击队（Free-the-Guerrilla Guerrilla）的新成员试图通过几次行动迫使当局释放他们的同志。然而，“解放游击”游击队在“1977 年

⁵⁶指贝恩德·安德烈亚斯·巴德尔（Berndt Andreas Baader），红军派第一代领导人。1970 年 5 月 14 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在被指控纵火和危害生命罪后获释。不到一个月后，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在柏林的地下报纸以刊物《Agit883》的名义写下文章，要求武装和建设红军。

⁵⁷1980 年代

⁵⁸这里的三个世界模式的划分标准不同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在本文的语境中，三个世界分别指代的是资本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不结盟/中立国家。

攻势”的失败后崩溃，该攻势包括了针对德国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于尔根·彭托（Jürgen Ponto）和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Martin Schleyer）等权势人物的行动。

1972年，六月二日运动以“由数个自治团体组成的城市游击组织”自居。与红军派相比，它的政治主要聚焦于工业化国家本身的矛盾：

“六月二日运动”是一个政治术语。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将1960年代的青年起义所产生的政治抵抗力量表达出来。六月二日运动体现在每一个抵抗日常资本主义恐怖并试图寻找替代方案的人身上。这包括创建自己中心的占屋者和青年，监狱和妇女团体，社区管理的幼儿园和替代性的出版项目，组织罢租和堕胎，以及与越南、伊朗、巴勒斯坦、安哥拉、西撒哈拉和其他地方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委员会。当武装突击队成立时，它是这些活动的表达和结果，它来自这些活动，依赖于这些活动，并由这些活动培养——即使有些人不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是试图用模范行动来表达运动的潜在革命潜力，并通过克服无助来推动运动发展，尤其是在面对警察和监狱的权力时。（摘自对罗纳德·弗里奇（Ronald Fritsch），杰拉德·克洛珀（Gerald Klöpper），哈尔夫·莱德斯（Ralf Reinders），弗里茨·特菲尔（Fritz Teufel）的采访，1978年）

六月二日运动以西柏林为基地，在那里组织了一连串成功而受欢迎的行动，包括抢劫银行，发放巧克力糖衣的棉花糖。著名的基民盟成员彼得·洛伦茨（Peter Lorenz）被绑架后，一些被囚禁的同志被释放。然而，到了1976年，由于大部分成员被捕，该组织被严重削弱。最终，六月二日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遵循红军派的反帝国主义路线，另一派则强调社会革命行动主义。

革命细胞和妇女游击队“红佐拉”的理念与六月二日运动的“基层游击”方式相似。1981年，一些成员回顾了革命细胞的成立阶段和他们的武装斗争的方式：

1973年，当革命细胞第一次负责一项行动时，我们将自己视为一场席卷社会各阶层的群众运动的起点。对我们来说，许多迹象证实了这种信念。赫氏（Hoesch）、曼内斯曼（Mannesmann）、约翰迪尔（John Deere）和克洛克纳（Klöckner）等工厂的罢工潮表明了德国工场斗争的新形式和新目标。在科隆的福特工厂，一个跨国和自组织的工人阶级已初具雏形。许多社区经历了动荡。青年运动为自决的青年中心开展运动，甚至在最小的城镇也是如此。占屋运动证明了人们已经准备好夺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以前被视为纯粹个人

的抵抗形式被政治化，例如，例如入店行窃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妇女运动迅速变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1975 年全国范围内反对“堕胎条例”第 218 款的运动就是例证……武装斗争的概念似乎有可能支持这些趋势。秘密自治团体开展的行动旨在向统治结构的持续攻击迈出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在小型自治单位中组织“反权力（counterpower）”，这些单位作为群众运动的组成部分开展工作、战斗、干预和保护。一旦有了足够多的自治单位，游击本身就会成为群众运动（《革命怒火（Revolutionärer Zorn）》，第 1 期，1975 年 5 月）。

有趣的是，革命细胞从来没有像红军派那样受到公众的关注，后者是西德国家内嵌的（institutionalized）敌人。

1977 年，德国之秋

在政治上，西德在 1977 年经历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发展。出现了大规模的激进反核运动，在春季占领格罗恩德（Grohnde）的核电站建筑区时（运动的激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两年后，红军派的活动也开始复苏。春季，西格弗里德·布巴克被杀；夏天，于尔根·彭托被杀。9 月 5 日，“众老板的老板”汉斯-马丁·施莱尔在科隆被绑架，终于迎来了所谓的德国之秋。绑架施莱尔的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释放红军派的囚犯。政府立即实施了新闻禁令，媒体也心甘情愿地接受。政府还将所有正式的民主程序暂停了 44 天，将权力交给了一个违反宪法的“危机管理小组（Großer Krisenstab）”。所谓的接触禁令（Kontaktsperre）在议会被强行通过，完全无视常规程序。它规定所有红军派囚犯必须完全隔离：没有报纸、电视或广播，没有家人或律师的探视，更不用说其他任何人了。基本上，这些囚犯变成了国家人质。他们的律师甚至事先就被禁止探视他们。一名法官裁定这种做法非法，但这一点完全被忽略了。

与此同时，反核运动依然活跃：9 月 24 日，其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反对在卡尔卡尔（Kalkar）建造快中子反应堆。这使国家镇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整条高速公路被关闭，至少有 12.5 万（！）张身份证件被检查，警察的直升机拦住了客运列车，警察带着冲锋枪搜查公共汽车。大多数抗议者没有到达计划的示威地点——至少没有按时到达。在运动中被称为“卡尔卡尔冲击”的事件使运动部分受挫。

关于施莱尔绑架案，危机管理小组正在努力争取时间。10 月 13 日，一名阿拉伯裔的突击队员劫持了一架离开马略卡岛（Majorca）的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局势出现了

戏剧性的变化。随机劫持德国游客作为人质是为了增加对政府的压力以释放囚犯。危机管理小组加大力度寻求武力解决。一些大人物，如基社盟领导人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和联邦总检察长雷布曼（Rebmann），甚至建议对红军派的囚犯进行清算。最终，劫持事件于 10 月 17 日结束，当时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GSG9，德国联邦警察的反恐部队）的一支突击队在摩加迪沙冲进了飞机（当天早些时候在那里降落）。第二天早上，红军派的囚犯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扬·卡尔·拉斯佩（Jan Carl Raspe）和古德伦·恩斯林（Gudrun Ensslin）被发现死在牢房里。伊姆加德·穆勒（Irmgard Möller）受致命伤。这些囚犯一直处于国家持续的专门监视之下。仅仅过了几个小时，当局就将自杀列为死因，尽管事件的确切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澄清。10 月 18 日晚，施莱尔被发现死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一辆车上。

“德国之秋”对新左翼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决定性的经历。虽然有些人明确地与红军派保持距离，并在感觉最安全之处团结在国家周围，但大多数人却默然而迷惑。自发主义者经历了声势浩大的国家镇压。整个社区被围困，警察手持冲锋枪巡逻，活动家在枪口下被搜查，集会场所被突袭。

德国之秋正处于非教条主义左派的转向阶段。工厂干预和占屋斗争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反核运动则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卡尔·卡尔冲击和红军派攻势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许多非教条主义激进分子和红军派之间的裂痕扩大了，自发主义者越来越被与国家媾合的左翼自由派和六八世代的学术活动家所孤立。对许多人来说，德国之秋是一次创伤性的经历。

TUNIX 之旅

1978 年 1 月，在西柏林组织了一次 TUNIX（意为：*tu nichts*，“什么也别做”）会议。组织者主要是抗议“德国模式（*Modell Deutschland*）”的自发主义者，该模式在“德国之秋”之后代表着严厉的国家镇压。他们讨论了可能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并筹备设立一个关于西德人权状况的罗素法庭⁵⁹。自发主义者如此呼吁：

我们受够了这个国家！冬天太压抑，春天被污染，夏天太窒息。办公室、反应堆、工厂和高速公路发出的气味令人难以忍受。嘴里的东西（muzzles）味同嚼蜡，塑料包装的香肠也不再美味。啤酒同资产阶级道德一样平淡。我们不

⁵⁹Russell Tribunal，亦称国际战争罪法庭或罗素-萨特法庭，是一个由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组建，法国哲学家、剧作家让-保罗·萨特主持的，在道义上和国际法层面上对越战中美军的暴行作出审判的机构，是西方国家历史上公共知识分子的一次著名运动，并由一系列后续法庭所继承。



格罗恩德，1977 年

再想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和同样的表情。我们已经被命令得够久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公寓和我们的身份证件都受到控制。我们的脸被铁拳砸得稀烂。从现在开始，我们拒绝被逮捕，拒绝被侮辱，拒绝被变成机器人。我们要去 TUNIX 的海滩！

在会议召开之时，自发主义运动的状况经历了一些发展，大致可以用三句口号来概括：“梅斯卡莱罗⁶⁰城市印第安人”、“左派危机”和“两种文化”。

到 1970 年代中期，自发主义左派在不同的基层倡议中变得非常受欢迎。随着 K 群的消亡，受欢迎程度也在增加。自发主义者作为学生代表活跃在一些大学中。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印第安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并受到其意大利同志的影响。

1977 年春天，哥廷根的同志“梅斯卡莱罗”发表了西格弗里德·布巴克的死讯，引起了城市印第安人的极大关注。作者对布巴克的遇刺表示了“隐秘的喜悦 (secret joy)”，尽管文中提到：“我们的目标，即创造一个没有恐怖和暴力（侵略性和战斗性是与之不同的）的社会，一个没有强迫劳动的社会（辛勤工作则与之不同），以及一个没有法院和监狱（规则和条例，或者更好：建议——这类事物与之不同）的社会，这并不能正当化一切手段，而只有其中一些。我们通往社会主义（对我而言则是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不能用尸体铺就。”

尽管该文包括对红军派的明确批判，但它依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国家对非教条左翼的大规模镇压。在哥廷根，房屋和公寓被搜查，一百多条针对转载该文的出版者的预审程序被启动，该文本最初刊印在哥廷根学生会的报纸上。当一些大学教授在该文本的再版上签名时，他们受到了惩处。在下萨克森州，教授们被迫宣布他们“忠于国家”。彼得·布吕克纳 (Peter Brückner) 拒绝，并被停职。

虽然激进左派克服了许多内部矛盾，在镇压浪潮中团结起来，但在暴力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这为 TUNIX 会议的召开提供了背景。它反映了一些人脱离组织⁶¹和如同无政府主义反抗精神一样逃逸的愿望。最后，这次会议确实帮助自发主义者在德国之秋后重拾自信。以“爱斯基摩人奎恩 (Quinn the Eskimo)”、“弗兰基·李 (Frankie Lee)”和“犹大牧师 (Judas Priest⁶²)”为名的组织集体表示：

从古至今的左派弱点都在于它无法揭示统治的微妙机制，并用颠覆性的策略来与之对抗。普遍的不满是 TUNIX 取得“大规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

⁶⁰Mescalero，印第安部落名

⁶¹这里英文为“resignment”，意为辞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从资本主义系统中“辞职”，与无政府主义的逃逸精神相呼应

⁶²是的，这也是一个摇滚乐队的名字

这不仅是对西德国家的不满（这在民众中普遍存在，至少在表象之下如此），也是对给出的变革策略的不满。因此有必要与其他感同身受的人们走到一起。

就个人而言，我们也对我们中许多人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我们认为，与同志们的行动保持距离或对整个政治气候作出战略让步，是对我们身份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 TUNIX 的呼吁中的某一时刻也呼吁着反抗，一种“现在我们必须特别激进”的感觉。我们的身份是激进左派。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就只剩下犬儒主义了。

在会议的最后行进中，人们也表达了这种情绪。以下是资产阶级报纸《每日镜报》(*Tagesspiegel*) 的描述（1978 年 1 月 29 日）：

多年来，柏林的示威活动首次演变成暴力事件。当大约五千人聚集在一起，结束在高等工业学校举行的为期三天的 TUNIX 会议时，有人向教师大街 (Lehrter Straße) 的女子监狱外的警察投掷油漆弹，在莫阿比特 (Moabit) 的塔楼大街 (Turmstraße) 的法院大楼外投掷鹅卵石。抗议者包括自发主义者、城市印第安人和其他非组织左派。他们来自柏林、西德和西欧……万字符和党卫军如尼字母被涂在警车上……位于哈登贝格大街 (Hardenbergstraße) 的美国之家遭到了石块的轰炸……一辆音响卡车拉着一面写有“德国模式 (*Modell Deutschland*)”的巨大德国国旗穿过街道。在选帝侯大街 (Kurfürstendamm) 和约阿希姆斯塔勒大街 (Joachimstaler Straße) 交界处，这面旗帜在警察和路人的注视下被烧毁……无政府主义者举着横幅，上面写着：“斯达姆海姆⁶³无处不在”、“扫除尘土！”和“恶心！”游行路线上的房屋被涂鸦，例如，“释放 Agit⁶⁴印刷人员 (Agit 是一个激进的印刷集体)”和“无政府主义是可能的”。在几所监狱外，抗议者高呼：“释放囚犯！”

TUNIX 的组织者在一个月内成功地动员了一万五千到两万人。这证明激进交流和信息渠道仍然完好无损。TUNIX 是德国自发运动的高峰。虽然自发主义者已经证明自己有在德国之秋后不久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的能力，但在会议结束后，“两种文化”的现实已经形成。

“两种文化”一词来自意大利，它是在意大利自治运动和共产党的冲突中出现的。在西德，它首先被社民党成员用作宣传术语，他们勾勒出整合激进左翼的新战略。其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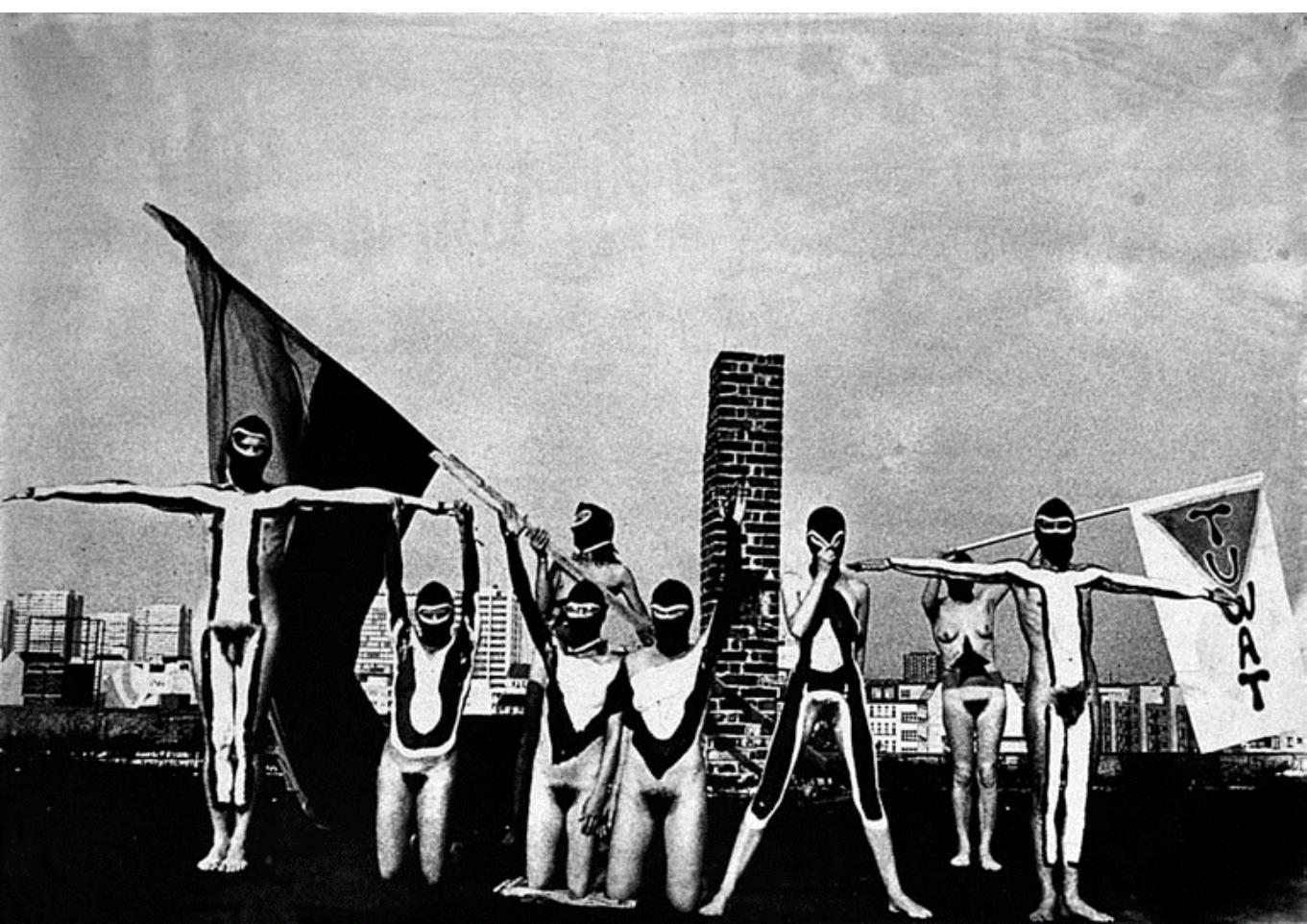
⁶³ 斯达姆海姆正是红军派领导人被关押之处

⁶⁴ 指 Agit883，红军派的第一个公报正发表于此

是将新兴的替代运动的抵抗和自治冲动纳入官方的“政治话语”，从而安抚这些冲动。替代文化应该成为“社会实验室”，成为主流文化的“试验场”。社会民主主义将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最具创新性的冲动中有利可图。不幸的是，“两种文化”的想法也被自发主义阵营中的部分人强调和接受，他们似乎对这种来自高层的认可感到受宠若惊。这个词也加剧了人们的幻想，即人们可以通过沉迷于“另类反文化”来摆脱“资本主义主流文化”。

1978 至 80 年，西柏林和西德出现了数量空前的替代经济项目；在法兰克福的住房斗争之后，这种趋势已经发展至全国。西柏林变成了替代运动的秘密首都。1979 年的一项调查称，该市约有十万人认为自己——至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替代运动的参与者。

然而，将替代运动融入体制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西柏林，替代运动也为 1979 至 80 年出现的激进的占屋运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1 年，在一波占领浪潮之后，组织了一次 TUWAT (*tu was*, “做点什么”) 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该会议还试图将意大利自治运动的理论与本地的住房斗争联系起来。这只是激进主义历史延续性的一个例子。



第二部分

1980 年代德国自治运动的诞生

在 西柏林和西德，1980 至 1983 年间，新社会运动出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崛起。部分原因是，这些运动是从替代运动中产生的——至少在替代运动仍然具有反文化完整性的城镇和地区。这些运动也是从某些单一主题的运动（反核运动、占屋运动、西跑道运动⁶⁵、和平运动）中发展起来并拓宽了它们自己的政治视野。最后，它们是由 1980 至 81 年的欧洲社会起义引发的，其中苏黎世和阿姆斯特丹的事件具有特别的影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记者经常谈论“青年起义”，这具有误导性——大多数事件主角并不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对社会和政治的深刻不满而掀起叛乱。“青年起义”一词也忽略了事件的政治历史。如果没有多年的政治组织，所谓的青年起义会表现为零星的、被误导的青年激进主义，而不是针对核电站和机场的行动以及针对住房政策的抗议等等。许多老同志对起义感到惊讶，因为他们曾以为在德国之秋后不会再看到这种街头激进主义。

在新社会运动（the New Social Movements）内部，一个自治派别已然成型：激进、以青年活动家为主力。他们受到当时“没有未来”态度（the “No Future” attitude）的强烈影响，以对抗资产阶级的控制和统治规范，并将他们自身的需求变为政治问题。所谓的全体会议（*Vollversammlungen*）取代了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大学辩论宣讲会（teach-in），成为交流的核心形式。全体会议在资产阶级公众之外创造了一个讨论政治目标和战略的空间。本章将描述 1980 年代上半叶自治运动的历史，特别是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

新社会运动试图为 1970 年代中期以来困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提供解决方案。在 1970 年代末，左翼自由派学者和学生使用这个词来暗示这是一个 1968 年学生起义的延续。然而，新社会运动受到了中产阶级视角的强烈影响，在对新社会运动的学术评价中，绿党常常被解释为基层思潮在政治上的成功，新社会运动的“现代主义”冲动及其对“价值观的改变”的贡献也得到了强调。事实上，拥核黑手党（the nuclear mafia）的一些代表对反核运动表示感谢，因为它有助于避免或推迟无利可图的项目。此外，即使是发电厂的主管们也喜欢健康生活，在麦片店购物以及吃健康的生态动力食品。在某种意义上，新社会运动研究的“世界精神（Weltgeist）”成功地将以前对立的政治思想统一在哈贝马斯大叔（Uncle Habermas）⁶⁶的新社民主义“现代性计划”中。在环保替代运动的暗淡中，像“阶级斗争”或“帝国主义”这样的术语显得过时且无关。重要的是“本质需求”、“参与”和“共同管理”。学者们甚至设法说服许多人相信在布罗克多夫（Brokdorf）和格罗恩德（Grohnde）他们的带有强烈反资本主义和反权

⁶⁵ Startbahn-West，反对法兰克福机场建设西 18 号跑道的运动

⁶⁶ 尤尔根·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领导人物、第二代新左翼哲学家

威主义色彩的激进反核斗争只是因为“沟通失败”和能源供应系统规划中“缺乏参与”而引发的，以及最后一点，学者们试图让大家相信斗争是有效且对每个人都有利的。不管怎么样，如果某些学者认为自治运动只不过是对“新贫困”中产生的替代运动的“挑战”，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只能证明，一些学者对于他们应该像专家一样掌握的东西知之甚少，但这些对付论战足够了。

新社会运动与福特主义（Fordism）密切相关，后者是二战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结构。福特主义的特点是异化的大规模生产（以汽车厂装配线为代表）、大规模消费，以及对阶级冲突的政治和法律管制。阶级对立的制度化也意味着，交涉通常发生在生产领域之外，特别是在西德。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运动”一词试图解释在国内几乎没有公开阶级斗争的时候意外出现的基层运动的构成、潜力和意义。例如，反核运动是在再生产领域形成的，有着非常复杂的阶级结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受到官方工人运动的反对，特别是在核工业和能源行业，德工联（DGB）的改革派工会动员技术工人参加明显亲核（pronuclear）的运动。

虽然许多活动家有着中产阶级背景，但他们对平等主义结构和反资本主义目标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诚然，某些游说团体（例如，与反核运动有关的大农场主）利用新社会运动的开放性来谋求个人的利益。毕竟，只要能得到支持，许多人并不关心谁在他们认为重要的斗争中支持他们（例如，反对镇上的核电站）。然而，这决非削弱了这些运动的政治意义。它只是表明在社会运动中克服某些文化障碍是多么具有挑战性。1973年，在K群批评了*Bürgerinitiativen*（BI），即“公民倡议”的出现之后，西柏林红色援助（Red Aid West Berlin）的同志们发表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声明：

僵化的反修正主义和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排他性集中都导致左翼脱离现实。左派完全忽略了再生产领域的冲突。公民倡议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不感兴趣。反威权运动的清算意味着政治实践的两个重要方面被遗失了：社区和工作场所的基层行动主义（经常被嘲笑为“业余主义（dilettantism）”）和直接行动（经常被嘲笑为“自发主义”）。这两方面都不被认为对工人阶级的组织有帮助；相反，它们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文化的表现。对阶级身份的僵化使用使反威权运动失去了合法性，并将其主角贬低为他们阶级出身的代表。尽管反威权运动事实上通过共同的群众行动克服了阶级差异，但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根据左派对公民倡议的批判，雄辩的、有竞争力的中产阶级活动家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对阶级的严格定义否认了政治经验，而仅仅教条地重复着社会学结论。重要的不是不同阶级的成员团结在公民倡议中这一单纯的事实。重要的是这如何影响阶级认同，它



是否有助于克服阶级差异，以及如何使阶级背景的混合在政治上进行生产。当前阶级分析的任务是研究为特定利益而进行的共同斗争是否切实地挑战了阶级差异（《时刻表（*Kursbuch*）》，31号刊）。

这段话揭示了“中产阶级”一词的误导性有多大。这个问题也影响到了激进左派和自治团体。特别是当以简化和贬义的方式使用时，“中产阶级”一词轻易地掩盖了工业化国家的阶级现实。资本主义在西德的发展为大部分下层阶级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即使财富的总体分配仍非公正。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工人有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经济奇迹”中，使他们成为消费社会的组成部分。这严重打击了反对派和共产主义力量的信誉。德国资本主义在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结构的同时，使阶级更加具有流动性，这有力地强化了该体系的稳定程度。然而，同样的发展也为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福特主义使越来越多的人具备了持续的体制外（noninstitutional）行动所需的时间和技能……此外，教会和传统工人组织中的传统组织形式的消解，以及文化表达形式的增加，扩大了个人行动的范围”（Hirsch/Roth）。学生和学者——也就是“中产阶级”——在激进左派和自治运动中的强大存在，只是这些发展的一个结果。

至少由于它们对阶级身份的挑战，新社会运动动摇、质疑和挑战了现有社会秩序的许多方面，因此为自治运动的出现开辟了空间。尽管自治运动在政治要求和政治实践方面都远远超出了新社会运动的范围，但它与新社会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社会运动”一词也比“阶级斗争”一词更适合描述自治运动现象。阶级话语从未缺席（“住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但它们往往显得相当牵强，并从未被广泛使用。



反核运动：1975-81

西

德反核运动是随着 1973 年所谓的“石油危机（Oil Crisis）”而来的新能源政策的回应。核电被誉为能源危机的新解决方案，并且当局计划在农村地区建造核电站，作为德国电力供应的廉价和生产性支柱。大公司计划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计划，包括钢铁厂和制药厂。在一些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例如下易北和上莱茵地区，得到了特别的重视。面对“新鲁尔河谷（new Ruhr Valleys）⁶⁷”的恐怖前景，法国、德国、瑞士三国交界处形成了第一个广泛的民众抗议运动。人们通过占领建筑工地阻止了数座核电站的建造——例如，位于巴登-符腾堡州的维尔（Whyl）。

1975 年 2 月，随着三万多名抗议群众对建筑工地强袭和占领，维尔的抵抗达到顶峰。抵抗的规模让国家完全措手不及。部署在现场的警察单位被召回。恐慌在统治机构中蔓延。巴登-符腾堡州州长汉斯·菲尔宾格（Hans Filbinger），一位前纳粹党员，如此说道：“如果人人都像这样，国家还怎么治理！”施工地点一直保持着占领状态，直到宪法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决定无限期停工，当局承诺赦免所有抗议者。

上莱茵地区的反核冲突主要由保守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环保主义者以及当地农民和葡萄酒商进行的。生态主义、传统主义和地区主义观点的混合主导着这场辩论。然而，这些行动也得到了来自弗赖堡（Freiburg）的左翼学者和弗赖堡西共同（KBW）分部的支持——一些行动已经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内涵。例如，国家当局与能源公司之间的合作被公之于众。运动中的一些矛盾被共同的学习经历⁶⁸ 所克服，这改变了许多活动家的日常生活。总体而言，抗议活动发出了一个信号，即进行制度外抵抗仍可能成功。对于激进左派来说，在住房斗争的失败和国家镇压愈发强力之后，这非常重要。

⁶⁷ 鲁尔区是德国的主要重工业区，在二战时受到了盟军的重点轰炸

⁶⁸ common learning experiences，可能带有“在斗争中学习斗争”之意

布罗克多夫

当反对在距离汉堡不远的，另一个正在开发的下易北地区的布罗克多夫（Brokdorf）建设核电站的抗议运动出现时，激进左派开始成为反核斗争的主要因素。正如技术官僚所言，许多村庄被摧毁，居民“重迁（relocated）”；或者更直白地说，成千上万的人被迫流离失所，为建造制药厂和核电站腾出空间。当布罗克多夫-韦韦尔斯夫莱特（Wewelsfleth⁶⁹）地区的另一座核电站计划公布后，公民倡议下易北环保组织（Bürgerinitiative Unterelbe Umweltschutz，BUU）成立。类似的倡议行动随之而来，一直延伸到汉堡。

1976年10月30日，布罗克多夫举行了第一次游行示威，八千余人参与。计划中的建筑工地的一部分被占用。天黑后，占领者被警察暴力（brutally）驱散。11月14日，布罗克多夫举行了第二次示威。这一次有四万人参加。这是西德历史上第一次部署了联邦边防部队以应对抗议活动。根据1968年通过的紧急状态法案，这⁷⁰是被允许的。抗议者仍然设法拆除了长长的安全部围栏。警察最终用直升机发射的催泪弹袭击并驱散了示威活动。

然而，当局的恐吓策略并未奏效。在警察干预和反对核计划的公民倡议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后，反核运动迅速发展。多个建筑工地遭到袭击，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多次冲突。该运动得以将当地居民的抵抗与激进群众斗争的概念结合起来。

1970年代反核运动的政治和社会构成

在第三次布罗克多夫示威的准备期间，反核运动发生了第一次分裂。由社民党（SPD）、德共（DKP）和大部分公民倡议成员组成的“合法”派，发现自己陷入了与激进一翼的对立，后者则由公民倡议中的激进派、K群、自发主义者和非组织活动家组成。另一个分裂发生在汉堡，公民倡议下易北环保组织分会（BUU）分裂为与共产主义同盟（KB）相关联的一翼和独立的一翼。此外，该运动的“非暴力”分支开始关注1977年春天的一场特定的斗争，即反对计划中的戈尔莱本（Gorleben）核废料倾倒场。城市活动家、社会名流和当地资产阶级组成了吕肖-丹嫩贝格公民倡议（Bürgerinitiative Lüchow-Dannenberg），它奉行严格的非暴力抵抗概念，而拒绝了所有其他抵抗形式。在反核运动的背景下形成的许多“绿色”、“多彩”和“替代”清单（lists）造成了进一步的分歧，这些清单作为绿党的前身参与地方和地区委员会的竞选。这些名单联合了各类人群：公民倡议边缘的社会地位稳固（socially secured）的中产阶级活动家、逃离城市

⁶⁹原文将 Wewelsfleth 误拼写为 Wewelsfleht

⁷⁰指部署军队进行镇压

的学者和艺术家、教师、农民、自由学者，甚至是“具有社会意识的”官僚。在农村地区，清单主要由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者组成，而在城市地区，清单中往往聚集了幻灭的社民党和自民党（FDP）人，或是 K 群成员。

非组织活动家——他们后来成为自治运动的主体——是激进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揭露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所谓“中立”和“客观”科学的核心。在西德，激进左翼活动家首次在广泛的公民运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公民倡议和环境倡议通常被视为“普通公民的议会外反对派”。他们的成员大多具有中产阶级背景。这在最正统的左翼派别中引起了混乱，尤其是那些仍然将工厂工人视为社会解放核心要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例如，汉堡的共产主义同盟嘲笑、诋毁，有时甚至干涉布罗克多夫的“小资产阶级”反核运动。

1976 至 77 年反核运动的迅速发展和相对成功不仅让国家感到惊讶，也让广大激进左翼感到惊讶。它表达了许多人的希望，即至少取得对国家和企业游说方面的部分胜利是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核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单一问题事务。它是挑战统治性的社会条件的焦点，并不断吸纳各种各样的反对力量。非组织活动家的实践让人想起 1968 年学生起义的高光时刻。在某些时刻，他们对 1976 至 77 年反核斗争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非组织活动家的核心原则是“实际抵抗（practical resistance）”，这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主地决定参与斗争。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公民倡议的抗议不仅仅是口头的，而是需要采取实际步骤来满足抗议要求的——即使这需要打破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或宪政国家的法律框架。这种方法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因为反核运动的去中心化特性在国家镇压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治（Autonome）”一词开始表示特定的激进分子。自治强调了即时和自我负责的行为的重要性。公开行动事先公布，违法行为事后解释。个人身份无关紧要，因为其通常是隐藏的。选举因无用而被拒绝，因为人们无法通过宣传错误的事物（投票）来激励人们做正确的事情（实际和独立地行动）。

1978 年 9 月，汉堡的政治经济学工作组（Arbeitskreis Politische Ökonomie）如此描述了反核运动的组织结构：

对社会进行“正确”分析并披露其遵循的法律是不够的。相反，我们需要自主的社会结构。目前，这些结构可能只能作为抵抗的结构，但一旦人们意识到他们掌控局势并威胁到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它们就会导致实际的变化。必须建立对自己能力的信任。社会变革不是通过用一些人取代一些当

GORLEBEN



WENN SIE DICH FRAGEN, WIE KONNTE DAS GESCHEHEN
KANNST DU DANN SAGEN, DU HAST ES NICHT GEWUSST?

戈尔菜本：

“当他们问你，为何这一切会发生。
难道你会说，你什么也不知道吗？”

权者来创造的——即使这些人相信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变革来自于人们积极参与影响自身的政治决策。关键原则是自治、平等权利和直接行动。因此，有必要建立独立的沟通和协调结构。革命运动不仅是“客观条件”的结果，而且是这是我们得以建造的社会结构的结果（《回顾与观点》（*Bilanz und Perspektiven*））。

1978-80：你能用栅栏封锁钻孔吗？

1980 年，反核运动中的自治团体宣传了“让我们把布罗克多夫的栅栏塞进戈尔莱本的钻孔！”的口号。与此同时，1980 年春天，戈尔莱本的钻井现场遭到占领，“1004 号村庄（Village 1004）”和“温德兰自由共和国（Free Republic of Wendland，温德兰是戈尔莱本所在地区的通用名称）”宣告成立——这一切都是在教条的非暴力前提下。这引发了严重的冲突。虽然非暴力活动家希望 1004 号村庄成为和平替代的田园牧歌，但自治主义者则希望它成为直接打击拥核黑手党的基地。最终，自治主义者落败并离开。

1980 年 7 月上旬，温德兰自由共和国在一场比赛突袭中被一万余名警察摧毁。大约两千名占领者虽然没有积极反抗，但遭到了严刑拷打，有些人受了重伤。非暴力活动家的发言人认为这是“重大的道德胜利”。但自治主义者评论到：“国家不仅设法用警棍和机枪伤害人们。它还设法渗透入他们的头脑、思想、感觉和欲望”（反核电报（*Anti-AKW-Telegramm*⁷¹）。

布罗克多夫抵抗运动，1980-81

1980 年 10 月议会选举后不久，由社民党领导的西德政府与基民盟领导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政府宣布，布罗克多夫核电站的建设将继续进行。来自德国北部的公民倡议在建筑工地组织了一场八千余人参与的示威活动。该地点周围的围栏遭到攻击，人们设法放火烧毁（驱逐用的）水炮。成功的示范重新点燃了对布罗克多夫工厂的广泛抵制。在汉堡，汉堡电力公司（Hamburgische Electricitäts-Werke，HEW）的办公室和其主管的住宅遭到汽油弹袭击。与此同时，公民倡议计划在 1981 年 2 月上旬在布罗克多夫举行的汉堡社民党特别党代会上进行游行示威。这导致了运动内部的政治分裂。社民青（Jusos）和德共（DKP）希望利用示威来提升他们在与社民党领导层谈判中的地位，而自治主义者则希望将自己确立为一个自决和独立的政治力量。当德共（DKP）和社民青无法掌控运动为其所用时，他们开始转而谴责自治活动家。然而，这只会进一

⁷¹ 该“电报”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工作组的宣传报，其中 „AKW“ 表示 „Atomkraftwerke“，即“核电站”



布罗克多夫，1977

步削弱他们在运动中的地位。最终，自治主义者、共产主义同盟和一些公民倡议成员在汉堡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它被汉堡参议院禁止。2月2日，近万人无畏地参加了游行。同日，社民青组织的示威活动吸引了约两千人参加。

沿着大游行的路线，银行、豪华酒店、保险公司和性用品商店的窗户被打碎，一家相机店被洗劫一空。当抗议者试图进入市中心时，与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来自汉堡的自治主义者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们的抵抗不仅仅在周末或某个特定的地点。抵抗纵贯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力量不是来自对警察和其他国家机器的技术优势，亦非来自严格的组织，或是与政客的巧妙协商。它来自我们自己的政治和战略理念、我们自己的沟通结构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法律威胁到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完全有权违法。”（《反核电报》）

几周后，公民倡议动员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示威。媒体以通常的诽谤相回应。2月22日，《图片报》的头条赫然写着：“布罗克多夫：炸弹、火灾、绑架？”建筑工地范围内的所有示威活动都被禁止，这基本上意味着民法的暂停。2月28日，反核运动成功地引导十万人越过了警方设置的障碍。这是一个巨大的调度成功。自治团体集中参与了规划。他们还准备了备用计划，以防障碍无法逾越：返回汉堡进行“有效行动（effective actions）”。警方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推迟示威的开始并让进入游行出发点变得困难和令人疲倦，从而使抗议者筋疲力尽。此外，通常的镇压手段也依然被采用。离开示威的抗议者被直升机追赶，而特别警察突击队（SEK）则从全国各地聚集，追捕抗议者，并将其中几人严重致伤。激进分子相当克制。战斗主要用于保护自己免受警察暴力。不幸的是，警察的策略似乎奏效了。许多抗议者显得疲倦，施工现场没有受到重大打击。尽管如此，这是在卡尔卡尔冲击之后，反核运动第一次能够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共同示威。但无论那天赢得了什么“道义上的胜利”，仅造成工厂停工两天的破坏是不够的。结果，对该地区的建筑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直接行动和破坏——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害。然而，这些行动也无法阻止建设过程，也没有引发激进的群众抵抗。

强权在布罗克多夫的胜利——特别是德国北部社民党的胜利——助长了拥核黑手党的气焰，它迅速开始建造更多的核电站。反核运动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再次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进行大规模示威。

然而，德国北部自治团体的政治力量远没有被布罗克多夫的失败所摧毁。自治主义者只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1980年5月6日，许多自治团体参与了反对联邦国防军阅兵的激进抗议活动。自治运动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抵抗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地点和问题，而必须包括“住房斗争、反战斗争……和与监狱酷刑作斗争，（与一切）破坏我们的资源和环境并导致异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事物作斗争）。”（布罗克多夫 1981年2月

BROKDORF 80



DER BAUPLATZ MUSS WIEDER ZUR WIESE WERDEN!

“将工地变回草地！”

Brokdorf 81:

**8 Jahre Widerstand —
Der Kampf geht weiter!**



28.2.81

Großdemo am Bauplatz

In Brokdorf haben wir 1976/77 auf mehreren Demos am Bauzaun gezeigt, daß wir entschlossen sind, auch militärt gegen den Bau von AKW's zu kämpfen. Durch unseren Widerstand und den mehrjährigen Kampf der örtlichen Bevölkerung wurde Ende 76 ein Baustopp erreicht. Die Atommeid hat immer wieder versucht, unser gemeinsamen Kampf zu zerstören, uns in gewaltfreie und militante AKW-Gegner zu spalten, und damit unserm entschlossenen Widerstand die Spitze abzubrechen.

Nachdem vor einem Jahr der Baustopp aufgehoben wurde, hat am 6.2.81 der Weiterbau begonnen. Die Pappnassen von der Bundesregierung und der schleswig-holsteinischen CDU-Landesregierung wollen damit die Weichen für die weitere Durchsetzbarkeit des Atomprogramms stellen.

Doch wir werden nicht tatenlos zuschauen! Auch Leute, bereit sich jetzt in Gruppen auf die Demo vor. Es wird bestimmt keine Spaltung werden.

Wir wissen, daß das AKW-Brokdorf und das Atomprogramm nicht durch eine einzelne Demo vernichtet werden kann, wir müssen uns deshalb nur einen langfristigen und vielseitigen Widerstand einstellen.

KEIN AKW IN BROKDORF UND AUCH NICHT ANDERSWO!!
Informiert Euch bei unserem Kontakttelefon: Freunde der Erde, 692 87 79 ab Montag, den 16.2.81 täglich von 16-18 Uhr.

Spendenkonto: Sonderkonto Werner Kranawitter, Postscheckamt Berlin-West, Konto-Nr.: 34 75 15 -107, 1000 Berlin 21

“八年的反抗——战斗还将继续！”

BROKDORF PROZESSE



Michael Duffke
Seit 4 Mon. im Knast.

min. 13 Prozesse werden
vorbereitet.

min. 15 Ermittlungs-
verfahren laufen.

Ermittlungen gegen
78 UU Mitglieder wegen
Verdacht auf Bildung
ein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 129a)

Termine + Infos: Ökoladen Turnerstr. 9 HH6 Tel. 432364
Spenden: Stichwort Brokdorf Nr. 118413
BLZ 2003000 Vereins- und Westbank

FREIHEIT FÜR ALLE AKW-GEGNER

为了每个反核者的自由

28 日：《回顾与观点》报道）。

在 1981 至 82 年，许多自治活动家参与了抗议，反对在所谓的布罗克多夫审判中将反核活动家定罪。在最后一次布罗克多夫示威期间，一名特别警察突击队军官被解除武装并被阻止采取进一步行动。根据一张耸人听闻的新闻照片，石勒维格-荷尔斯泰因州内政部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谋杀未遂”搜捕行动。其目的是诋毁和恐吓反核运动。自治运动用他们自己的宣传活动反击，最终迫使当局撤销了谋杀指控。在他们的团结工作中，自治主义者宣布激进抵抗核电站建设和袭击警察是合法（legitimate）的。这种激烈的策略无法阻止对马库斯（Markus）和迈克尔（Michael⁷²）的严厉判决，但它引起了公众对判决的广泛抗议。

小结

西德的反核运动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式取得了成功。它迫使世界第三强国的能源政策暂时停止。它还向在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所宣传的“德国模式”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德国模式建立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世界市场资本和强大的工会化的技术工人阶级的结合之上。1970 年代的反核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该模式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

事后看来，布罗克多夫的斗争成为了西德自治运动的摇篮之一。在 K 群解散和绿党成立之际，自治运动已然成功地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

⁷²可能指 Michael Mariotte



“克罗伊茨贝格 36 号被驱逐——战斗吧，朋友们！”

西柏林占屋运动：1980-83

1 1980 至 1981 年，一股新的占屋浪潮席卷全国。以西柏林为中心，彼时有超过 160 座建筑被占领。柏林的占屋运动建立在社区和租户多年来反对住房投机和社区士绅化 (gentrification) 的倡议之上。1979 年，由公民倡议 SO 36 (Bürgerinitiative SO 36, “SO 36”) 代表该区东部和经济最薄弱的部分，也被称为“克罗伊茨贝格 36 (Kreuzberg 36)”) 和各个租户组织发动了占领-恢复运动 (*Instandbesetzungen*⁷³，一个德语文字游戏，结合了占领 (*Besetzung*) 和收复 (*Instandsetzung*))。1980 年 12 月 12 日，警察试图阻止占领，引发了所谓的双十二暴动 (12/12 riot)，极大地推动了运动。许多非占屋运动参与者首次参与暴动，警察的严厉镇压导致了对占屋运动的广泛声援。声援委员会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活动家，并发出警告，声称否则“在圣诞节被烧毁的将不只是圣诞树”。克罗伊茨贝格和邻近的新克尔恩 (Neukölln) 的一些占领区宣告成立“自治共和国”。占屋运动也从当局的腐败丑闻中获得优势，这些丑闻使社民-自民党领导的参议院失去了合法性。特别是在克罗伊茨贝格和舍嫩贝格 (Schöneberg)，政治和法律真空为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空间。

1981 年，该运动在“合法、非法、无所谓 (Legal, illegal, scheißegal!)”的口号下迅速发展。约有三千人住在占领屋中，并作为自治集体组织了其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出现了一些支持占屋者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例如，6 月在舍嫩贝格市政厅举行的“特赦示威”和在炒房者居所前举行的“格鲁内瓦尔德 (Grunewald) 示威”。在特赦示威中，一家超市被洗劫。资产阶级媒体谈及“叛乱”，并宣布盟国安全部队将介入“以维持城市的和平与秩序”(柏林晨报 (*Berliner Morgenpost*)，1981 年 7 月 5 日)。

该运动以小组的去中心行动回应警察的镇压。为了抗议法院对一个占领区的严厉判决，他们用两晚成功堵塞了四十家银行的锁，并砸碎了另外七十家银行的窗户——所有这些行动的口号是：“你们拥有权力，我们拥有夜晚！”此外，在柏林的主要的商业街选

⁷³-en 是复数后缀

Helft alle mit:

Große Winterfestmachung

der besetzten Häuser

Erkundigt Euch schon jetzt, wo Ihr einzeln oder in Gruppen arbeiten können und was noch gebraucht wird. Offizieller Start der Unterstützungsaktionen zur Winterfestmachung ist **Freitag, der 30. Oktober**. Ab dann sollten auch endlich die Transparente gegen Räumungen etc. aus den Fenstern gehängt werden!!!

Aufruf

Von Räumungsdrohungen lassen wir uns nicht beirren. Die Häuser sollen leben – auch über den Winter hinaus! In vielen Häusern laufen die Arbeiten für die Winterfestmachung an. Die Folgen jahrelangen Leerstands und der planungsmäßigen Zerstörung durch die Spekulanten müssen beseitigt werden, damit Häuser und Bewohner über den Winter kommen.

Die „Besetzer-Zeitarbeit-Intim“ sucht:
Facharbeiter – Fachberatung – Abwehrspezialisten – Materialspenden (Holz, Baumaterial, Installationen, Handwerkszeug, Ofen ...) – jede Menge Kohle (Geld) und viele, viele ein anpacken. Es gibt viel zu tun. Kommt alle zum Arbeiten, Quatschen und Feiern ...

Es rufen auf: Die Besetzer, Paten und Unterstützer

Anlaufpunkte in verschiedenen Kiezen:

- Kreuzberg 36, Infobuden Dresdener Str. 16, Tel: 65 22 79
- Nieukölln, Reichplatz 8, Tel: 687 47 45
- Wilmersdorf, Wilmersdorfer Str. 10, Tel: 687 47 45
- Charlottenburg, Christrie 42, Tel: 321 11 41
- Kreuzberg 61, Wilhelm-Alexis-Str. 42, Café Croatscho
- Zehlendorf, An der Rathweiss 4
- Wedding, Café Kornknaide, Kummstraße, Tel: 651 43 44

Spendenkonten:
PSchKto Bln W,
Barbara Mohren, Nr. 421976-106,
Sparkasse der Stadt Bln W,
Sonderkonto Bernfried Adam, Nr. 067007404

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发生了许多突发暴动。这些事件造成了数百万德国马克的损失，并招致施普林格报刊的头条新闻，如“柏林因愤怒而沸腾！”这些斗争也增强了受到国家镇压的其他受害者的团结意识。1981年3月，万余人参加了支持红军派囚犯绝食的示威活动。

在早期，蓬勃发展的占屋运动少有“理论”指导，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政治思想。许多占屋者来自非教条主义左翼-替代运动社群，经历过反核、学生和监狱团体的斗争。运动中的早期政治辩论涉及与国家的谈判。反对谈判的人的主要论点是，许多占屋者都在监狱里。支持谈判的人的主要论点是，已经被占领和收复的房屋需要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形下，似乎是为了安抚资产阶级公众，第一批关于“可敬的”占屋者的媒体报道描绘了有创造力的和平主义者如何将破旧的建筑变成迷人的替代性住宅。

自治概念和西柏林住房斗争

在占屋运动中，“自治（Autonome）”一词也越来越受欢迎。相关的辩论发表在《激进（radikal）》月刊上。一些自治者在1983年写道：“‘自治’是一个似乎可以完美概括我们的斗争的术语。从意大利引进并在‘自治论点（Autonomy Theses）’（见附录）中展现给我们的战场，它很快就代表了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一切，现在也是如此。早些时候，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发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而有些人对解放的生活有着模糊的、个人的想法。然后我们都成了自治主义者”（第123/83号）。

《激进》上的“自治辩论”也清楚地表明，自治主义者（Autonomen）与1968年学生起义的自治（autonomous）前辈们不同。在第98/81期中，同志们写道：“向意大利自治运动（Autonomia）寻求帮助，并不能解决我们的身份问题”。在同一期中，一些自我认同的自治主义者将“自治”定义为要求“在此时此地实践不同的生活形式”。他们继续说“资产阶级社会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前景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具体步骤，将我们的不安和破坏倾向转化为满足我们的需要并允许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系的替代结构，那么一个不同的前景——即一个解放的社会——就不可能存在。这需要一场文化革命”。工作被普遍拒绝，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自治结构不是在工作场所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基础是共同的“亚文化”。

然而，一些自治主义者拒绝这个定义，因为它远非真正的自治概念，自治意味着反对雇佣劳动的集体斗争和对资本统治的政治和经济攻击。事实上，部分占屋者主要将自治理解为个人从生产过程中撤出。这除了在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下是一个虚幻的目标之外，也放弃了影响整个社会的任何尝试。

自治政治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转向也许在一篇题为《停滞是运动的终结（Stillstand



ist das Ende der Bewegung)》的文章中得到了最深刻的阐述，该论文发表在《激进》第1/82号刊上，并重新讨论了“自理论”的第一条：“我们为自己而战。我们不参与代表性的斗争。我们不为意识形态、不为无产阶级、不为‘人民’而战。我们为自我决定的生活而斗争”。

自治运动是如何走向当前的境况的？当占屋运动出现之时，西德的阶级冲突几乎不可见。阶级斗争不是激进政治的参考点，但除此之外，人们只能将注意力转移到周围环境中的自身需求（通常由替代运动定义）上。在许多自治占屋者看来，这就是他们斗争的“真正基础”。“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左翼和替代斗争的成员，一直在努力创造结构，使我们能够自我决定地生活，并集体组织我们的生活。这涉及到我们的经济事务，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酒吧，我们的文化活动，等等……在这些相对自由的空间里，我们有可能尝试集体生活的形式，并将激进的经验转化为日常生活。此外，证明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有回报的，这是很鼓舞人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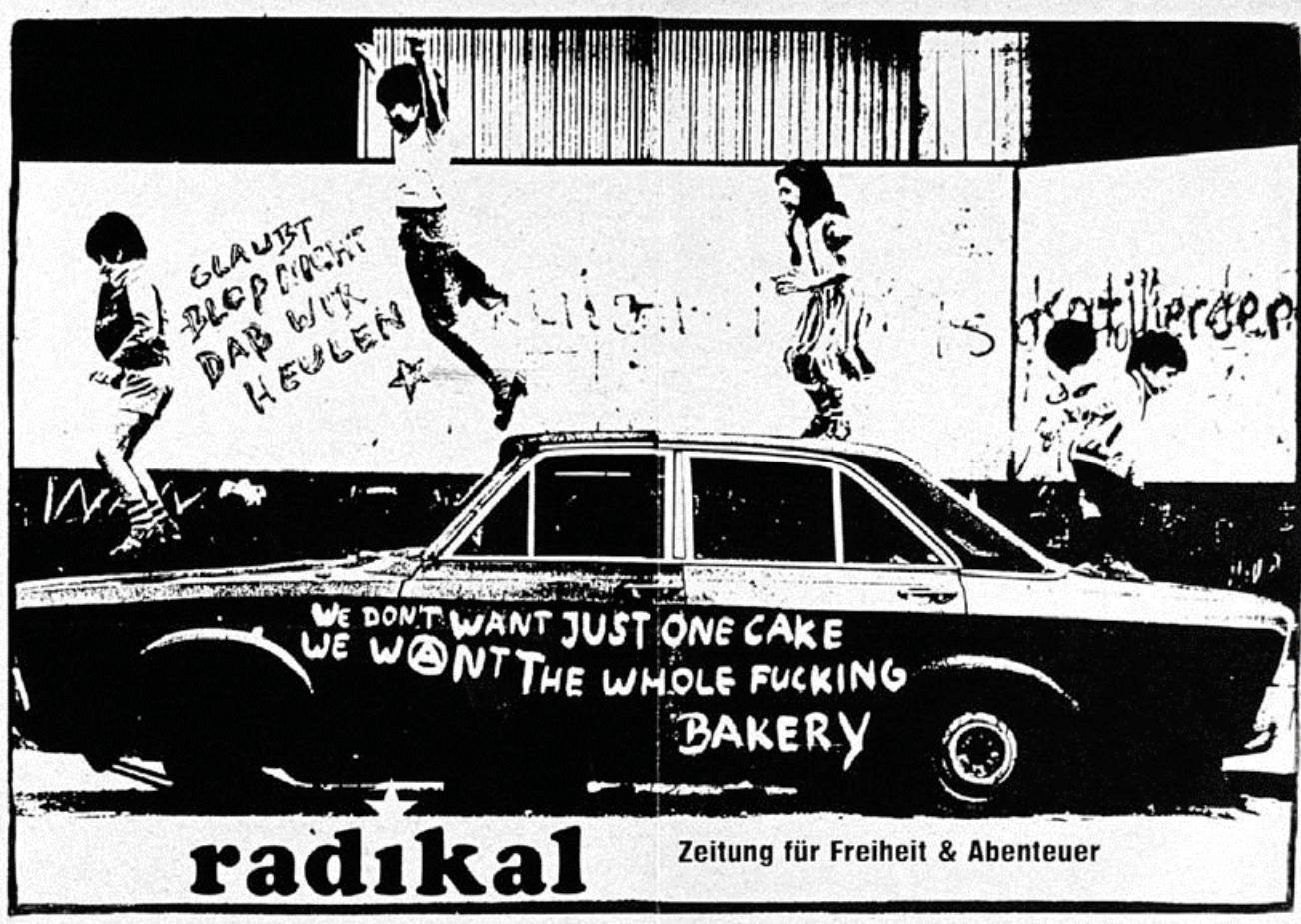
一些自治主义者仍然意识到逃避主义的危险性。他们回应地批评了替代运动：“替代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家只对重组自己的生活感兴趣，而不是与制度作斗争。他们建立社会利基（niches），只有在这些利基受到威胁时才会活跃起来。我们拒绝这种做法。我们的自我组织形式应该是我们斗争的组成部分——而不应是目标。”

对于流行的术语 *Freiraum*，即“自由空间”，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意见。“我们并不批评相对自由空间的存在，而是批评作为目标的‘自由空间’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自由空间只是更广泛斗争的出发点。仅仅建立和捍卫它们……是经典的改良主义！它没有对制度提出挑战。事实上，资本主义证明了它是多么灵活。‘自由空间’被整合，抵抗被引导，贫民区被创造。没有爆破般的力量（explosive force），我们剩下的只是一所游乐场。”

住房斗争的终结

1981年9月22日，八所柏林占领屋被驱逐。克劳斯·于尔根·拉泰（Klaus Jürgen Rattay）在逃脱警察追捕时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受致命伤。随后，占屋运动在西柏林对各左翼自由主义者（left-liberal）的动员达到了顶峰。国家给了占屋者两个选择：驱逐或签订租金协议——也就是合法化。运动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当局日渐将这种行为赋罪化（criminalization）：大约有五千人受到初步调查的影响。

运动中的替代和改良派分支签署了协议，以结束与国家制度的冲突——他们从来没有寻求过（与其进行正面冲突）。反对妥协的人们越来越被孤立。他们批评了已签署的协议，但却没能发起一场包括罢租和动员更多群众的普遍的住房斗争。部分原因是新的



我们不单要一块蛋糕，我们要整个他妈的烘培坊

“社会住房政策”（这是住房斗争的意外成果）安抚了广大民众；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自治主义者们在当时是否能进行这样的斗争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的力量已近枯竭。

由西柏林保守的基民盟-自民党领导的参议院继续其诏安-镇压的双重战略。这既使得对当局成功驱逐占屋者，也导致了整个社区的重组——特别是在舍嫩贝格。在 1981 年夏天占屋运动的高潮，舍嫩贝格的冬原广场（Winterfeldtplatz）作为运动的中心之一，也是市中心许多行动的基地，其距离市中心只有三分钟路程。许多在舍嫩贝格被驱逐的占屋者去了克罗伊茨贝格，那里的驱逐不那么普遍，而更多是合法租用。这是克罗伊茨贝格变成自治运动参与者（Autonomen）隐居地的原因之一，用当地基民盟政治家的话说，它为自己赢得了“麻烦制造者的鬼城”的声誉。

1984 年夏天，最后一个占领屋被驱逐。然而，占屋运动的消亡并没有导致自治运动的消亡。住房斗争的结束，为新的政治倡议、讨论和运动开辟了空间。

反西跑道斗争

1 1981 年秋，反对西跑道（Startbahn-West）——法兰克福机场的跑道扩建——的运动将整个莱茵-美茵（Rhein-Main）地区带到了摆脱治理的边缘。

反跑道运动（The Anti-Startbahn Movement）始于 1970 年代，因为新跑道要求在未曾受染指的森林中进行砍伐。起初，该运动主要由受影响社区的居民、当地各党派的政治家（从德共（DKP）到基民盟（CDU））和环保团体组成。传统宣传活动创造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并组织了森林中的第一次实地抗议。抗议者们在指定的砍伐区域，建立了一个数座木屋的村庄以显示其决心。许多人认为可以通过和平合法的方式阻止西跑道建设。尽管国家当局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对人民的意见不感兴趣，但整个黑森州已经收集了二十万个签名。无论如何，跑道必须建造。然而，作为一种“善意”的姿态，公民倡议的代表被邀请在黑森州议会就该项目的生态和经济影响发表演讲。他们的演讲受到了无趣的议员的欢迎。

1981 年 11 月，警察袭击并摧毁了抗议者的营地，这让运动的态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的示威和激进冲突接踵而至：在森林里（沿着现在建筑工地周围竖起的围栏）、在城市内部、在机场、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声援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运动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在运动达到高潮时，它包括来自吕塞尔斯海姆（Rüsselsheim）的欧宝工厂汽车工人、法兰克福的左派和地方的起义青年。不过，它仍然被资产阶级、合法派（The Legalist）和希望走“民主”道路的非暴力团体所支配。自治运动强调了跑道对北约的意义，并着力于直接行动。

当包括联邦州政府和宪法法院在内的政府当局明显无视所有请愿和其他民主抗议手段时，广泛的抗议运动开始崩溃。合法派和非暴力活动家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问题上，如迫在眉睫的导弹部署，并为地方选举拟定了绿色名单。与此同时，反跑道运动中的激进潮流，特别是自治主义者，准备了 1982 年 1 月的“Baulos⁷⁴-2”示威。尽

⁷⁴ 德文，意为施工标段



管来自西德各地的自治主义者参加了示威，但其明确目标却未能实现——即重新占领施工现场——因为警察的存在过于强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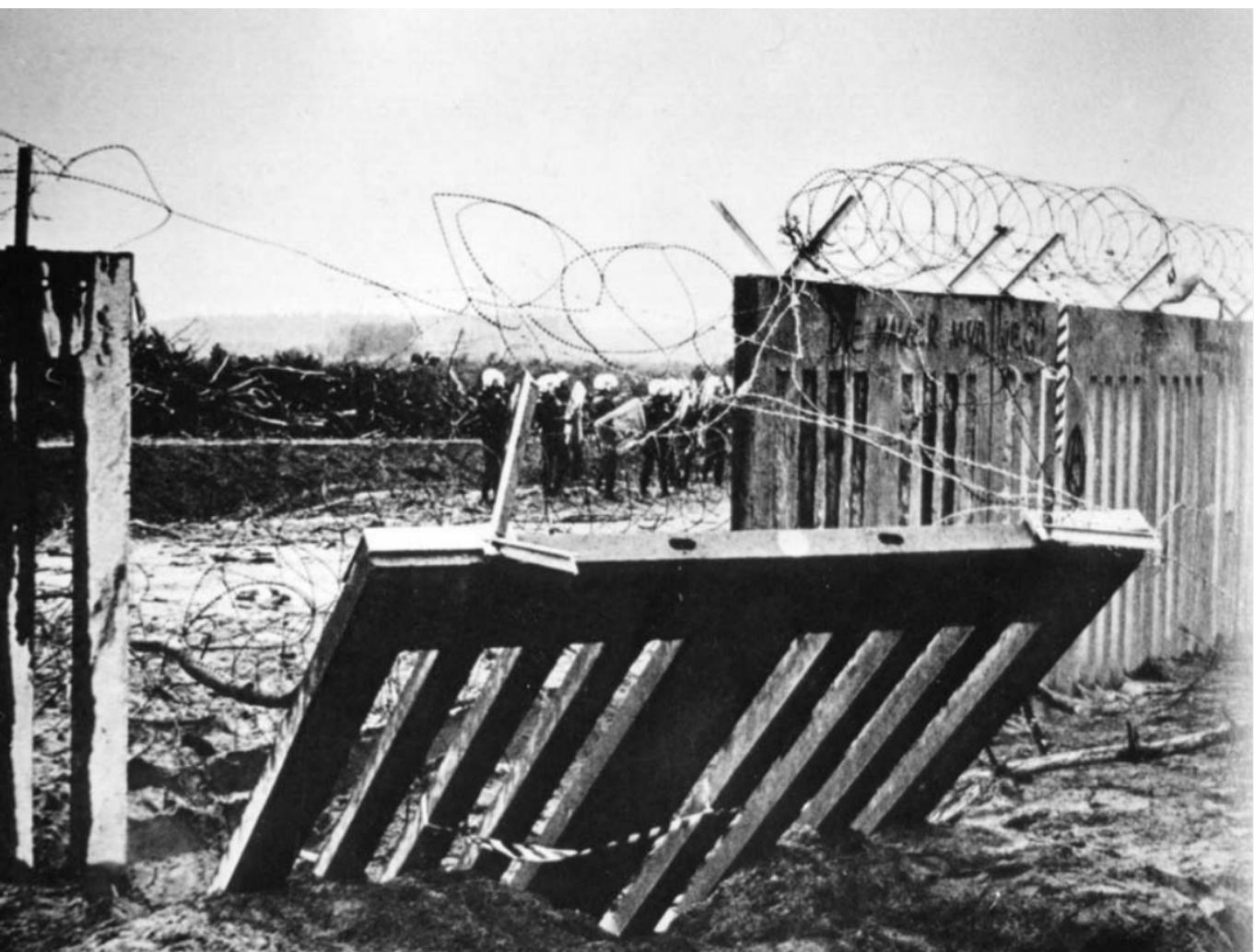
尽管当局警方在 1982 年春天对席卷整个地区的抗议活动作出了内战级别的回应以确保跑道的建设，但抵抗活动从未停止。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主要是由公民倡议残部、该地区的公民个人以及莱茵-美茵地区的自治团体组织的。与 1981 年 2 月示威失败后崩溃了的反对在布罗克多夫建造核电站的地区性抵抗不同，反对跑道的抵抗运动一直在进行。人们每个周末都会沿着施工现场进行“周日漫步 (*Sonntagsspaziergänge*)”，并利用这个机会多次突袭安全围栏。

在这一时期，除了生态方面的问题外，跑道对北约的意义以及法兰克福机场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重要性成为抗议活动的核心主题。对大多数抗议者来说，反对跑道与反战以及反核斗争之间的联系是很明显的。

1984 年 4 月，跑道正式投入使用。在法兰克福及其周边地区举办一个“行动周 (Action Week)”被推上日程。组织者包括教会团体、社民派和绿党。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抗议活动意味着最后的象征性姿态，之后抵抗运动将告一段落。然而，许多公民倡议的成员和自治运动家誓要继续抵抗。“行动周”再次显示了自治政治的广泛性：它包括对普伦盖西姆 (Preungesheim) 监狱、执政当局以及跨国公司的抗议。

法兰克福的自治主义者解释说：“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它将针对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斗争的成功不会以我们的要求得到多少满足、我们能造成多少财产损失、或者我们能破坏多少空中交通等等来衡量，而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摆脱分化和异化、重新夺回他们的生活，并开始战斗”(公民倡议-档案 (*BI-Dokumentation*))。

万余人参加了反对正式运行跑道的示威，其中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自治主义者。即使跑道的开通标志着运动的失败，但行动周令人鼓舞地显示了继续斗争的意愿。



自治主义者在德国和平运动中的孤立

继机场跑道抵抗运动和占屋运动之后，和平运动是 80 年代初西德最强大的议会外力量。在自治运动内部，对于“和平运动具有能政治化和激进化更多人群”的潜力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的和平运动由教会团体、和平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主导。1970 年代中期，当社民党政府拥护缓和政策⁷⁵（Entspannungspolitik）并试图与德国的东欧邻国建立更好的外交关系时，和平运动就被边缘化了。然而，在 1970 年代末，由于北约计划在西德建立几个导弹基地，和平运动经历了一个上升期。一开始，自治运动并不是该运动的一部分。

1980 年 5 月 6 日，当德国国防军新兵在不来梅的威瑟体育场（Weserstadion）举行的军事典礼上宣誓入伍时，这种情况突然改变了。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组织了许多这样的仪式来为其军备计划提供宣传支持。在不来梅，一个泛左翼联盟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自治主义者负责指挥并与警察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巷战。

不来梅的示威活动证明，自治精神的政治手段——德国之秋后仅存的几种激进手段之一——能够与该国青年进行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随后在弗伦斯堡、波恩、汉堡以及其他城市举行的反军事示威，与占屋运动一样证实了这一点。

在激进左翼内部，不来梅事件引发了关于新的反帝反战运动的讨论。1980 年秋天，一场反对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进行北约演习的地区性运动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一场精心准备的反帝国主义示威只能动员大约两千人，而且组织结构在活动后不久就解体了。然而，在不来梅，自治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能够组成各种“反战之战（War against War）”团体，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针对美军在德国的第二大基地——不来梅港/诺登汉（Bremerhaven/Nordenham）。(最大的基地是在法兰克福)。

1981 至 82 年，自治运动大力参与组织了三次大型反战行动。1981 年 9 月，在西柏林举行了一次示威来反对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的访问，他

⁷⁵ 此处英译本原为法文单词 détente，意为缓和

因一句“有些事情比和平更重要”而闻名；1982年春天，在汉诺威举行的 IDEE 军火展被破坏；而在 1982 年 6 月 11 日，在西柏林又发生了一次示威，这次是为反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访问。

在这些运动中，反对海格的示威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在六万人的游行之后，大约五千名激进分子试图进入舍内贝格市政厅以破坏官方接待。在激烈的街头争斗中，警察部分地失去了控制力，这场骚乱在资产阶级报刊上突出报道了好几天，示威和冲突成功地挑战了西柏林一致拥护美国为“保护国”以及“和平保障者”的设想。保守派媒体的评论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以下内容：“海格开车穿过空荡荡的街道，被西柏林正中由警察竖起的围墙所保护。曾经是群众庆祝自由的地方——舍内贝格市政厅前的广场，如今看起来就像一个隔离区，当局急于让人们分开而不是团结起来。这似乎不是我们认识的柏林。”（《世界报》，1981 年 9 月 19 日）。

是什么让反对海格的示威活动如此特别？来自汉堡的同志们在 1983 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反对海格示威的动力并非根植于反帝国主义分析，而是来自住房斗争的社会运动，它构成了示威的“腹地（hinterland）”，没有住房斗争，事件就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其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跟体制打交道的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跟理论分析或理性洞察力相比，亲身体验的感觉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动员群众。柏林的占屋运动为示威活动提供了大后方以及动力。反对帝国主义、反北约以及反战的斗争都与占屋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使它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我们可以问，如果激进反战运动没有扎根于日常的社会斗争，这个运动是否有效？（《关于反战运动的思考》（*Überlegungen zur Anti-Kriegsbewegung*））

这些文本暗示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自治运动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和平运动，另一方面是薄弱的反战运动。在抗议汉诺威军火展的过程中，自治运动与大部分的和平运动之间出现了裂隙。一个月后，自治和反帝团体成功地动员了五千人参加在西柏林举行的反对里根访问的激进抗议活动，但这已经是在没有其他和平运动派别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和平运动派别在一天前成功地组织了五十万人到波恩以及十万人到西柏林。虽然自治运动与和平运动之间的公开冲突可以避免，但自治团体发现自己越来越被孤立，这有几个原因。

自治运动和反战运动主要着力于地方倡议上，无法给在德国出现的反对北约军备的群众运动带来反军国主义-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动力。1980 年至 1982 年期间，激进反战



“不用武器来创造和平”

运动被许多组织和倡议所边缘化，包括德共（DKP）、绿党、社民青（Jusos）以及大多数和平主义者和教会团体，这使得和平运动取代了反战运动。教会团体和社会民主党人成为和平运动的主导者，并通过在波恩建立中央协调委员会来巩固他们的地位。其中一些活动家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领导作用”以及“维持和平”的诉求，以至于跟警方合作来破坏自治运动的政策和战术。

1982 至 83 年，汉堡的同志们试图通过建立起自治团体间的广泛合作以加强对导弹计划的激进抵抗。（自治团体）组织了两次会议，一次在 2 月的汉诺威，一次在 6 月的鲁特（Lutter），特别是鲁特会议受到了新社会运动（反核、反战、占屋）即将失败的强烈影响。此外，为准备反里根示威而建立的组织结构在里根来访后不久就崩溃了，这也导致了对被捕及被监禁者的支持非常乏力。结合自治运动在和平运动中的孤立地位，这些局势发展要求大家对左派内部的自主立场和未来战略进行反思。一些自治主义者这样描述这种情况：

许多城市的情况都差不多：现场很分散，几乎没有共同的集会和讨论。团体可能为特定的行动（主要是示威）而组织，然后他们就散伙了。我们主要是对国家最可笑的剥削作出反应，把行动堆到行动上，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从事不同主题工作的团体之间很少有信息交流，对当前的社会状况没有共同的分析，也没有让我们能够确定目标和手段，或是在工作中建立某种延续性的共同战略。（《筹备材料（*Vorbereitungsmaterialien*）》）

会议的筹备组建议，在关于反战运动观点的战略辩论之外，讨论何为“自治”：

渴望自治意味着首先要与生活和工作中的政治及道德异化作斗争，与他人利益的功能化作斗争，与我们对手的道德内化作斗争。这意味着要重新争夺我们的生活……当人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和避免支付高得离谱的租金而占领房屋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工人们因为不能再忍受工作场所的控制而呆在家里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当失业者抢劫超市……以及当他们拒绝支持工会单纯的、只意味着融入压迫与剥削体系的工作要求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无论人们在哪里开始破坏统治的政治、道德和技术结构，大家都向自主生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渴望自主也意味着与那些有不同想法的人进行公开辩论并让鼓舞我们生活和行动的想法变得透明。

1983 年夏天，有 2.5 万人参加了在克雷菲尔德举行的反对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访问的示威，自治团体组织了自己的示威活动，大约有一千名同志参加。自治团体的抗

议活动很快被特警部队制止和驱散，60 多人受伤，一些人受重伤，138 人被捕，其中 50 多人被判处最长两年的监禁。

和平运动中的大部分人明显地与自治运动保持距离。随后的“暴力辩论”进一步孤立了自治运动。来自汉堡的同志指出，“‘自治团体’这个词被国家有计划地用来把我们的政治贬低为单纯的暴力手段。”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是否应该进一步努力与和平运动的其他派别进行合作。

内部组织也是一个备受讨论的话题。自治运动经常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动员起来进行某些行动，然而，所建立的组织结构通常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消失了。原因之一是，任何基于全国性定期会议的自治组织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责难，即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这与最基本的自治原则相悖。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组织的尝试往往被认为是对地方和区域缺乏承诺的替代。最终，（自治运动）没有建立起真正超越个体活动的组织结构，1983 年之后，只有一次认真的尝试，即 1986 年至 1988 年的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动。

具有强烈非暴力意识形态的和平运动继续排斥所有反帝及社会革命力量，他们的渴望证明其非暴力承诺的抗议活动变成了可预见的、空洞符号性的服从国家的姿态。（和平运动）与警察的合作也在继续。许多和平活动家不仅想控制自治运动，而且还乐于谴责他们。

DEMO 25.6. Krefeld

zum Seidenweberhaus
gegen die Kriegspropaganda der NATO

Krieg dem
imperialistischen
Krieg!

mit Bush, Kohl, Carstens



da wo wir kämpfen ist das Leben!

10⁰⁰ HBF
Krefeld

autonome und
antimperialistische
gruppen

第三部分

西德最后岁月中自治运动的一些写照

在 德国和平运动逐渐幻灭期间及之后的时期，自治主义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讨论社会革命议题。就组织结构而言，他们认为自己与绿党、反帝主义者及城市游击队之间存在分歧。对自治运动来说，尤为重要的运动中心地区——汉堡、西柏林和法兰克福——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以及在西柏林进行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峰会的抗议运动，这也反映出许多活动家开始重新关注起了大城市。在这几年间，运动的焦点始终是农村地区和地方——尤其是与反核斗争有关的地区——的城镇。这一时期暴露的弱点之一是活动家们无法将这些斗争与城市中心的激进政治联系起来，当然，这也让警察的工作更加困难。不管怎么说，激进分子已经通过 80 年代初西柏林的占屋运动浪潮宣示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再活动。

以下关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简述——部分根植于自治主义者自身，部分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只是在柏林墙倒塌前的十年里，自治活动家们参与的一系列广泛议题的一些例子。一个全面的概述必须涵盖鲁尔山谷和南德——特别是弗莱堡——的自治运动。它还必须包括有关声援难民工作、反法西斯组织、反对社区士绅化及雅痞化（Yuppification）的运动、有关性暴力的辩论以及自治妇女运动的篇章——这些活动都对自治政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作者除了指出这些痛苦的空白之外，几乎无能为力——这需要其他人参与分析这些斗争以及它们的失败，这对于新的解放政治和保证进入 21 世纪的自治运动仍然强大是必要的。

下文将追溯并介绍 1980 年代自治政治的一些重要时刻（highlights），不幸的是，这些令人瞩目的时刻往往是因为有资产阶级媒体的关注或它们引发了国家机器的镇压。例如，如果不是因为 1987 年两名警察遭到致命的误射，我们不清楚 1983 年之后的反跑道抗议活动到底有多少可写的东西。无论如何，作者的决定意味着许多不太引人注目的日常斗争和辩论将被低估。汉堡的自治运动比哈芬大街（Hafenstraße，汉堡的一条街道）的讨论要多得多，而克罗伊茨贝格的自治运动比临近社区的暴动要多得多。然而，作者选择关注这些亮点之处，是因为它们不仅塑造了自治运动的公众形象，也塑造了他们的自我理解；而且它们为自治运动成为德国社会反体制运动的标志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究竟是好是坏，仍然有待观察。



“女性抵抗！抗议法兰克福女性自治避难所的关闭！”

阶级运动与大众运动

1 1983 年和平运动令人失望的经验促使了许多自治主义者对一般的社会运动进行尖锐的批判——尝试让社会运动变得更加激进，真的有可能产生革命性的变局吗？关于如何既保持自治运动闻名的实践激进主义和战斗性，又能超越狭隘的文化领域限制，出现了许多激烈的讨论。在一段时期内，临时工人小组（*Jobbergruppen*）的概念似乎很有希望。这些组织成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激进派内部也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临时工人小组注重于活动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1979 至 80 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造成了西德的高失业率，迫使统治阶级对公共服务（失业津贴、社会福利、学生贷款等）进行大幅削减，而这些往往是活动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20 世纪 70 年代活动家经济状况的相对自由，让位于新的就业需求和社会经济安全的缺乏。因此，遍布整个西德和西柏林的许多自治运动圈子组成了临时工和失业工人的团体，并复兴了意大利工人主义的理念。

在 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失业者大会”上，临时工人小组本来能够阻止德国工会联合会（DGB）的夺权行径。然而，不同的自治团体之间没有共同的背景，他们只拒绝了德工联“人人有工作！”（例如核工业以及军工业）的提案。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平台，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开始起步。

自治运动与劳工问题的关系，与新左翼在 1960 年代末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经历了一样的困难。在 1980 年代，雇佣劳动力被一个政治上一体化、有工会、有技术的工人阶层所支配，这些人属于所谓的核心工人群体，这意味着他们有相对安全、长期的职位，并对“自我决定”的生活和反资斗争之类的自治思想不甚拥护。虽然在此（经济危机）期间，临时工人的数量大幅增加，但核心工人仍然是无产阶级中的主导力量。此外，工厂的自治组织受到了“外围工人（the disenfranchised⁷⁶）的流动”的破坏。换句话说，许多临时工宁愿在他们的处境变得无法忍受时辞职，也不愿参与乏味、也许是徒劳的政

⁷⁶ 被剥夺权利者

治运动。最后，对于“统治阶级总能将自治工人团体描绘成核心工人团体的威胁”这一点，自治运动从未找到答案——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对流动且不可靠的工人活动家的刻板印象。

不过，在整个 80 年代，自治团体提出的工场有关倡议与失业问题上作出的强力承诺两者间仍有显著的连续性。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比雇佣劳动的要求更重要。然而，自治活动家仍然难以在工作场所中找到盟友，自治主义者总是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结构中撤退并生存，这一事实将他们与其他工人区分开来。一方面是工场组织，另一方面是对独立结构（一个“社群”）的维护，这被证明是活动家们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面罩与凉鞋间：自治运动与绿党

绿党出现于 1970 年代末，是在新左派、反核运动和共产主义团体崩溃的混乱情景中出现的。绿党一开始就以“反对党⁷⁷”或“抗议党”自居。不出所料，融入议会体系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被腐蚀了。首先，轮换原则（the principle of rotation）被放弃，然后议员们以“个人良知”为由无视基层的决定，最后，与熟练工人收入持平的薪金无法支持起议员的生活——支付给议员们的丰厚工资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流向私人账户，而不是该党曾设立的环境基金。

20 世纪 80 年代尤为突出的是党内的“原教旨派（Fundis）”和“现实派（Realos）”之间的冲突。“原教旨（Fundis, Fundamentalist 的简称）”派一词是由“现实（Realos, realistic 的简称）”派创造的贬义词，它暗示坚持原有原则的绿党成员是狭隘、非理性和不可预测的——有点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实际上，原教旨派主要由前共产主义同盟（Kommunistischer Bund, KB）成员组成，他们现在认为自己是“生态社会主义者”，还有“所谓的激进生态学家”，主要来自黑森州。原教旨派们拒绝与既有政党合作（例如在法兰克福），或是试图以更激进的社会民主方案挑战社民党（例如，1982 年和 1986 年在汉堡）。

现实派以这个名字自居——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宿命论般地接受了现状。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与社民党的联合政府。他们的计划是为了适应体制机构，这也解释了自由派媒体对他们的慷慨报道。现实派代表了许多社会运动的趋势，即相信参与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权力结构将最有可能保存运动——特别是保存他们自己在运动中的代表地位。

一开始，自治运动和绿党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有时会出现政治联盟，例如在反核抗议或保卫占领屋的活动中。对绿党来说，自治运动经常扮演政治斗争中有用的“激进武装”。“激进的自治威胁”加强了绿党在与其他党派谈判中的地位。因此，基民盟财政部长格哈德·斯托尔滕贝格（Gerhard Stoltenberg）将自治运动称为“绿党的武装”并没

⁷⁷ Antiparty 而非 Opposition party，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Antiparty 用于形容反对某一特定政党或整个政党政治

有完全错误。另一方面，自治运动需要绿党，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国家镇压。

然而，这样的关系在 1987 年几近结束。早在 1986 年，在瓦克斯多夫 (Wackersdorf) 和布霍克多夫的冲突后，绿党的明星议员就给反核运动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将自治主义者排除在外。绿党对 1987 年 5 月 1 日克罗伊茨贝格⁷⁸骚乱的反应也是如此。两名警察在 1987 年 11 月西跑道运动中被杀后，绿党支持国家调查和针对整个自治运动的镇压。同时，自治运动不再把绿党视作可能的联盟伙伴。

总之，宪政国家在整合绿党方面非常成功。一些自治主义者在 1984 年已经表示，“如果绿党不存在，国家将不得不发明他们”。这是非常正确的。有时，绿党主要是作为改造和掩盖资产阶级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

⁷⁸也有译作十字山的

自治运动、反帝国主义与城市游击

革命细胞（the Revolutionary Cells）“社会革命的基层游击战”概念，与红军派（RAF）的“第一世界反帝国主义游击队”概念相比，更符合自治运动的自我理解和激进实践。革命细胞也比红军派少了一些学究气息。在 1980 年代早期，一些自治主义者将革命细胞视为“接近运动”的广泛游击战争（Guerriglia diffusa）。这与要求革命细胞放弃其组织形式并加入自治运动有关（见 1983 至 84 年《激进》（radikal）上的辩论）。

1980 年代初，革命细胞的许多行动明显与社会斗争运动相关。例如，在为期两年的时间里，他们袭击了参与西跑道修建的公司。80 年代末，革命细胞内部形成了一个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派别。同时，红佐拉（Rote Zora）袭击了阿德勒服装公司（Adler）的分支机构，以声援该公司位于韩国的工厂女工罢工。

红军派在 1977 年攻势失败后退回了其反帝国主义初衷。1979 年，该组织袭击了北约指挥官亚历山大·海格（Alexander Haig），1981 年袭击了美国陆军将军弗雷德里克·克罗森（Frederick Kroesen）。似乎很明显，红军派试图将自身与同时期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反战运动联系起来。1982 年 5 月，该组织发表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份立场文件，题为“西欧的游击队、抵抗运动与反帝国主义阵线”。这份文件写得很糟糕，它宣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却积极谈论苏联的政治和角色，并要求与社会运动的激进分子建立共同的“阵线”。地下活动的红军派突击队应该占据主导地位。

阵线宣言（Front Paper）强烈影响了 1980 年代的“反帝派（anti-imps）”。简而言之，反帝派是政治上强烈地遵循红军派理念的激进分子。像自治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一场革命运动。他们为被囚禁的红军派同志组织了广泛的信息、支持和声援活动。他们也参加了自治主义者组织的抗议活动，例如，1982 年反对里根的访问，或者在 80 年代下半叶支持哈芬大街的占领屋。也有一些合作，例如在 1984 至 85 年红军派囚犯的绝食抗议中。但总的来说，自治主义者和反帝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太大，无法进行



“西欧的反帝反资本主义反叛”——国际讨论与信息处

密切合作。当一名红军派突击队员在准备袭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而随机袭击了一名低级别的美国普通士兵（G.I.）时，冲突达到了顶峰。许多自治主义者拒绝了这一行动，认为它是“反革命”，而一些反帝派则从这一反应中发现了“破产的道德-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986年1月，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数千人参加的名为“西欧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抵抗”的大会上，出现了肢体冲突。

法兰克福的狼疮小组（L.U.P.U.S.-gruppe）⁷⁹在1986年秋天对红军派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批评。作者将该组织1970年代初的初衷与1980年代红军派的理论和实践相比较，得出了城市游击队这一概念已经失败的结论——尤其是用其这个概念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游击队并没有‘扩张’或‘扎根’……事实是，今天死去、被捕或流亡的红军派成员比留在西德战斗的人多；事实是，红军派目前的政治特点是失败而不是胜利；事实是，14年前一些圈子就几乎不再对红军派报以同情；事实是，红军派在国外比在它的原籍国感到更安全——这就证实了此地的地下组织太浅薄，以至于无法保护自身。”（《黑线》（Schwarzer Faden），第24期，1986年）。红军派从未对这一批评作出回应。

80年代中叶，反帝派的宣传口号是：“斗争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阵线——在共同受拘禁的战斗中团结起来！”这显然是指“阵线宣言（Front Paper）”。反对派试图将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第一世界抵抗运动的战士和被监禁的反帝国主义活动家的斗争联系起来。将“阵线”排在“运动”之上，表明向暴力（militarism）的转变。在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框架内，苏联是反对主要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的盟友，这很合理。不止一次，反帝派利用红军派囚犯可怕的监禁条件来支持他们宗派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解——这与自治运动的理念截然相反（vis-à-vis）。

尽管拒绝反帝派的政治理念，但自治活动家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为红军派囚犯开展的声援活动。一方面，这是因为许多自治活动家自己经历过可怕的监狱条件。部分原因是，尽管存在各种冲突，但反帝派和自治组织之间已经建立了一些团结的结构，特别是在汉堡，两个阵营在保卫哈芬大街时并肩作战。总之，自治运动和红军派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矛盾的：虽然对囚犯及其诉求有强烈的道义支持，但该团体的“城市游击”概念被拒绝。

⁷⁹<http://www.die-autonomen.de/Organisierungsdebatte.htm>



1980 年代的反核运动

自治运动对和平运动的批判意味着自治主义者改变了他们对社会运动的总体看法，社会运动不再被视为社会革命行动的唯一可能舞台。然而，由于没有太多其他的动员群众的选择，自治主义者仍然活跃在社会运动中，即使这些运动大多与自治政治的激进雄心相抵触。基本上，这是一个务实的决定。

1981 年布罗克多夫大游行后，反核运动被掩盖于和平运动的阴影之下。尽管有广泛的公众抵制，随着布罗克多夫核电站的建设，国家和“核能黑手党”还是设法打破了五年来暂停建设新核电站的规定。八十年代，西德的核电使用量翻了一番，反核抗议成为地区上的主要事务。即使在 1982 年，在戈尔莱本、卡尔卡和萨尔茨吉特 (Salzgitter) 附近的康拉德矿场也举行了相当成功的全国性示威动员。自治主义者在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尝试突破场地的防护设施，并与警察发生严重冲突。在卡尔卡，这些事件是个别案例，但 1982 年 9 月在戈尔莱本举行的“火山之舞 (Dance on the Volcano)” 抗议活动中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多年来，自治主义者第一次成功地破除了当地公民倡议 (BI) 的非暴力意识形态，这导致了激烈的讨论，但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自治性的（政治）存在。1982 至 1985 年期间，随着越来越多的自治同志——来自该地区本身以及汉堡、汉诺威、不来梅和西柏林——来到戈尔莱本抗议核储存设施的始运行，自治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抗议活动并没有减少到这个程度，这些活动涉及许多相关问题，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针对核能黑手党的操作员、供应商和经销商的各类合法或非法的，非暴力或暴力的，或是公开和地下的抵抗形式。大量的破坏行动和路障给该设施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984 年 4 月的“温德兰封锁”证明，只要有基本的团结意识，社会运动中出现众志成城的抵抗——含有部分斗争性 (militant) ——仍然是可能的。

1980 年代中期，反核运动重新获得了足够的力量，走出了和平运动的阴影，它成为了议会外左翼之间差异巨大的激进潮流交融的一个论坛，1984 年在布伦瑞克 (Braun-

schweig) 举行的全国反核会议证实了这一点。会议明确拒绝了将抵抗限制在合法与和平抗议的要求，并对所有受迫害的反核活动家表示了强烈的声援。与会者还制定了一个反对 1985 年春在波恩举行的世界经济峰会的“行动召唤”。激进的反核活动家和自治主义者准备了一个反对“饥饿、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大规模示威，有三万多人参加，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自治集群（bloc）。

瓦克斯多夫

1985 年 2 月，能源供应公司决定在巴伐利亚州的瓦克斯多夫建造一座核废料处理厂，自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抵抗活动。“南德自治全体会议”是一支核心力量，它的成立与反对 1985 年波恩世界经济峰会的活动有关。许多自治主义者认为，核废料处理厂是西德帝国主义获取核武器的一个间接途径。自治运动占领了施工现场，并对参与施工过程的公司采取了直接行动。警察和施万多夫（Schwandorf）当地保守派公民倡议组织的所有试图孤立自治运动的努力都失败了。1985 年，当建筑工地的占领者被德国特别警察突击队（SEK）粗暴地赶走时，当地居民发出了巨大的声援。

自治运动为占领行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而那些支持合法和资产阶级抗议手段的人对占领行动一直持怀疑态度。1985 年底和 1986 年初，瓦克斯多夫（Wackersdorf）的几次成功的武装行动极大地推进了抵抗运动，并鼓舞了许多当地居民。惯常且常常是瘫痪的“暴力辩论”变得毫无意义。虽然当局继续建造工厂，但抵抗并没有减弱，本着西跑道斗争的精神，“周日散步”沿着施工围栏被组织起来。这些行动被不断重复，人们由此得以成功地攻击施工现场。1986 年主显节（Epiphany），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仅数周后，人们与警察的冲突终于爆发了，在将近三天的时间里，当地人试图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自治主义者一起冲进施工现场。抗议者成功地拆除了号称坚不可摧的装甲混凝土围栏的重要部分。有时，警察完全失去了对事件的控制，最终用从直升机上发射的催泪弹袭击了整个示威队伍。事后，甚至一些基社盟成员也主张“暂停反思”。地方警察局长被解雇。然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领导的巴伐利亚州政府坚持要完成这个项目，并且实际在该地区实施了长达数月的紧急状态。

参与瓦克斯多夫抗议活动的自治团体试图以扩大行动来回应国家机器的恫吓，他们不仅针对建筑工地，而且还针对相关的基础设施：建筑公司、职业介绍所等。他们与当地公民行动的左翼一起，打算把抵抗运动从建筑工地带到整个地区，重要的是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融入斗争，并提高大家对谁将建造核废料处理厂及谁将从中获利的认识。这一新战略体现在 1986 年 10 月组织的“行动日”中。这次行动的成功很有限，首先，自治主义者作为“四处游荡的抗议者（traveling protesters）”已经达到极限，国家机器



的镇压已经开始产生影响；其次，事实证明，很难建立一个广泛的地方抵抗运动。自治运动的政治理想似乎太高，以至于无法实现，特别是对他们这些在地方上的“陌生人”来说。最终，他们的主张大部分变成了空谈，因为在瓦克斯多夫地区并没有出现广泛的社会动荡的迹象。由于与共产主义同盟及反核运动中的其他派别发生冲突，自治运动被进一步削弱了。到 1987 年，自治团体对运动的影响已经大大减弱了，这导致了运动整体的非政治化和资产阶级势力的推进。

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反核运动到达了高潮。自 1981 年以来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全国性运动，再次变得可行。瓦克斯多夫的主显节暴动激励了各地的自治小组。当人们宣布瓦克斯多夫的下一次大规模示威将在 6 月 7 日举行时，活动家们也动员起来，准备在同一天于布罗克多夫举行示威。

布罗克多夫的示威重燃起几乎已经消失的抵抗。很明显，自治运动将在这次运动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他们并不是统一的力量。各个自治团体能够达成共识的唯一方面是，他们想使局势升级。这再次使“自治立场”矮化为某种斗争策略。

人们组织了一支车队，从汉堡前往布罗克多夫。这个类似于 1981 年的概念。目标是尽可能地接近建筑围栏。如果不可能突破警察的障碍，人们就准备返回汉堡，在那里采取“有效行动”。然而，警察已经吸取了五年前的教训，这个概念失败了。当领队的同志试图突破一个看似没有威胁的警方路障时，所有车辆都进入了远离布罗克多夫的偏远村庄克里夫（Kleve）的陷阱。特别警察突击队对领队的车辆发动突袭，基本上摧毁了所有车辆，其中一些车辆被烧毁。抗议者之间协调不力，意味着车队后面的一万多人对前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被警方伏击而不自知。公众的印象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完全没有能力阻止警察的攻击。来自建筑工地的报告也反映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景象，设法聚集在那里的一小群抗议者被催泪瓦斯和直升机赶走。没有出现过对围墙的有效攻击。

一天后，国家当局再次对反核运动进行了打击。八百余名反对警方行动的抗议者被“合围（kettle）”，也就是说，他们被警察包围和拘留了 12 个小时。社民党领导的参议院以自治活动家的“暴力”为由为警方的行动辩解——尽管包围圈里几乎没有什么自治主义者。幸运的是，警察的行为在汉堡引起了广泛的暴动。三天后，五万人举行了反对核计划和国家镇压的示威。然而，自治运动已经不再扮演核心角色——主要是囿于筹集车队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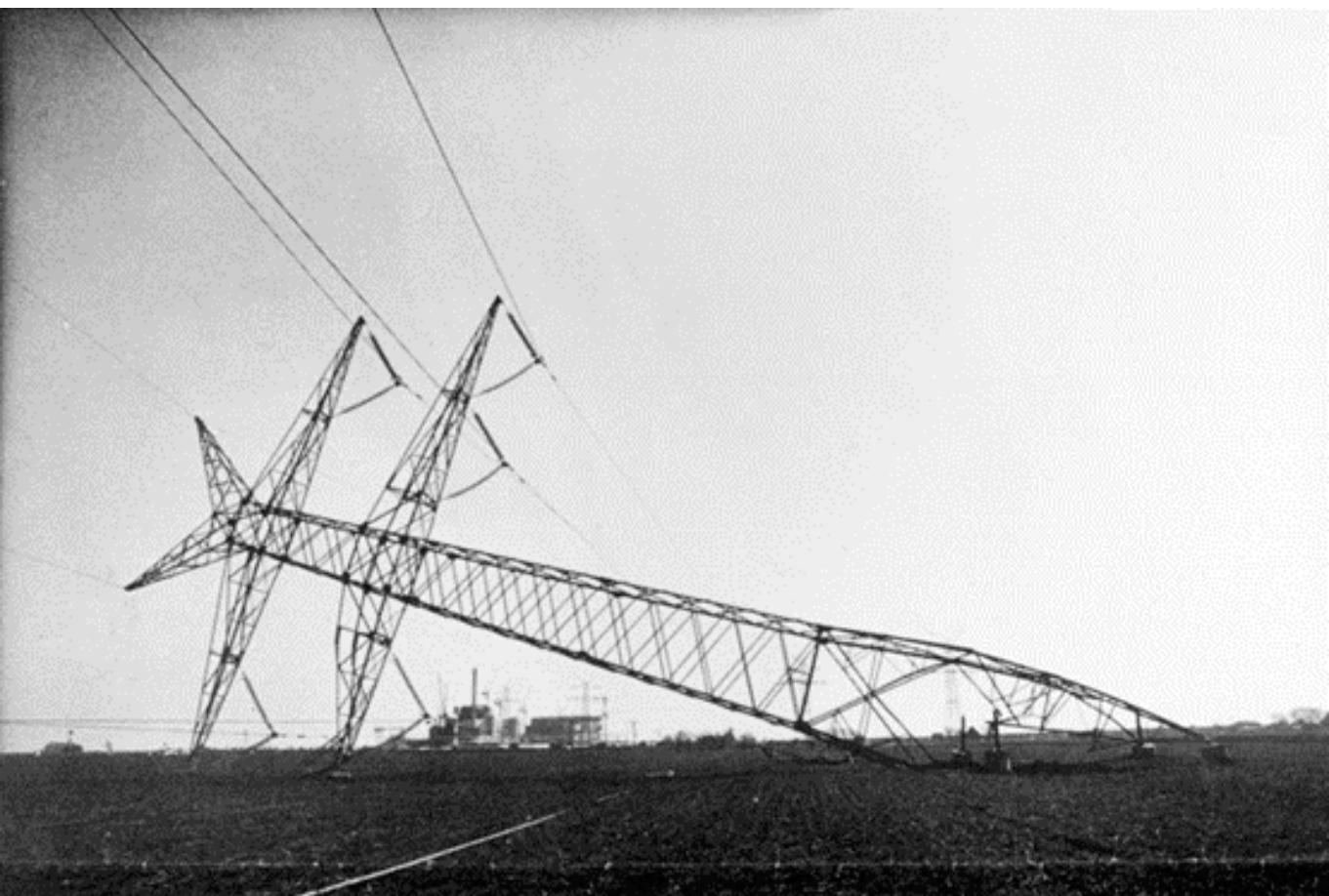
布罗克多夫抗议活动的失败，结束了全国范围内激进反核运动的短暂复兴。即使在接下来的数月里有超过 150 根电线杆被拆除，但在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直接影响过去后，

Während uns der Atomschleiß von Tschernobyl
noch um die Ohren fliegt
soll ein neues Atomkraftwerk in Betrieb gehen!

7. 6. 86 **BROKDORF DEMO**

Sofortige Stilllegung aller Atomanlagen!





政府立即控制了局势。建立一个环境部似乎足以重新获得信任和信誉。激进反核运动再一次被边缘化。

总结 1982 年至 1988 年的反核运动，可以说除了戈尔莱本之外，它未能以任何有效方式破坏政府的核计划。切尔诺贝尔灾难造成政治压力将布罗克多夫的运营推迟了半年，但在其他方面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与和平运动完全不同的是，反核运动提供了一个基础，使自治活动家可以尝试不同的抵抗形式，特别是在戈尔莱本和瓦克斯多夫。尽管运动成效有限，但这点仍然很重要。



Widerstand
Unterdrückung
sozialer
Vereidlung
Faschismus
/Antifaschismus
International
ismus

KONZERTE
FETE
DEMO
31.12.
gegen
“KNAST”
21

汉堡，那有条美丽的哈芬大街

西

柏林 1980 至 81 年的占屋运动也鼓舞了汉堡的活动家。因为担忧出现类似柏林的事件发展，汉堡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二十四小时规则”，这意味着汉堡的任何房屋都不得被占用超过二十四小时，由此，汉堡警方粗暴地粉碎了所有占屋的企图。

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占领行动在汉堡基本上不可能，活动家们转而采取“秘密”或“安静”化的占领行动。1981 年秋天，圣保利 (St.Pauli) 的哈芬大街的房屋就是这样被占领的，到了第二年春天市长选举前不久这些占领行动才被公开。当时，占屋者认为他们有一定政治影响力，可以与参议院就租借协议进行谈判，由于担心在关键时刻城市会发生暴乱，参议院批准了占屋者在占领屋中停留至 1986 年底的权利。

接下来的几年里，哈芬大街的房屋成为汉堡反帝自治团体以及政治运动的中心——例如，1983 年秋季和平运动组织的行动，1984-85 年对红军派囚犯绝食抗议的支持，以及 1985 年 9 月反法西斯人士冈特·萨赫 (Günter Sare) 被谋杀后的示威活动，这些活动对汉堡的激进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1986 年新年前后，自治运动组织了第一次 *Hafentage*，即“哈芬日”，这将变成整个西德和其他地区最重要的自治派年度会议之一。他们为了让哈芬大街成为全国性、甚至部分国际性的象征做出了巨大贡献。占屋者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他们是 1986 年布罗克多夫示威的推动力，在许多城镇——例如，在西柏林和科隆——人们组成了哈芬街声援团体。

1986 年，警察对占屋者进行了多次野蛮的攻击，他们准备一旦租期到头，就在年末前驱逐这些人。占屋者和其他自治活动家则以激进的行动作出回应，并在新成立的声援团体“哈芬街倡议”的帮助下，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他们尤其寻求与附近居民以及更广泛的汉堡左翼进行合作。1986 年 12 月 20 日，万余人游行支持哈芬街占屋。人们达成共识，在示威期间不理睬警察的封锁。当警察逼近多达千人且配备了头盔和武器的“革命方阵 (Revolutionary Bloc)”时，警察被赶跑了。这一事件并没有分裂广泛的哈芬街联盟，国家试图通过镇压来分裂运动的做法失败了。



哈芬大街占屋的激进行动通常是由小型团体进行的，这次示威是多年来支持他们的终章，这确保了占屋行动持续到租赁协议结束之后——至少是暂时的。许多年来，汉堡的左派第一次发起了攻势，1987年春天，在所谓的“X日（Day X）”，汉堡各地出现了一些支持哈芬街的行动。到了夏天，一些在1986年占屋者被驱逐的哈芬街公寓被重新占领了，占屋者增加了对当局的压力，“迫使他们（政府）放弃驱逐、撤销计划以及去年的恐吓”——正如他们的一份传单所说。在整个1987年，哈芬街的占屋者和汉堡的自治左派制定了该市的政治议程，以激进抵抗来抵御警察可能发动的攻击的信心不断增强，房屋也得到了大量的加固。经过长时间的内部辩论，占屋者决定，他们将积极保卫这些房屋，并为保卫工作做好准备。这一决定是公开的，是声援运动的一个明确信号。占屋者不接受警察骚扰和攻击的勇气及决心，促成了1987年11月“街垒日”的成功，这迫使政治家放弃他们的驱逐计划，并确保了哈芬街占领屋的长期存在。然而，由于占屋者签署了一份违反了租赁法很多常规条款的租赁协议，这与刑法条文息息相关，使得成功受到了一些影响，从技术上讲，如果一个居民从超市偷了一罐啤酒，整个哈芬街的人都可能被驱逐。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协议的修改条款对占屋者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威胁。



西柏林，那有一座壮丽的十字山

尽管管占屋运动已经消亡，但西柏林的“自治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仍然存在。先是在戈尔莱本，然后是在瓦克斯多夫，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活动重心转回到反核活动上，其他人则专注于反军事化活动，特别是反对盟军一直维持的军事存在。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国际主义运动，组织的行动例如“咖啡丑闻运动（Coffee Klatsch Campaign）”，用于反对跨国咖啡公司在柏林的分支机构。劳工运动也在继续运转并持续关注临时工及失业工人。有一些自治组织在理论层面采取了一些变化，并由一个团体持续制作和发行《激进》（radikal）杂志。

尽管在八十年代中期，其实并没有一个共同的旨趣将所有不同的团体团结在一起，但自治运动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在城市里所有较大的激进事件中都有突出的自治团体——例如，1985年的南非示威、反对美国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George P. Shultz）访问的抗议活动，以及来年美国袭击利比亚后的集会。

自治运动的组织基础包括各种大型集会，这些集会往往是自发安排的，参与者主要讨论抗议的具体技术问题，例如示威路线及对警察袭击的对策。一旦示威和行动结束，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动进行集体复盘。在1986年夏天和1987年初，有两次试图在自治团体之间建立更多定期交流的尝试——以代表大会的形式——都失败了，自治组织仍然难以克服自身对自治精神的强烈愿望委身拥抱代议制政治和所有形式的领导（无论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

1987年5月1日的十字山暴动

在一个自治组织特别松散的时期，1987年5月1日的十字山事件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一场不起眼的街头派对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暴动，其中自治主义者与大量十字山居民并肩作战，多年来在十字山36号堆积的怨气在那晚爆发了。由于警察花了几个小时都无法进入附近，活动家们创建了一个“法外之地（Lawless Zone）”，其特点是节日

一般欢乐的气氛。当自治主义者用预先策划设置的路障阻止警察时，许多居民开始进行“无产阶级购物（proletarian shopping）”活动。当超市货架上的最后一罐金枪鱼被清空时，它在旁观者的欢呼声中被点燃了。

坊间发动的这次起义突出地暴露了该市在社会与政治发展中的阵痛。虽然柏林参议院设法镇压了占屋运动，但暗流汹涌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是“留与后人智慧（dislocated）”。十多年来，十字山一直被用作各种收编和镇压政策的试验场。起义证明，官僚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无法解决任何社会问题，无论当局向其中投入多少维稳经费。更何况，许多自治组织直接将资金投入到运动中。鉴于自治主义者在 5 月 1 日起义中的核心作用，自治运动大大提高了其在城市左翼中的地位。

就对起义的评估而言，自治主义者之间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有些人谈到“阶级叛变”，但有些人则强调起义行动涉及广泛的人群。对于那些不直接属于或代表着统治阶级的资产——例如小商铺等——进行的破坏行动，这一点上，人们的评价在也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这样的讨论“不重要”，因为它们涉及不可避免的边缘现象，只会分散大家对更紧迫问题的注意力。其他人则强调了自治主义者在自己社区中地位的重要性。也有人只是想“去他妈的世界”。这一切背后的关键问题是自治运动是否应该干涉自发性起义。自治活动家制定和推行群众起义的规则真的合适吗？这个问题涉及自治政治的内禀性质：政治组织中的个人自由原则反对（将）他人进行组织的理念。

1987 里根访问

5 月 1 日的起义进一步促使自治运动在反对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访问柏林的抗议活动准备中发挥核心作用。自治主义者主要关注抗议活动的政治诉求，然而，这些诉求直到最后仍然模糊不清，两种截然不同的来自抗议活动的自治呼吁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支受到法兰克福狼疮小组（L.U.P.U.S.）的强烈影响，呼吁人们在“抵抗周”期间“夺回社会认同和文化空间”，这个观点被总结在“亨克尔（Hönkel）”一词中：

嗨，总统先生！亨克尔邀请所有反贼、刺头、纵火狂、临时工、偶尔客串的扒手和抢劫犯、不法之徒、女孩和男孩、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异性恋，以及本周屡教不改的色情主义者（eroticists），在死墙之城（Dead Wall City）参加亨克尔之梦。亨克尔是商品人生大商场的开罐器。亨克尔不愿意一直等到人类改变的那一刻，亨克尔假装人类已然发生了巨变，并以此过着人们自己的生活。在你们等待美国总统的同时，我们等待着总统的敌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

公敌……我们将用炮火震撼人们的思想，将日常生活情欲化（eroticize），将自由和冒险的氛围燃遍城市街道。亨克尔的意思是拒绝成为受害者。给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让我们斗争的形式和愿望、时间和地点、开始和程度，不要由他们决定！我们提前一周开始，我们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将出现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去他妈的松露——我们想要整个面包店！亨克尔之梦！（EA-Doku）。

这份呼吁中的文化革命方向——刻在自发主义者（Spontis）骨子里的——非常显然。它唤起了一种新的解放模式，超越了原来陈旧乏力的口号和政治抵抗。这种新的解放模式无法被“客观”分析，甚至可能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

另一方面，一份“建立一个自治-反帝主义集团的呼吁”在示威前不久被发表了。它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告诉敌人，斗争是严肃且坚决的：

统治者从来没有被淹没在人民的眼泪中。西柏林，也许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能代表全体资本主义国家当前进行的经济、技术以及政治结构之调整。它发展成为科学的中心、成为新的生产跟合理化技术，以及不断壮大的镇压机器的试验场。西柏林的这份发展为统治阶级定义了其施行统治的现实，这就是他们想要庆祝的现实。对我们来说，这种现实，即关于利润、剥削和压迫的制度，意味着工业化世界更多的悲剧、更多的失业、更高的租金，以及第三世界数百万人生命的毁灭……我们将自己视为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剥削和反对父权制之斗争的一环。我们对解放、自决和团结的渴望与统治者的盛宴背道而驰！

很难说哪一个呼吁能够动员更多的自治派参加 6 月 12 日反对里根访问的抗议活动。无论如何，他们从西德各地来到西柏林。最后的筹备工作主要涉及技术问题：我们要进攻警方路障吗？我们要戴头盔吗？等等。

五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自治方阵由大约四千名同志组成，他们给公众和警察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天，当里根到达时，柏林参议院决定封锁整个十字山社区。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有 17 万人被捕。在里根将发表演讲的蒂尔加滕（Tiergarten）地区和内城区也有二十四小时的示威禁令，这一切都得到了盟军的认可。换句话说，西柏林的大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6 月 11 日至 12 日夜间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尤其是在十字山 36 号。参与者主要是来自柏林以外的自治派，和他们战斗的警察也是外地增援。而警方已经预料到骚乱，并在整个过程中控制住了局面，打伤并逮捕了数十名抗议者。当地自治派试图阻止这种毫无意义又危险的小规模冲突，但失败了。5 月 1 日的事件创造了一个“十字山神话”，这



**Hafenstraße bleibt - Weg mit dem Senatsdiktat
Selbstbestimmt Wohnen und Leben!**

哈芬大街永存——摆脱参议院的命令，我们要自我决定地居住与生活！

对许多西德自治派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们把社区作为泄愤出气的阀门。当地活动家讽刺地评论说：“在海因里希广场，来自慕尼黑的自治派正在与巴伐利亚警方进行斗争。”

反里根抗议活动有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亨克尔的概念鼓舞了自治派背景之外的许多人去进行自发、多样化且“无政府主义”的行动；第二，令人印象深刻的 6 月 11 日自治集团促进了集体自治力量的进一步展示，例如 1987 年 10 月 31 日，汉堡近两千名自治活动家的游行向参议院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如果哈芬大街（的占屋者）被驱逐会发生什么。

组织起自治社群

在反里根示威之后，一些自治派团体开始优先考虑在社区邻里间组织起队伍。“坊间会议”（Kiezpalaver⁸⁰）在十字山 36 号被组织起来，他们与更广泛的公众分享自治思想并使其更具竞争性。由于许多自治行动有关住房问题和士绅化，自治派打算发动一场关于重构十字山的广泛辩论，该社区不仅是自治运动的一个据点，也是绿党的中产社区票仓——绿党在此获得了 30% 的地区选票。德国新闻杂志《镜报》（Der Spiegel）在 1988 年写道：

城市社会学家们说，在“时尚、文化、银行和高科技”蓬勃发展的城市中……

雅皮士带来了“再城市化”与个人社会环境的选择多样化。简单来说，事情是这样的：首先，智能化的、创新的新社会背景出现，并建立了商店、酒吧和文化场所的基础设施，然后，“它们成功的双生子”——雅皮士文化——进场。……文化节目成为发给高素质劳动力、现代企业和外国游客的名片。“它为那些已经住在那里的人提供的比它旨在招揽的人要少。”一项关于“汉堡市中心士绅化”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社区重构中选择多样化和雅皮士旨趣之间的紧密关系……该研究证实了现代化、租金上涨和基础设施对社区人口统计的影响（《镜报》1988 年第 36 期）。

士绅化导致社会弱势群体将房屋流转给收入较高的住户，尤其是在市中心。反对“雅皮化”的斗争进一步加深了同下层阶级一起斗争的自治派与（前-）替代运动之间的隔阂。在汉堡的尚岑社区（Schanzenviertel），冲突在 1988 年达到顶峰，当时各种团体抗议旧的芙罗拉（Flora）剧院变成商业文化综合体（最终，抗议者成功地占领了这座建筑，并将其变成了自治运动中心 Rote Flora，即“红色芙罗拉”）。在西柏林，冲突两次

⁸⁰ 德文，“Kiez”指邻居邻里街坊，“palaver”指那些没有经过事先准备的见面或者会议



阶级有鸿沟，群众无边界！（来自科皮的占屋者，柏林）

升级：首先是替代日托中心取代了一个自治幼儿园，然后是在（自治派）对一家豪华餐厅采取行动后。就日托中心而言，AL（民主和环保替代清单组织）首次向警察报警以反对自治派。在针对餐厅的合法但百口莫辩的行动中，替代运动的日报《TAZ》谴责自治派是一个非政治、不可预测、鲁莽且准犯罪性的“社区黑手党”。这些经历导致自治派组织更加独立，他们与改良派组织的接触几乎完全停止了，这一点在 1987 年 11 月变得很明显，当时自治派公然挑衅收编后的租户组织、居委会跟替代清单（AL）的纠缠，并组织了一场反对房地产投机和士绅化的社区抗议活动。尽管在西跑道枪击事件发生后，自治派受到警方特别强烈的恐吓，抗议仍有近三千人参加。这证明，十字山的建制租户组织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基层的支持。

革命五一

自治派组织示威的彻底成功为 1988 年在十字山和新克尔恩（Neukölln）举行的“革命五一”示威奠定了基础，不过它与德国工会联合会（DGB）事件在政治上和地理上都被明确分开。虽然德工联的游行和在国会的最后演讲象征着冷战时代，但自治派希望聚集在社会和政治冲突每日上演的社区。在“五一上街”的座右铭和罗莎·卢森堡的名言“万事皆空谈，唯有革命高（The Revolution Is Great, All Else Is Mush）”的口号下，自治派动员了八千多人。警察在游行期间保持低调，但随后突击了劳西策广场（Lausitzer Platz）的街头聚会。这次袭击是对整个十字山 36 号社区的无端惩罚措施，也是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运动开始前的一种恐吓手段。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蹂躏所有参与者，许多人遭到残酷殴打。

5 月 1 日的革命示威已经证实，自治派已经成为西柏林左翼中最强大的力量。仅仅一年后，替代清单就与社民党组成了市联合政府。

HERAUS ZUM REVOLUTIONÄREN 1. MAI DEMONSTRATION



DER WIDERSTAND IM STADTTEIL UND IN DER FABRIK IST UNSERE ANTWORT AUF IHRE POLITIK
GEGEN REPRESSION, AUSBEUTUNG und UMSTRUKTURIERUNG

SETZEN WIR REVOLUTIONÄRE ORGANISIERUNG!
GEGEN PATRIARCHAT und KAPITAL KÄMPFEN WIR INTERNATIONAL

ORANIENPLATZ 13.00 UHR

ROUTE: Oranienstr.; Ohlauerstr.; Friedelstr.; Reuterstr.; Karl-Marx-Str.; Hermann-Platz; Kottbusser-Damm; Abschluß: Zickerplatz

“万事皆空谈，唯有革命高”

西跑道的误击

即使在 1984 年西跑道开始运营之后，西跑道抵抗运动依然定义了莱茵-美因地区的自治派行动。示威和行动——包括正在进行的周日漫步、破坏安全围栏和武力进攻——从未停止过。1987 年春天，秸秆包的燃烧甚至使空中交通停止了几个小时。黑森州内政部考虑全面禁止在跑道森林进行示威和集会，不过政治压力和法律障碍从未允许这些计划付诸现实。

然而，莱茵-美因自治组织未能将抵抗转化为群众运动。一些自治派同志在 1986 年夏季发行的《哼哈》(Hau Ruck) 杂志上写道：“尽管缺乏远见，但我们将继续周日漫步。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周日散步——可能会继续存在，至少在不久的将来——主要是我们的聚会场所，一个交流思想的鼓舞人心的机会，这已经成为一种对我们许多人个人来说很重要的仪式。人类是习惯的生物。”

1986 年秋天，莱茵-美因自治派内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因为一名反对派在试图拆除电线杆时失败并受了重伤。拆电线杆在反核运动中很受欢迎，并被许多自治活动家采用。有几本手册使其看起来好像你可以拆一根杆子当作夜间消遣。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法兰克福同志所受的危及生命的伤害证明了这一点。更糟糕的是，她所在的小组成员似乎更关心保护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尽快让她获得医疗援助。一些自治派评论说：“这种行为不仅与从不人道的、草菅人命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的理想相矛盾，而且还破坏了对任何政治行动都至关重要的社区意识和团结意识。这种行为是自我毁灭的。”（公民行动组织反对西跑道的讨论文件）

试图让有关群体参与政治讨论并促使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是徒劳的。此外，许多自治活动家害怕纠正错误。有些人愤世嫉俗地谈到“每一场斗争都会带来受害者”。然而，有些人坚持就斗争和责任进行广泛的辩论。法兰克福狼疮小组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总结道：“在自治领域，关于激进主义的理解已经发展为几乎完全专注于暴力，而不是社会反对派的乌托邦。”

300. SONNTAGSSPAZIERGANG gegen STARTBAHN W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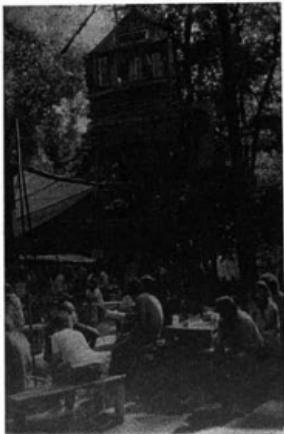
I.11.87

14^{oo} SKG-Heim

DEMONSTRATION

gegen die neue

Flughafenerweiterung



6. JAHRESTAG der
HÜTTENDORFRÄUMUNG

MO. 2.11.87

18^{oo} SKG-HEIM
FACKELZUG



法兰克福狼疮小组的文本是 1987 年复活节在法兰克福组织的“自由意志主义日”上激烈讨论的基础，其座右铭是“从社会运动到社会革命”。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五百名激进分子讨论了他们的活动和经历。最后，数百名参与者加入了“跑道散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许多激进行动都是不负责任的，并危及到了其他同志。这证实，斗争中的问题仍未解决。

事态发展出现了未曾预料的转折。1987 年 11 月 2 日，自治派和一些剩余的反跑道公民行动（BI）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以纪念 1981 年建筑工地据点暴力驱逐的受害者。在示威过程中，两名警察被枪杀，另有数人受伤。枪击事件引发了对莱茵-美因地区自治运动前所未有的镇压浪潮，自治派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两百多户家庭被搜查，政府发出了无数逮捕令，几名活动人士被监禁。许多活动人士与警方谈判，这导致了活动家之间深深的不信任以及相互间的背叛指控。警方抓住机会以谋杀指控威胁有价值的目标人物。调查实际的枪击事件很快成为一个次要问题，而当局正在收集尽可能多的有关该运动的信息。有些人发表了持续数小时的声明，把脏水泼到自己和别人身上，尽管他们对枪击事件一无所知。因此，警方能够解决许多他们多年来无法解决的案件，通过起诉许多袭击银行、核公司和电线杆的活动人士。

最终，同志们在“安娜和亚瑟闭口不言⁸¹”的口号下发起了一场“拒绝声明”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明确表示，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必须于集体和内部进行，而不是单独面对警察。不幸的是，这场运动来得太晚了。这些陈述不仅仅是判断失误的结果，它们还暴露出运动在超越资产阶级规范和国家恐吓方面未能培养出个人和政治的正直品格（integrity）。”

枪击事件还暴露出作为强力概念的大众激进主义已经丧失。斗争性定义了自治运动，但特别是在 1984 年西跑道开始运营之后，它经常变成纯粹的仪式，并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个人姿态。西跑道枪击事件标志着自治派与自治政治初始原则的决裂。这些行动基于随机的个人选择，没有任何自治集会建议或合法化这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声称枪击事件是自治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错误的。枪击事件既不是该运动的表现，也不是其活动的必然结果。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大多数自治活动家对这一消息所表现出的震惊。

尽管有震惊、国家镇压和资产阶级民众的愤怒，枪击事件并没有结束自治主义。相反，他们加强了关于斗争性的自发辩论，讨论是自我批评但不是失败主义的。他们重新

⁸¹ “Anna und Arthur halten's Maul” 是德语中的一句经典口号，特别在左翼政治运动和反抗组织中广为流传。Anna 和 Arthur 作为一种泛指。这个口号的核心意思是鼓励个人在面对警方或国家机关时保持沉默，不向当局提供信息。这种策略是为了保护运动的其他成员和整体的安全，防止内部被瓦解或遭到迫害。

Nach dem Tod von zwei Polizisten an der Startbahn West

LINKE
und GEWALT



„Gegengewalt läuft Gefahr,
zu Gewalt zu werden,
wo die Brutalität
der Polizei das Gesetz
des Handelns bestimmt,
wo ohnmächtige Wut
überlegene Rationalität
ablöst, wo der paramilitärische
Einsatz der Polizei mit
paramilitärischen Mitteln
beantwortet wird.“

Ulrike Meinhof, Konkret Mai 1968

Veranstaltung:
Do. 19.11.1987
Uni Hörsaal VI
20.00 Uhr

Autonome Frankfurt
Linke Liste Uni Ffm.
BI gegen Flughafenerweiterung
Libertäres Zentrum
Autonome Liste FH, Ffm.

审视了自治主义的责任和原则，并分析了运动的矛盾和弱点。以下摘自自治派在波恩撰写的声明就是一个例子：

两人的生命被夺走了。我们无法辩称西跑道冲突的状态合理化了这一点。死亡既不是保护示威，也不是推动整体斗争的必要条件——实际上，正好相反。国家对每一个反对国家的人施加暴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与解放的联系就失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本身就成了目的。我们必须确保没有人可以单独决定什么时候开枪。我们需要拒绝这样一种观点，即暴力程度决定了我们斗争的激进性……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即燃烧弹之后是弹弓，弹弓之后是枪支，这种思想导致了斗争的升级，但这斗争的白热化只为当权者服务，当他们手下的一名雇佣兵被杀时，他们毫发无伤……杀人行为不能仅仅因为死者站在当权者一边就被合理化。对人命的漠视是我们所与之斗争的制度的特征——我们不能让它成为我们的特征。我们没有足够努力地对抗我们运动中的这些倾向，因此我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政治责任。我们必须加紧与这样的制度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方式相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不能让一个不人道的系统强加给我们的矛盾手段阻止我们的斗争。我们必须始终明确指出那些对这场斗争中的死亡——不仅是我们的，还有警察和士兵的——死亡负有最终责任的人。如果雇佣兵为雇主服务，那他就应该为他的死亡负责；但更重要的是，那些送他们上战场的军阀更应该为之负责。（1987年11月2日的纪录）

绿党期望自治运动表现出悔意，接受非暴力的教条并屈服于资产阶级规范。然而，这从未发生。自治派捍卫自己的身份的举动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的背景下，这很重要，因为它阻止了他们融入国家和绿党的政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联邦议会的绿党党团发表声明，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追捕自治活动家并将整个运动定为犯罪行为。



对自治女性运动的袭击

在 1987 年 12 月，一起对自治女性运动的大规模袭击发生了。当局以“支持恐怖主义组织‘革命细胞’”为借口，国家当局对全国范围内的许多活动家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特别是在鲁尔区和汉堡。这导致了乌拉·彭瑟林（Ulla Penselin）和英格丽德·斯特罗布尔（Ingrid Strobl）被捕，同时迫使几位同志转入地下。不过，如果国家的意图是对运动进行恐吓，那它失败了。为被囚的同志组织的支持活动立即展开，在当局指控乌拉和英格丽德参与了诸如基因工程、人口政策、贩卖妇女和性旅游业等被认为“与激进行动相关”的领域的活动后，强烈的政治反对浪潮出现了，参加涉及这些主题的活动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与此同时，警方在调查中徒劳无功，只有威胁强制拘留才能勒索一些证人的证词——但这些证词全都无用。警方在八个月后被迫释放乌拉·彭瑟林。与此同时，对英格丽德·斯特罗布尔的持续支持远远超出了自治女性运动的范围。英格丽德的声援运动证明了，如果我们的政治意识足够强大，国家进行镇压的方法——即孤立、威慑和恐吓——是能够被有效克服的。

EAT THE RICH!

Nürnberg

15.9. 21⁰⁰ Disco und Infos vor den
AKTIONSTAGEN IN BERLIN
16.9. 19⁰⁰ Imperialismus – IWF
21⁰⁰ Fest
17.9. 10⁰⁰ ★Frühstücksspektakel
19⁰⁰ Bevölkerungspolitik und
Gentechnologie
im KOMM Königstr.

IWF

BERLIN
Aktionstage
26.9. – 29.9.88
DEMO
29.9. 17⁰⁰
Winterfeldtplz.



Autonomie



Nbg./ Erl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峰会

从 1986 年到 1988 年，最大的自治运动（Campaign）是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西柏林举行峰会的运动。这次运动内部充满了各种冲突，尤其是在涉及运动内部的父权制结构问题上。似乎永远不可能求同存异来为运动进行强有力地统一动员。“停止峰会”的口号显得很激进，然而，许多人似乎满足于尝试在峰会已经开始的时候“阻止”峰会，而不是在峰会开始之前。

该运动还揭示了自治团体之间强烈的地区差异。在一些城镇，自治派与左翼的各个派别一起工作，而西柏林的自治派拒绝以任何方式与“改良主义者”合作。对于柏林以外的许多活动家来说，IMF 峰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有象征意义。在柏林，预计有一万四千名 IMF 的爪牙和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在西德，IMF 峰会及其政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有限。最终，除了在西柏林举行的“行动日”之外，各地（如诺因明斯特、汉堡、伍珀塔尔、法兰克福、斯图加特、慕尼黑和其他城镇）还进行了各种区域性抗议活动。

“行动日”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计划，并以八千人的“国际革命游行”结束。虽然这可以算是成功，但 IMF 峰会本身从未真正受到威胁，这与“停止峰会”的雄心形成鲜明对比。不同形式的组织和动员是否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如何，“行动日”表明，在峰会期间，安全部队远未控制整个城市——这符合许多活动家做出的假设。人们只有从中汲取教训。

1989

这一章之所以被纳入，仅仅是因为 1989 年标志着在四十年前由西方盟国建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终结。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突然间，那些我们长期斗争并拒斥的国家就这么消失了。它以一种几个月前没有人认为可能的方式发生了。然而，即使在政治中，事情有时也会发生得很快，而且不是以人们所期望的方式。从一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重要的教训：如果有人在 1989 年初预言西德和东德即将终结，他一定会被称为疯子（crazy fool）——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疯子们的观点。

自治组织 1989 年的活动涉及广泛的热点。在汉堡，自治派期刊《破坏》（*Sabot*⁸²）的编辑弗里茨同志因愚蠢的新闻法事件，在 §129a 审判中被判处一年徒刑（罪名是“参与恐怖组织”）。可恶！在埃森，万人游行要求立即释放英格丽德·斯特罗布尔。与此同时，自治和反帝主义者支持红军派囚犯为争取集体关押进行的为期两个月的绝食抗议（绝食抗议在两名囚犯即将死亡时被取消，和以往一样并未争取到国家的任何重大让步）。在右翼党派“共和党”（Republikaner）在各种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一支强大而充满活力的反法西斯运动崛起。第三代移民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独立组织。“自治”一词的确切含义仍在讨论之中，并且现在越来越多地与“反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相关联。

在十字山和新克尔恩（Neukölln），第二次“革命五一”示威活动见证了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严重冲突以及“无产阶级购物”。这些事件导致少数尚未与自治派保持距离的另类左翼（left-alternative）中产阶级成员与之疏远。即使在自治运动内部，尽管凭借优越的巷战策略战胜了警察，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对骚乱感到满意。同志们批评骚乱的“冷酷的技术性执行”以及讽刺、激情和欢笑的匮乏。与此同时，在汉堡，参议院仍然派警察骚扰哈芬大街的居民。这不仅引发了几次声援示威，还导致一名参议院议员鼻子

⁸² “Sabot”应为“Sabotage”的缩写

挂彩。

如果柏林墙没有突然倒塌，事情可能会继续这样下去。但那以后，一切都发生巨变，自治派与其他西德民众——即使他们彼此之间关联甚少——一起揉了揉眼睛，不确定他们到底目睹了什么。最终，是时候问一个大问题了：“现在怎么办？”很明显，捍卫消失的民族国家并不是非常“自治”的。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吗？

由于这些事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一场在选帝侯大街上的示威被匆忙组织起来。在柏林墙倒塌几天后，成千上万的东德人惊叹于选帝侯大街闪闪发光的消费主义刻奇时，恰好遇到了一场由西柏林自治者发起的示威，自治者们友好地以以下标语欢迎他们：

“钱不够，抢银行！”

（指的是所有东德人第一次访问西柏林或西德时收到的“欢迎金”。）

“没有科尔，没有克伦茨，没有祖国！”

（赫尔穆特·科尔是西德总理，埃贡·克伦茨是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

“西方更加高明：他们用金钱筑起高墙！”

五年后，至少在示威期间即兴创作的最后一个口号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附录：“1981 自治主义纲领”

1981 年，一些参加意大利帕多瓦会议的自治活动家制定了八个纲领，试图捕捉自称为“自治”的多元化活动家群体的最常见特征。这些纲领从未正式化，并且出现了不同的修订和更新版本——例如，在《激进》(radikal) 杂志第 97 期增刊（1981 年 8 月）和 1995 年读本《运动前沿》(Der Stand der Bewegung, 见后记) 中——但直到今天，原始文章中列出的直截了当的信念和情感仍然是自治认同的核心，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得到了热情的讨论，有时也被部分活动家断然拒绝。

1. 人人都为自己而战，然而，将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将使我们所有人更加强大。我们不参与“议会斗争”，我们的活动是基于我们自身过往的影响，即“第一人称的政治”。我们不为意识形态而战，不为无产阶级而战，也不为“人民”而战。我们为一种全权自我决定的生活而奋斗，我们知道只有所有人的自由是我们的自由的先决条件。
2. 我们不与当权者对话！我们只提出要求，当权者听不听无所谓。
3. 工作场所中我们彼此疏离，从事雇佣劳动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生活的常态。我们通过朋克、“社群”和我们所处的亚文化找到了彼此。
4. 我们都信奉“模糊的无政府主义”，但我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中的一些人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维持秩序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一种支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而我们拒斥国家机器。其他人则相信被歪曲的“原教旨”共产主义思想。然而，由于 K 群和东德的经验，我们所有人都对“共产主义”一词有很大的疑问。
5. 无人有权力 (No power to no one)! 这同样意味着“不赋权于工人”，“不赋权于人民”，以及“不设反对权力 (counterpower)”。没有权力给任何人！

6. 我们的理念与替代运动截然不同，但我们使用替代运动的基础结构。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正在利用替代社群来创造资本和劳动力的新循环，既为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又将其作为解决经济问题和缓和社会紧张局势的试验场。
7. 我们不确定我们要的是反叛（revolt）还是革命（revolution）。有人想要“永久革命”，但也有人说，这与“永久反叛”没有任何区别。那些不信任“革命”一词的人认为，这个词意味着在某个时间点实现自由，而他们却不相信这是可能的。按照他们的说法，自由就是扔石头和石头击中目标之间的短暂瞬间。然而，我们都同意，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拆除和摧毁，而不是制定某种积极的理想。
8. 我们本身没有组织。我们的组织形式或多或少都是自发的。有占屋委员会，通讯网络（phone chain），自治集会和很多很多小团体。组织短期团体以开展行动或参加抗议活动。组织长期团体以从事持续的项目，如《激进》杂志，乌托邦电台或这类非法行动，世上没有比这更坚固的结构。我们不仅没有政党之类的玩意，也没有等级制度。直到今天，该运动还没有产生任何个人代表、发言人或名星，也就是说，没有内格里、杜奇克、科恩·本迪特，等等。



大横幅：

“对服从、安静和秩序的反抗是生活的唯一表现形式

- 反对被动服从

- 为了自我决定的生活”

小横幅：

“不敢做梦，就没有斗争的能力”

英文版译后记

Gabriel Kuhn

杰 罗尼莫 (Geronimo) 的《火与焰》是一本在德语圈左翼群体中的传奇书籍，此书 1990 年初版问世之时，不仅是第一本关于自治运动历史的书，还是第一本对自治运动的优缺点进行理论评估的书。此书引发了大量激烈的讨论，有些被记录在《火与焰 2：对自治运动的批评、反思和评论》(Feuer und Flamme 2. Kritiken, Reflexionen und Anmerkungen zur Lage der Autonomen) 中，这是一本关于《火与焰》讨论文章的合集，由杰罗尼莫和一些无名同志在 1992 年编纂。1997 年，杰罗尼莫又写了一本《灰与烬：对自治运动政治的反思》(Glut & Asche. Reflexionen zur Politik der autonomen Bewegung) 到前几卷，但这本书的重要性从未比肩《火与焰》。1995 年，《火与焰》新增内容版问世，本译本就是基于此版。

《火与焰》出版于德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正如杰罗尼莫在最后一章中所暗示的那样，德国的统一极大地改变了该国的政治格局，因此也改变了自治运动的优先事项和可能性。甚至有人声称自治运动将随着德国的统一而结束，但局势很难支持这种说法。自治运动从未被明确定义，事实上，运动总是基于将自身认同为“自治分子”的激进活动家。这种认同仍然存在于许多“自治中心”、“自治团体”等等之中——即使自治政治的形式可能已经改变。事实上，随着 2009 年汉堡和 2011 年科隆组织的自治会议以及城市和地方中心“自治总动员 (Autonome Vollversammlungen)”的复兴，人们对自治运动重新产生了兴趣，年轻的活动家也是如此。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自治运动会有个潜在的突破？该运动三十年历史延续的影响将慢慢显现出来。

这段历史的部分内容在《火与焰》发行后出版的许多书籍中都有呈现和分析。1997 年，久负盛名的左翼出版商 Konkret Verlag 发行了《自治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概况》(Die Autonomen. Ursprünge, Entwicklung und Profil der autonomen Bewegung)，这本书是 Almut Gross 和 Thomas Schultze 精心研究的结晶。2001 年，扬·施瓦岑迈尔 (Jan

Schwarzenmeier) 个人出版了《亚文化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自治主义》(*Die Autonomen zwischen Subkultur und sozialer Bewegung*), 这本书重点介绍了自治运动据点之一, 德国北部大学城哥廷根的运动历史。2004 年, 柏林的出版商 Assoziation A 发行了《变化中的自治运动: 前 23 年》(*Autonome in Bewegung: die ersten 23 Jahre*), 这是一本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轶事集, 内中故事以柏林为中心展开。关于奥地利自治运动的章节包含在罗伯特·福尔廷 (Robert Foltin) 的《我们行动: 奥地利的社会运动》(*Und wir bewegen uns doch. Soziale Bewegungen in Österreich*), 由 Grundrisse 出版社于 2004 年出版。不幸的是, 瑞士自治运动独特而多方面的历史仍未有书籍载体。

就理论反思而言, 最著名的书目是在 1990 年代由法兰克福自治派狼疮团体出版的《历史、种族主义和潜艇: 谁在哪些条件下斗争?》(*Geschichte, Rassismus und das Boot - Wessen Kampf gegen welche Verhältnisse?*, 1992) 和。《守夜人和其他鬼火: 反对黑暗时代的文本》(*Lichterketten und andere Irrlichter. Texte gegen finstere Zeiten*, 1994) 包括了 1990 年代自治主题辩论的重要贡献, 至今这些文本仍是重要的参考点。2001 年, 狼疮组织出版了最后一本文集《狗吠……从 A 到 RZ: 从 1968 起义到 19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激进斗争的时间旅行》(*Die Hunde bellen . . . Von A -RZ. Eine Zeitreise durch die 68er Revolte und die militänten Kämpfe der 70er bis 90er Jahre*, 2001), 对自治政治的目标和策略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狼疮组织还为颇具影响力的《三比一》(*Drei zu Eins*, 1991) 一书做出了贡献, 该书的标题文章由前“六月二日”运动成员克劳斯·维曼 (Klaus Viehmann) 和同志们所作, 他们向德国激进左翼介绍了“三重压迫”的概念。

有两本书收集了许多自治活动家的声音。在 1995 年柏林自治大会上, 一群同志自行出版了《运动的状态: 关于激进左翼政治的十八次对话》(*Der Stand der Bewegung. 18 Gespräche über linksradikale Politik*)。2010 年, 出版商 Unrast Verlag 出版了《自治政治视角》(*Perspektiven autonomer Politik*), 这是当代自治活动家撰写的文章和访谈集, 探讨了该运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性。

自治辩论 (和争论) 的首选渠道是与运动相关的期刊。多年来, 有无数的自治期刊, 但《激进》和《间断》(*Interim*) 必须算作最重要的两个。两个期刊都经历了长期的犯罪指控和镇压历史, 这些都记录在《二十年“激进”: 自治媒体的历史和观点》(*20 Jahre radikal. Geschichte und Perspektive autonomer Medien*), 此书由一些激进的德国出版社于 1996 年共同出版。在《激进》中断多年之后, 重生的《激进》自 2005 年以来已经发行了几期, 然而, 一切早已物是人非。该项目的未来仍然充满可能性。《间断》仍然每半个月在柏林出版一次。

* * *

自 1980 年代的鼎盛时期以来，当数百名占屋者似乎预示着新社会的到来时，当蒙面自治活动家的标志性面孔出现在德国最著名的新闻杂志《镜报》的封面上时，当黑群已然可以达到数千人的程度时，自治运动无疑失去了动力。然而，该运动的政治影响从未消失。正如乔治·卡西亚菲卡斯（George Katsiaficas）在引言中指出的那样，新的焦点出现在 1990 年代，特别是由于德国统一后民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气氛在政厅和街头的兴起。虽然占屋，特别是反核活动仍然很重要，但自治活动家现在主要从事打击极右翼和国家种族主义的事业。反性别主义和反恐同斗争在文本中被忽视了，作者杰罗尼莫亲口承认了这一点，但这些行动在整个 1990 年代仍然很重要，它们涉及与士绅化有关的问题。1995 年在柏林举行的自治大会吸引了数千名与会者，这表明了自治运动依然与时俱进。

1990 年代后期可能是该运动历史上的一个低谷，因为它无法制定政治议程或干预社会冲突。此外，它因激烈的内讧而遭到削弱。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自治活动家仍然是许多斗争中的重要因素，最著名的是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和反核斗争。

由 1999 年西雅图抗议活动引发的西方替代全球化运动——其臭名昭著的黑群受到德语世界多年自治斗争的启发——为自治情境注入了活力。在 2001 年欧洲的“抵抗之夏”期间，行动基调主要由哥德堡、布拉格和热那亚的反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抗议活动确定，其自治色彩非常明显。2007 年，在罗斯托克/海利根达姆的反 G8 抗议活动中，自治运动一次非常亮眼的表现证实了他们的毅力。

当今，自治运动表现出了连续性和创新性。在《火与焰》的运动、活动和特点中，以下几点仍然构成其政治的关键要素：

“自由空间”和占屋

争取“自由”或“自治”空间的斗争仍然至关重要。事情正在起变化，尤其是由于 1980 年代对占屋运动的暴力迫害，但德语世界的“自治中心”(*Autonome Zentren*)为激进活动家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合法化的住房集体(*Wohnprojekte*)继续追求替代性公共生活的梦想（尽管今天经常被批评为“改良主义者”），以及 *Wagenburgen*——字面意思是“拖车堡垒”：旧大篷车、露营车、房屋卡车等的营地——美化了几乎每个拥有明显激进社区的城镇。最近也有占屋运动的复兴，明斯特或埃尔福特等小城镇的斗争引起了很多关注。虽然有时仍然被谴责为“逃避现实”、“精英主义”甚至“资产

阶级”的，但争取自治空间以试验替代性生活、组织形式的斗争仍然是自治认同的一个决定性要素。

反核斗争

杰罗尼莫在他的书中为反核斗争安排了大量的篇幅。虽然这部分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背景，但也表明了这些斗争对自治派的历史重要性。反核斗争不仅在其三十年的历史中极大地鼓舞了自治运动，而且还拉近了与草根活动家之间的距离，大大拓展了抵抗网络。这些在今天仍然适用。

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自治反核抵抗主要集中在戈尔莱本的临时核废料储存设施上。每年，数千名自治派与当地农民、环保主义者和和平活动家一起破坏法国核燃料后处理厂的铁路核废料运输。不断的抗议活动给整个地区留下了印记，许多自治派已经在当地定居于通常被称为文德兰的地区，这提供了自治活动最有趣的案例研究之一，这些现象超越了政治亚文化范围并改变了整个社区的日常生活。

激进性

正如《火与焰》所反映的那样，自治运动一直与激进的行动主义联系在一起。*Has-skappe*（字面意思是“仇恨之帽”，即黑色巴拉克拉瓦帽）、黑群，以及对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城市游击斗争的同情是其决定性特征。事实上，在公众眼中，运动往往被简化为这些暴力行动，虽然这显然过于简单化。尽管对激进抗议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进行了许多自我批评性质的讨论，但谈论“和平主义自治”本身就似乎构成一个矛盾。事实上，近年来激进行动次数明显增加，例如，夜间纵火袭击豪车在柏林和汉堡已经司空见惯。自治运动还大胆地攻击与在部署海外德国军队有关的军事目标、对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和削减社会福利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以及发生特别极端的警察暴力事件的警察局。2009 年 10 月，三名被指控为在自治界得到大力支持的激进团体 (*militante gruppe*, MG) 成员因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袭击而被判处数年徒刑。

其他一些长期以来的自治政治特征，有反法西斯主义、反性别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但这些在杰罗尼莫的叙述中没有被给予太多空间（要么是因为他认为它们不那么重要，要么是因为它们后来才变得更加重要）。

反法西斯主义

反法西斯（“Antifa”，安提法）组织在整个德国及其以外地区于 1990 年代初迅速涌现，当时德国的统一推动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达到了新的高度。新纳粹和新法西斯街头帮派变得越来越活跃且暴力。极右翼政党进入了市政厅和省议会，而政治中心逐渐向那些十年前被认为是明显右翼的立场靠拢。激进左翼中的许多人担心整个社会向法西斯主义的倾斜，发起了从谴责种族主义言论到自卫的抵抗行动。虽然这些活动在 1990 年代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斗争远未结束。极右翼势力在德语世界依然强大，存在多个“民族解放区”，在这些地方，移民、朋克、左翼活动家以及其他不符合其世界观的人群行走都不安全。

今天的反法西斯政治包括与右翼的艰苦斗争，以及与自由派反法西斯团体和组织的联盟。安提法已成为自治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至于它经常被更广泛的公众视为同义词。虽然这种看法有些夸大并且忽略了运动的多样性，但许多年轻的活动家确实首先通过安提法团体接触自治政治。

反性别主义

自治女性运动历史悠久，对男性统治、父权制结构和性别歧视行为的批评往往针对同样受到压迫的男性。因此，妇女团体一再脱离“混合”的环境，以便独立生活、工作和组织。性别问题仍然是当今自治辩论的最前沿，并在任何更大的自治聚会上都被热烈讨论。许多倡议——从反父权制男性团体进行的反性别歧视信息运动，到性别研讨会——都证明这一主题迫在眉睫。更何况，近年来，酷儿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反种族主义

随着统一后的德国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兴起，以及移民作为欧洲政治关键问题得到日益关注，反种族主义（“Antira”，安提拉）斗争成为 1990 年代初自治运动的核心，并从那时起一直是其核心。反种族主义政治通常与反法西斯政治重叠，其特点是既关注法西斯文化中特定的种族主义元素，也关注欧洲各国政府实施和认可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实际上，安提拉政治往往集中在支持非欧洲移民，因为他们是欧洲种族主义最直接的受害者——既是新法西斯街头暴力的目标，也是国家机构移民政策的目标。

这些问题是否像一些人声称的那样在自治运动内部造成了裂痕，还有待商榷。但有一项进展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1990 年代初，在德国统一的背景下，激进左翼中的一些团体再次要求重新审视德国的历史和左翼的反帝国主义概念，特别是与巴以冲突、反犹太主义以及反犹太复国主义有关的概念。在这些辩论中出现了所谓的反德意志人 (*Antideutsche*)，他们拒斥经典的反帝国主义观念，认为这是幼稚和反动的，因为后者将反犹太复国主义解读为隐藏的反犹太主义。认为对资本主义的“个人化批评”（例如“邪恶的资本家！”）过于简化并带有隐秘的反犹主义倾向，并且认为传统的启蒙价值——个人自由、世俗主义和社会平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他们坚定地捍卫以色列国是全球犹太社区的避风港和民主进步保卫者的地位，或许讽刺的是，这个坚定反民族主义的运动却在抗议中挥舞以色列国旗，通常还伴有二战盟军的旗帜——苏联国旗、三色旗、米字旗、以及最常见的星条旗——据称是一种挑衅手段。在最坏的情况下，伊斯兰恐惧和好战主义猖獗。另一方面，反帝派 (anti-imps，来自杰罗尼莫的叙述中的描绘) 公开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并称赞像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 (Mahmoud Ahmadinejad) 这样的人物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重要盟友。虽然并不是所有涉及这些倾向的团体都认为自己是自治运动的一部分，但冲突对自治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友谊破坏了，自治中心分裂了，甚至导致了肢体对抗。然而，今天，许多自治活动家已经厌倦了这种情况，一个更令人鼓舞的未来似乎就在眼前。

近年来，在自治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问题是动物权利和气候变化。士绅化的重要性稳步增加。大多数对豪车的纵火袭击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人们也越来越关注国家镇压、监视和军事化——所有这些都与“反恐战争”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和国际安全机构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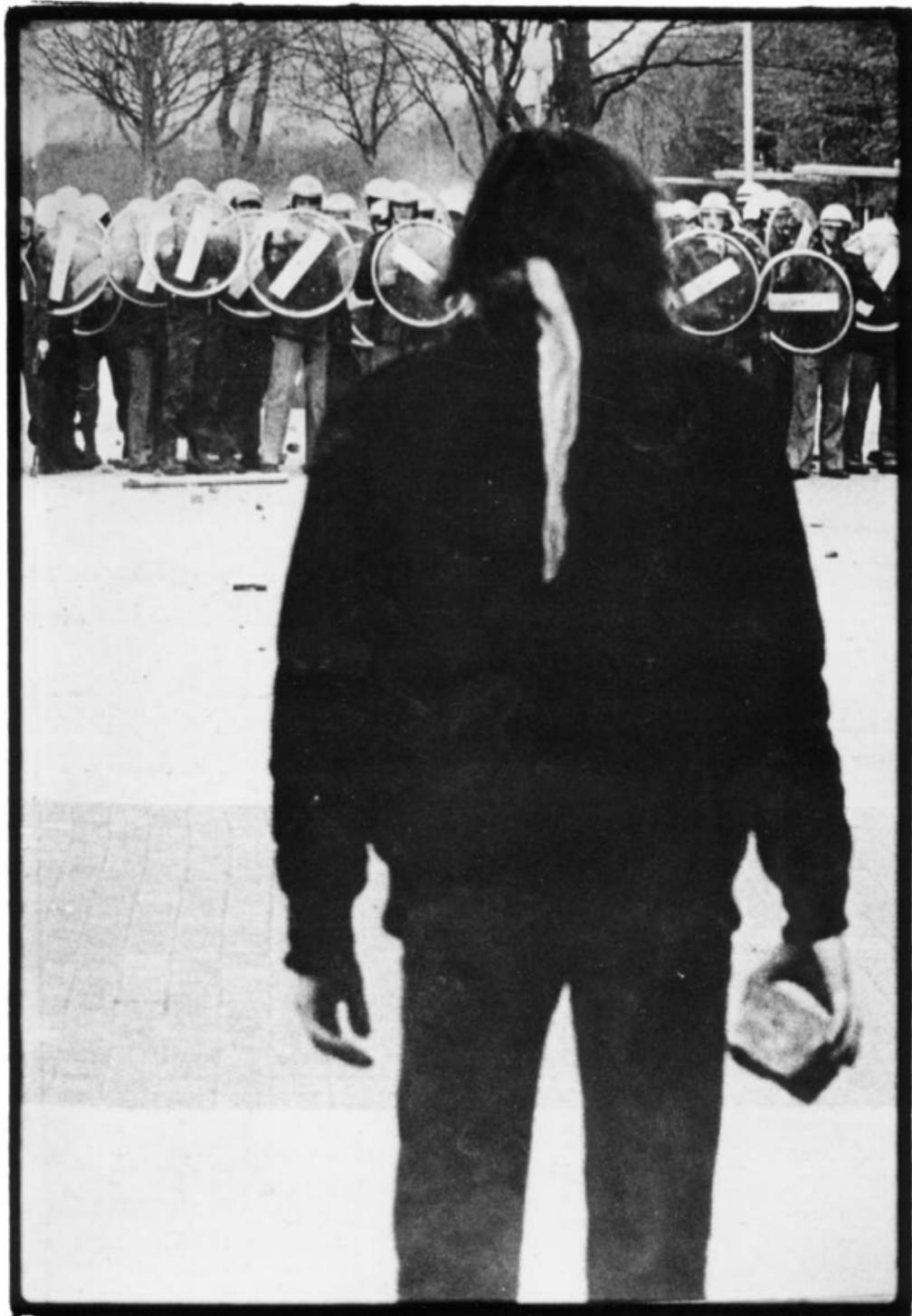
近年来，反资本主义斗争并不是该运动的强项之一。虽然在过去十年中，反对 WTO 或 G8 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确实有助于振兴该运动，但尽管德国经济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自治派依然未能推进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有一些举措，比如“发薪日！”(*Zahltag!*) 成功地在政府就业机构和失业办公室组织了抗议活动，但总的来说，对危机的自治反应一直很弱。当然，这并非自治运动所独有：整个德国左翼在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方面都遇到了困难。

除了无法将紧迫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优势外，自治运动多年来还因各种其他缺点而受到批评。它被指责显得排他和精英主义、缺乏理论、充满城市和中产阶级倾向、美化暴力，是“生活方式主义者 (lifestylist)”。由于活动家的流动率非常高，它也被称为“一代人的运动”。这些批评大多是有道理的。与此同时，运动一直有批判性的自我反省，并有人认真努力推动运动的发展。可以说，这是该运动的优势之一，也是它存活了三十多年的原因之一。

最近出现的一个特别的挑战是右翼青年对自治口号、符号、策略和主题的吸收。所

谓的自治民族主义者（*Autonome Nationalisten*）穿着运动鞋，宽松的裤子和连帽运动衫，身上打着钉子和部落纹身，组成黑群，支持环境和动物权利事业，并将“晚安，身为白人的骄傲（white pride）”口号改为“晚安，左派”，同时保持相同的标志。他们还声称反对中央集权的政党结构，并试图提出纳粹主义的“时髦”版本。虽然这种现象在自治圈子里引起了很多混乱和反省，但界限显然是划定的。自治民族主义者是否会继续成为右翼青年的时尚，或者他们是否会将自己确立为一种持久的亚文化，还有待观察。

在国际上，自治运动有时具有神话般（mythical）的维度。这可能引人关注，但神话和现实是两回事。不可否认，自治运动有其矛盾和缺陷。但最重要的是，它仍然存在。尽管德国自治运动面临着种种缺点和挑战，但它确实是欧洲激进左翼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篇章。它发展了持久的政治原则、完善的基层网络和持久的文化认同，没有政党结构、理论规范或效忠誓言。许多类似的运动在几年内消失，或者只以小“先锋队”的形式生存下来，这些“先锋队”变成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自治派已经抵御了这种逻辑。即使他们进入第四个十年，在他们中依然看不到集中化和同质化的现象。杰罗尼莫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起源，希望他们的结局能够超越我们这个世代。



杰 罗尼莫是一名机械师、工会成员和长期的自治活动家，居住在汉堡和柏林。起于 1980 年代的反核和反军事主义斗争，他至今仍积极参与各种自治运动。他还以他的名字发表了大量文章。

加 布里埃尔·昆恩是奥地利出生的作家和译者，在 1980 年代后期的德国自治运动中参加政治活动。他在 1990 年代与奥地利自治期刊《TATblatt》合作。自 2007 年以来，他一直居住在瑞典，并与自治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乔 治·卡西亚菲卡斯是十一本书籍的作者或编辑，其中包括关于 1968 年全球起义以及欧亚社会运动的书籍。他与凯瑟琳·克利弗 (Kathleen Cleaver) 共同编辑了《解放、想象力和黑豹党》(Liberation, Imagination,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作为和平与正义的长期活动家，他是位于韩国光州的全南国立大学“5 月 18 日”研究所的国际协调员，总部设在波士顿的温特沃斯理工学院。他的网址：<http://www.eroseffect.com>

中文版译后记

希托昂（Citoyens）

本书《火与焰》的翻译开始于 2022 年的盛夏，对于中文读者而言，2022 年应该是个多事之秋。相比于上世纪色彩浓烈的主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文读者对“自治运动”这个概念应该是相当陌生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人问津，造成这一点的因素有很多，正符合自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但是，自治运动混沌的表象下蕴含的是无穷的启发性，在遥远德国发生了如此另类的“革命”，这怎么不能让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革命前景的同志们感到颤抖？共产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人造的机器，它被无数次地发动，却从来不曾稳定地再生产，这其中的链条到底断裂在何处？这需要同志们持之以恒地研究社会学，不是党同伐异，而是冷漠地指出社会这巨大机器运作的机理，而自治运动的文本或许可以为这一混乱的“工地”添上一份助力。

本书中文版翻译自《火与焰》英文版，作为将自治运动介绍给中文读者的重要文本，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尽量采取了本地化的方案，希望此举能够减轻读者因为对于战后德国独特社会环境不熟悉而造成的负担。本书总的来说偏向一本历史记录而不是理论批评，作者通过大量的叙述与考证，深入了上世纪德国自治运动的大部分重要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有占屋运动、反核斗争以及十字山暴动等大规模冲突，这些冲突无一不是对国家机器的直接反抗。本书另一个特色是大量照片与海报，这些图像历史很好地补充了文化层面自治运动的另类形象。

自治运动在中文世界受到冷落的原因，主要围绕在自治运动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上。列宁式政党在中文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中被推崇为一种正统路线，这使得对列宁式政党的任何反思都很容易被扣上“小资产阶级”的帽子，这种趋势极大地压制了中文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精神。作为德国独特社会环境中涌现的社会组织，自治运动绝不是完全站在共产主义的反面，如果考虑到德国“K 群”的各种表现，我们完全可以说自治运动比战后德国任何打着红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更加具有反抗精神、更加与时俱进。

自治运动的成员对各种“主义”之间的争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摆脱意识形态⁸³的束缚、为了拒斥政党政治，自治运动往往不将自己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拒绝将自治精神“民主化”、“党争化”。当然，在我们对本书的早期翻译中确实使用了相当数量的“自治主义”一词，读者应当了解的是，自治运动相对于其他社会运动最大的特色就是其坚持身体力行地进行社会实验，将自治组织扩张到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并运用武力保卫“自决的生活”，因此自治运动的精神往往体现在身体性、物质性，其文本上的贡献则稍逊一筹（自治运动在艺术上具有很高贡献），“主义”在形容自治运动时应该被理解成一种“行动指南”。

此外，自治运动在两德统一后国际影响力下降迅速、战后德文文献在国际左翼运动中的冷门地位也是导致自治运动在中文世界关注度有限的原因。这些似乎与西德作为冷战前线的现实紧密相关。

为什么我们要将《火与焰》介绍给中文读者？这涉及到一个世界革命的核心问题：先锋队政党领导的革命一个接一个变成法西斯之后，21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到底应该如何展开？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也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毕竟每个同志都应该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的爆发。革命的爆发需要什么条件？总的来说，应当取决于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当被统治阶级的力量敏锐地寻找到了统治阶级虚弱的信号，革命或许就将在一次次的战斗中被回溯性地建构起来。但，这种力量的倒转完全取决于矛盾双方的硬实力对比么？托克维尔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精妙论述中找到了一个朴素的线索——革命往往不在压迫最酷烈的地方爆发，而往往发生在国家机器进行改革的地区。这句论断对于法国大革命应该是对的，而且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推广，就能成为革命的启示——被组织起来并不断扩大的强力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中出现，才是革命的核心征兆。当然，这个道理早已被列宁主义先锋队理论所涵盖，自治运动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与列宁主义分歧的地方，毕竟这些自治战士做的事情本身就很“列宁主义”。自治运动区别于高度集权的列宁式政党、献给世界革命运动的启示就在于，自治运动给出了一种可能性，一条将人们按照自治精神组织起来并常年维持斗争烈度的可能路径、一份在资本主义监狱中预演公有制的青涩方案、一本在激烈斗争中磨练战斗本领的训练手册、一张孜孜不倦修炼自治素养的说明书。

先锋队理论似乎从问世的瞬间就格外受投机分子和野心家的青睐，造成如此格局的原因正是先锋队具有批量生产资产阶级的能力——私有制出现的全部要素都存在于20世纪共产党的内部，这些党“领导”下的政权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力量，这个事实使得“国家的消亡”变成了一个极度讽刺的笑话——在党的英明领导下，

⁸³此处“意识形态”的意思类似冷战后列宁倡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一种区分政治阵营的思想旗帜

国家成功向着法西斯国家迅速转型。自治运动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在自治斗争的前线，邻里自治组织总是能在一个又一个街区伺机扩张，不是通过一层层组织成员形成的向上负责权力机制，而是直面国家暴力以形成临时的“生产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生产的产品有穿越大街小巷的自治倡议、有迷幻醉人的雅皮士文化……而他们生产出来最重要的，是针对警察行动的攻防部署，这将街区的所有人团结起来成为自治运动的一份子。无产阶级正是需要这样被全体政治化，接受政治训练，逐渐地，整个阶级被整合起来变成民主的强力阶级，诚然，这样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消亡状态”。

国家就是法西斯！化资产阶级国家为己用的路径势必会葬送革命。那党呢？党在自治运动中还有一席之地么？当然，自治运动不可能禁止结社，毕竟几个人自己偷偷搞个小团体根本没人管得着。事实上，自治运动本身就派系林立，派系冲突与争端并不少见，但总的来说，自治运动的派系斗争保持在一个较低的烈度，在合作上的亮眼表现并不少见，自治运动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是党解放工农，而是工农解放党**”。考虑到自治运动的城市斗争属性，可能这句话的“工农”改成“工人”更贴近现实，不过无伤大雅，一旦无产阶级被自治式组织起来，党自然就脱离了固定的领导地位，回归到单纯的思想团体的地位，这对于深陷 20 世纪共产党诅咒的党来说无疑是一种解放。自治运动不在乎弥赛亚式理想主义的号召，自治运动追求共同体利益的均衡，这表现为一种“去党化”，即政治行动先于“统一思想”，从这些角度来说，自治运动与列宁式政党确实是对立的模式。

自治运动在十字山以及 1987 反里根抗议中的表现让运动整体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机器镇压力度的上升带来了自治运动百家争鸣的历史状态。《火与焰》的文本清晰地展现了这段历史，少部分自治活动家进入十字山街区引发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暴动，很快将整个街区自治化，拒斥了国家警察的暴力镇压，同时也伴生了所谓“无产阶级购物”这样争议巨大的暴力行动。“无产阶级购物”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在具体行动上，如今的“零元购”⁸⁴确实与之非常相像，但“无产阶级购物”的历史背景具有一个强大的警方压力，自治活动家在十字山引爆了当地剑拔弩张的阶级矛盾并成功在一段时间内将国家暴力“失能化”，应当说，“无产阶级购物”反映了自治运动秉持的个人自由原则同时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

自治运动最被各路革命好汉诟病的一点，正是自治运动的个人自由原则，这种原则被其他左翼群体普遍打上了“小资产阶级”的烙印。作为发源于城市市民的社会运动，个人自由原则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由主义的气息，自治组织松散的架构限制了其在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发展，这是自治运动的一大弊端。但自治运动实践中的个人自由原

⁸⁴指 21 世纪以来在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时常出现的打砸抢活动

则总是能表达出“反抗的自由”而不是“被奴役的自由”，替代运动在文化上对自治运动的微妙影响催生了自治运动独特的文化训练范式，对“社会认同和文化空间”的追求“唤起了一种新的解放模式”，这些成就被总结在所谓“亨克尔”一词中。“亨克尔之梦”倡议宣告了这样一个事实：一种追求美好生活与平等社会的斗争或许是会起源于对真金白银现实利益的考量，不再有“必要的牺牲”，不再有“时代的大棋”，在现实利益的考量中，传统的弥赛亚道德将被扬弃。诚然，这种新的革命模式似乎仍然缺乏文本上的清晰表述，或许新生代的活动家们将完善这一工作。

* * *